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關向光博士



胡風事件的再思考

研究生：劉至剛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七月

謝辭

「光陰可惜，譬諸逝水。」在政大學習的時光，匆匆已近八年，如今離別在即，心中除了不捨，更多的是感激之情。我大學就讀於歷史系，在東亞所繼續碩士生涯，論文主題亦屬歷史相關領域，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算是稍微體會歷史研究的困難與孤獨，對於此門不以功利為導向的學科，以及於其中貢獻心力的學人們，藉此略表敬佩之意。

由於個人的怠惰，論文已延宕多時，本論文之所以能夠「如期」完成，首先必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關向光老師。從提點主題方向、寫作過程的指導，及至內文的修改建議，關老師對於我的論文，可說是鉅細靡遺、字字斟酌，並給予充分的寫作自由。若無關老師的悉心指導，我想我可能無法完成一本文理大致通順、格式少有錯訛的碩士論文。關老師除了是我的指導教授，也是我們碩班導師，老師時常給予同學課業、生活、心靈上的關懷和鼓勵，讓我們常感溫暖，學生再次言謝。此外，本論文之口試委員克思明老師、李福鐘老師，二位老師對本論文是知無不言，提出諸多深刻批評，皆為真知灼見，在此感謝二位老師給予寶貴意見，方使本論文能夠更為嚴謹。東亞所助教張姐，總管所內各項事務，由於張姐的幫忙，學生才能專心致志，無須掛心於行政流程，您對同學們的關懷，我想大家皆感懷於心。

求學生涯中，不乏諸多益友，且容我細瑣道來。高中好友榮洋、國倫、乃仁、孟甫、禹辰，還有心靈導師家佑，儘管大家各奔東西，仍是一見如故，感謝你們的反諷式鼓勵，能夠有群「諍友」（損友？）真好；大學同學兼室友嘉祥、成威，共同生活四年，你們可說是最親近的好友，讀書過程中若無你們的砥礪，恐怕我將不知蹉跎至何時，祝福你們早日完成論文；歷史系籃學長建璋、承樺、瑞霖、佾錫，雖然和你們閒聊鮮有建樹，但也讓我常懷念起當年一同練球、打屁的時光，以及逝去的青春；研究所同門學長兆崑、宇松、學典、同屆的進傑、陳品，感謝你們在學業上的指點，對我助益良多；感謝歷史系學弟敬棚，提供研究室座位，還有同學奕鳴、高韻的偶爾關心；研究所同學立凱、德正、依帆、維航、槐瑾、健祐、儀儂、鄭為，大家來自四方而相聚於此，和你

們相處使我的視野更為開闊，也讓煩悶單調的碩士生涯，增添不少八卦樂趣，希望我們友誼長存，各自達成理想。感謝教務處課務組的「大哥」、「大姐」，還有一起工讀的同事們，兩年多的工讀經驗，讓我學習到許多待人處事的分寸。

感謝女友佩玲，身兼摯友的角色，結識三年來對我多所關懷，特別在我對論文感到徬徨無措時，能夠包容我的煩悶、脆弱甚或無理取鬧。平時我們能夠天南地北、無事不談，此情彌足珍貴，希望我們能繼續帶給對方正面的想法。

最深刻的感謝，留給永遠支持我的家人。感謝我的父親、母親，老爸雖然主司黑臉，多以批評的方式體現鼓勵，希望我能早日脫離「草莓一族」，我能體會您的用心；老媽則是溫情關懷、勉勵取代督促，在心情上給予撫慰，於母親的身上，讓我學到邏輯思考、自我情緒管理，還有許多良善的個人特質。我的祖父母，向來勉我勤學，如今算是稍有成果，以此告慰天上的爺爺。此外，家人姑姑、阿妹姨、小姨爹、表弟妹文潔、世傑，你們的不時關切，是我前進的動力，也讓獨學在外的我，常能有家的感受。最後，未能全數具名的家人們，在此一併致謝。

大學畢業後，有幸能夠繼續進修，美其名固然為充實自我、追尋自我實現，實則不無逃避現實、掩飾自身準備未妥之情，感謝父母未曾多加責備，仍給予充分的信任。如今這本論文終究完成了，希望你們與有榮焉。

民國一〇一年八月十七日 午夜

至剛 於基隆河畔

摘要

欲探尋中共和知識份子的關係，必先回顧其歷史發展。早在 1940 年代，中共已藉由「整風運動」，發展出一套「馴服」和「利用」知識份子的辦法。1949 年中共建立新政權，更將此邏輯推及全國，對於當代中國知識份子而言，無疑是一巨大變化與挑戰。

胡風，作為一位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作家、知識份子，其政治立場向來親共，乃被中共視為「同路人」。儘管如此，胡風仍有諸多意見，未能與中共全然契合。1954 年，胡風向中共中央遞交「萬言書」，直陳中共文藝政策的缺失。1955 年，毛澤東欽定「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胡風和友人多遭逮捕、審查，並牽連甚廣。胡風一派因言獲罪，堪稱中共建政以來首宗「文字獄」，亦為重大政治冤獄。

本研究以胡風事件為主軸，圍繞胡風其人進行個案研究。第一章為導論，簡述本文研究動機，以及當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變化。第貳章、第參章為胡風之個人歷史，描述胡風求學、出洋、創作、涉入政治的人生歷程，作為討論胡風事件的背景介紹。第肆章為主文，詳述胡風事件的原委，進一步探討胡風事件的成因，分析中共黨政高層（特別是毛澤東）所扮演之關鍵決策角色，藉此釐清其政治責任。第伍章結論，為筆者的研究心得和展望。透過胡風事件的探究，筆者針對毛澤東的個人權威、中共與知識份子間的特殊關係，以及中共政治文化提出檢討。

關鍵詞：胡風、毛澤東、中共、知識份子、文藝政策

Reflections on the Hu Feng Incident

Liu, ZhiGan

Abstract

To re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intellectuals, we should review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arly in the 1940s, the CCP has already progressed the method of “using” the intellectuals. In 1949, the new regime was built by the CCP. Furthermore, they spread this strategy to whole mainland. Obviously, it was a big change and challenge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Hu Feng, as an intellectual and a “comrade”, whose political position had been closed to the CCP. However, Hu Feng still had some opinions which differ from the CCP. In 1954, Hu Feng submitted his proposal which criticizing the CCP’s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In 1955, Mao ZeDong judged this case as “Hu Feng counterrevolutionary group”. As a result, Hu Feng and his companions were arrested and investig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Hu Feng Incident seemed to be such a literary persecution and injustice case.

T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Hu Feng Incident. Firstly, Chapter 1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introduces the reasons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 changing thought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Secondly, the focus of Chapter 2 is the life course and career pattern of Hu Feng. Chapter 3 is the narration of the big change to the intellectuals on 1949. Chapter 4, which includes the main idea of this research, not only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Hu Feng Incident, but also seeks the crucial role of Mao. In Conclusion, Chapter 5 summarized the reflection and the vision upon this research. The writer reviews Mao’s personal authority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CCP. In the future,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ll still be a major issue, that will need further study on it.

Keywords: Hu Feng, Mao ZeDo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tellectuals, The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目錄

第壹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4
第四節 研究架構.....	16
第貳章 胡風的人生歷程	19
第一節 青年時期.....	19
第二節 人生中期（1933-1949）.....	25
第參章 進入「新時代」（1949-1954）	35
第一節 建政初期知識份子的態度.....	37
第二節 胡風的生活和心境轉折.....	40
第三節 中共文藝政策的緊束.....	51
第肆章 再探胡風事件	55
第一節 胡風事件的發展和轉折.....	55
第二節 胡風事件溯源.....	76
第伍章 結論	97
研究心得.....	98
研究侷限及前瞻.....	104
參考書目	107

第壹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我求學過程中，歷史課本對於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這一問題，往往著墨甚少，語焉不詳；後來大學進入歷史系，才知道歷史學者歸納出數種原因，諸如政治腐敗、經濟秩序失控、社會人心背離，乃至於國際政治現實等諸多面向。但是，關於中共與知識份子間的互動，仍較少論及。中共成功奪取政權並非偶然，其中知識分子的參與和支持，也是不容忽略的，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簡稱「左聯」）為例，「左聯」作家群與中共關係密切（實質上為中共所領導），他們在政治、社會上發揮可觀的影響力，為當時國民政府帶來不小的輿論壓力，堪稱中共的「文化軍隊」¹。在中共「革命」的過程中，知識份子固然貢獻匪淺，但是中共看待知識份子，已存在許多「不信任」因子²。此外，知識份子勇於議論、不平則鳴的習性，亦頗不見容於中共。本論文希望以胡風作為個案研究，時間斷限由「五四」時期至中共建政後，觀察胡風的人生經歷與轉折。

觀察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思想、地位的演變，可以看到知識份子主要面臨著兩種層面的衝擊。首要是外部因素的影響，即西方勢力與文化的引進。自清季以降，帝國主義在中國步步進逼，救亡圖存、求新求變的思想，已普遍存在於知識份子心中。再者，由內部因素觀之，清末廢除科舉制度，造成傳統士大夫階層的解體，知識份子和官僚制度間的連結不復存在，讀書未必保證其仕途發展。在時代的變化下，從傳統士人至具現代意義的知識份子，讀書人正面臨轉型的壓力。

¹ 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83），頁9。

² 在中共眼裡，知識份子具有先天的弱點，諸如：易於叛變、政治歷史複雜、與地主家庭藕斷絲連等。

時至「五四運動」時期，起因是源於 1915 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苛刻要求，以及 1919 年中國在巴黎和會、山東問題所遭遇之不公，進而引發中國民眾強烈的民族情緒，終而形成複雜、多元的現象：諸如西方新思潮（自由主義、實驗主義、社會主義）的引進、「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罷市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知識份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方案。³五四時期各式西方思想，以及「救亡圖存」的民族情緒，皆深為影響現代知識份子。

胡風生於清末，成長於帝制崩解、民國初建的時代。從他的生長、求學歷程中，可以看到，胡父原期望他能進入法、政領域學習，為家庭經商謀得保障，然而胡風醉心於文學創作，不時抗拒父親的安排。從胡風的人生經歷，應可略見其新、舊價值觀的轉變。

概覽胡風的生平，他原接受私塾教育，入城就讀高中始接觸新思潮，1924 年經學長引薦，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9 年赴日就讀慶應大學，時受日本普羅文化的吸引，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文藝思想，亦參與「左聯」東京支部和日共活動。1930 年代胡風歸國後，胡正式參與了中共所主導的「左聯」，因其政治立場與中共相近，長期被視為中共黨外的「同路人」。然而，因胡風向來親近魯迅，繼承魯迅的「現實主義」(realism)⁴和批判思想，部分文藝觀點和中共相左，故時有筆戰、論爭。

中共建政後，胡風由於各種原因（諸如文藝理論、人事恩怨），未獲中共重用，工作安排並不順遂。此外，胡風對於文藝創作的種種缺失（如「教條主義」、「機械論」等傾向），深感不滿。胡風在發表受挫、言路受阻的情況下，仍欲直陳己見，遂向中共中央遞交《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後簡稱《報告》），以改變現狀。胡風在《報告》中直指文藝領導的缺失，用詞頗為尖銳，終因言獲罪。胡風，身為一位和中共關係密切、長期信仰左翼思想的

³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台北：桂冠，1989），頁 4-6。

⁴ 大陸學界使用「現實主義」一詞，義同於台灣學界所稱「寫實主義」。為求用詞一致，後文將統一使用「現實主義」。

「黨外」⁵知識份子，為何最終被中共以「反黨」、「反革命」定罪？回顧以往文獻可以看到，諸如文藝理論的分歧、左翼文壇內的宗派問題，以及中共文藝領導權的鞏固等角度，多數學者已從不同角度給予回答。⁶至於「胡風事件」的發展急轉直下，毛澤東作為中共黨內最高決策者，毛在其中扮演何種關鍵角色？毛所應負的責任又是如何？

在中共統治下，從政治上來說，知識份子已背負著「原罪」，知識份子不過是暫時團結的對象，需經「思想改造」方能改變其階級屬性；從經濟面向觀之，知識份子已被國家「包下來」，並不存在經濟獨立的可能；而在日常生活中，知識份子身處「組織化」⁷網絡下，個人思想、人際關係等私領域備受侵犯，亦無法自外於社會。綜上所述，胡風身為知識份子一員，在被中共新政權「包下來」後，其工作、生活上之境遇為何？身處「新時代」之中，胡風又將會面臨哪些心理不適，並且如何回應？

-
- ⁵ 據胡風及其家人之回憶，胡風並未真正確立與中共的黨組織關係。胡僅於年少時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及登記為國民黨（左派）黨員，日本留學時期曾參與日共活動，返國後加入「左聯」並擔任宣傳部長。參見梅志，《往事如烟：胡風沉冤錄》（台北：曉園，1990），頁 387-388。
- ⁶ 關於「胡風事件」成因的相關研究，可參見：王麗麗，《在文藝與意識型態之間：胡風研究》（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李輝，《歷史悲歌：胡風冤案集團始末》（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89）；翟志成，《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集》；林希，《白色花劫：「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
- ⁷ 中共建政以後，黨運用國家機器，將知識份子組織起來，納入各式專業「協會」之中，這些「協會」實屬政府機構的一部分，除行使政府職能外。知識份子被置入「單位」中，「單位」又掌管其人事資料、職務調動、福利制度等。在黨控制力的強化下，黨和知識份子存在一種依附關係，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實日益減少。參見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2004），頁 60-63。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壹 從傳統士人到現代知識份子

如何定義「知識份子」，並非本文探討之重點，本文所指涉的「知識份子」，旨在對照與區別傳統的「士」。具現代意義之知識份子，不同於傳統士人，他們的思想是紛雜的，且不再以儒家思想為經典；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與官僚制度已無必然之聯繫，亦不同於以往之士紳。目前已有許多學者，關注讀書人的角色變遷問題，即如何從傳統士人的身份過渡至現代知識份子。

余英時最早提出知識份子「邊緣化」的概念，余氏認為從十九世紀末至五四時期，是士大夫逐漸過渡到知識份子的階段，即開始「邊緣化」的過程。不論國、共兩黨，其內部皆發生知識份子「靠邊站」的現象，意即知識份子逐漸遠離政治權力中心。此外，余氏認為知識份子面臨文化邊緣化的情形，則是知識份子主動造成的。余氏指出，清末留日知識份子受日本的影響頗深，當時日本學者多接受斯賓賽（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進化論觀點，相信人類社會的進程遵循著一種普遍的法則，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先進和落後的分別。以「國粹學派」為例，便在此觀念影響下，開始以西方現代文化價值之標準，重新檢視並發掘國學的精華。

然而到了「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的態度已經轉變，基本上反對以中國的經典來附會西方現代的思想。⁸簡言之，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已從「藉西方新思想以發揚國粹」走向「全盤拋棄舊思想」，「向西方尋找真理」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失卻信心的表現。

張灝則突顯現代知識份子與傳統知識份子的相異之處：第一，居於城市且與本鄉脫節，依賴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學會這三種制度媒介生存；第二，他們既與中央、地方政府缺乏有機聯繫，故傾向和政治權力中心互相抵觸；第三，在文化認同上他們明顯薄弱於傳統士人。故張氏認為，現代知識份子同時具備

⁸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政治變遷》（台北：三民，1992），頁40-47。

政治邊緣性、社會游離性兩種特質，但居文化核心地位。⁹與余氏不同的是，張氏較看重知識份子文化力量的轉型，知識份子在現代社會仍發揮其文化影響力。

許紀霖順著「邊緣化」的理路，談到現代知識份子欲重建社會重心而不可得，究其原因，乃因知識份子的「邊緣化」（「獨立化」）與「中心化」（「城居化」）。知識份子出現內外斷裂的局面，其外部與中國社會逐漸分離；其內部亦失去共同的信仰與意識形態，且城鄉菁英間的疏離感亦甚。1940年代戰爭與內戰全然摧毀了民間資本和文化權力的社會基礎，知識份子在內外無所依歸的情況下，只能被迫在兩股政治勢力間做出抉擇，其悲哀莫甚於此。¹⁰許氏的論點，基本上未脫知識份子與政治、社會關係此一視角。

綜上所述，近代以來的知識份子，除了面對傳統四民社會解體此一重大變化，在西方文化的浪潮下，開始全面檢討、懷疑中國傳統文化，終至拋棄傳統文化；知識份子無緣於政治仕途，乃漸趨邊緣化；在社會輿論上，隨著現代報業、出版業的發展，仍有效發揮其文化影響力。

貳 五四以降知識份子的思想變化

欲研究胡風其人思想形成的過程，應先從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與思潮開始談起。對於五四時期的思想，兩岸學界已有不少討論，然而「五四」¹¹對於中國的意義究竟為何？余英時曾為文指出，不論是胡適提出之「中國的文藝復興」，或是馬克思主義者所稱之「啟蒙運動」，皆無法體現「五四」的全貌。余氏認為自五四時期、文學革命以來，中國在激進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典範變遷」（paradigmatic change），此後不論是批判傳統或者倡議改革，中國知

⁹ 張灝，《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04），頁42-44。

¹⁰ 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收於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台北：聯經，2007），頁159-167。

¹¹ 本文關於「五四」的界定，不採狹義說（即1919年5月4日的學生所發起的民族主義運動），而採廣義說，其中包含數個運動：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所發起的思想文化改造運動、1917年胡適、陳獨秀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以及1919年5月4日的學生示威運動，且將「五四」視為政治、文化、思想等多層面的廣泛行動。見張灝，〈重返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收於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1999）；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頁1-9。

識份子幾乎必然地求助於某些西方理念、價值或習俗，以作為正當性的基礎。¹²「五四」知識份子對傳統文化的信心開始崩潰，西方各式思潮成為時代新寵。

五四時期各式西方思潮進入中國，以往學界多以民主、科學、理性等概念，概括此時期的思想，然而近年來學者多能同意，當時思想界呈現多元、紛雜的面貌。張灝指出，「五四思想」中包含數種矛盾且對立的概念：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懷疑精神與「新宗教」、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而諸如浪漫主義、「政治宗教」、集體意識等，這些原與「五四精神」背道而馳的元素，卻是研究者時常忽略的。¹³故張氏以為，「五四思想」具備兩歧性、矛盾的特質，像是強調理性思維卻崇尚浪漫主義，提倡懷疑精神卻又深信各式「主義」。綜觀五四時期的思想發展，中國知識份子寄希望於西方思潮，亟需一套主義、一種世界觀，藉此來解決所有問題，形成一種急功近利式的思維；同時，儘管當時知識份子批判宗教、迷信等舊俗，提倡科學觀念，卻對馬列主義教條深信不疑，成為另類的「新宗教」¹⁴。

五四時期思想固然呈現紛雜的面貌，然而為何最終不少的知識份子獨鍾馬列主義？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曾指出，中國知識份子（如陳獨秀、李大釗）向西方求諸「光明」，他們皆醉心於一種世界觀，內含「包羅萬象的解決辦法」（all-embracing solutions）¹⁵，意即一套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方法。然而，當杜威的實用主義和「民主」、「科學」等漸進改革方案，無法迅速改變中國社會時，中國知識份子則偏好「速成」的解決方案，便很快地投向馬列主義。李澤厚則認為，中國知識份子迅速接受馬克思主義，有其文化心理結構上的條件。清末以來的知識份子，迅速拋棄了歷史循環論和歷史退化論等史觀，並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乃因中國並沒有真正強烈的宗教信仰，儒學所強調

¹² 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收錄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頁 17。

¹³ 張灝，〈重返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收錄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頁 33-65。

¹⁴ 張灝，《時代的探索》，頁 113-127。

¹⁵ 參見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27;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20。

之「自強」、「剛健」等概念也可在進化論觀點下，轉化為近代精神。¹⁶李氏藉此說明了中西之間所謂「文化心理結構」的相似之處，如追求現實生存、肯定世俗生活與實用理性。

回顧二十世紀 30 至 40 年代歷史，國共兩黨都曾試圖控制文藝界，如國民黨的宣傳部門以宣揚「三民主義文藝」為職志；共產黨則成立「左聯」，以期作為相抗的文化陣線。至於 30 年代的中國文藝界，基本上呈現兩種文藝思潮相互爭鳴，一派是以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等人為核心的《新月》作家，他們傾向自由主義傳統；另一派是由共產黨人所主導之《太陽》、《創造月刊》，以及「左聯」的成立，他們則宣揚「無產階級文藝」。¹⁷

至於對日抗戰時期（1937-1945），國統區與中共統治區則呈現相異的文化面貌。1938 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成立，聯合了國共兩黨作家群，象徵無產階級文學、自由主義文學、民族主義文學的大融合，其文學特徵為：報告文學和英雄式愛國主義的興起、以及對現實生活的關注。¹⁸中共統治區文學異於國統區文學之處，主要是文學的大眾化，以及對「紅色政權」的謳歌，寫作題材主要是社會中的「新人」（農民、士兵、幹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其「經典」。

1949 年中共建政初期，便開始模仿蘇聯模式建立各式專業協會，將知識份子組織並納入協會之中。中共成立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將文藝工作者盡納其中，其下尚有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諸如此類。中共統治下的知識份子，被組織進共黨政權的「單位細胞」內，其工作、生活、社會福利皆與「單位」脫離不了關係，「單位」的權力又為各級黨委所掌控，在中共黨內權力集中的原則下，黨的負責人實際上掌管一切權力（行政、業務、司法），形成從上而下的「家長制」統治體制。¹⁹總之，

¹⁶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2009），頁 157-158。

¹⁷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2004），頁 207-209。

¹⁸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 484-485。

¹⁹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2004），頁 57-62。

中共建政後的知識份子，在中共全面控制和「工具化」的意圖下，其獨立性開始面臨挑戰。

參 「胡風事件」與胡風研究

以胡風為主題的人物研究，始自 1980 年代中共中央為胡風事件平反以後。最初進入此一領域的研究者，大多集中探討胡風的文藝思想，乃因其相對不具政治敏感。²⁰然而對於「胡風事件」的政治意涵以及事件中毛澤東所扮演之角色，則甚少論及。

一 文藝思想、文藝理論的衝突

「胡風事件」長久以來被稱作「冤案」，也被視為中共開啟「文字獄」的先例，對當時知識分子影響頗深。²¹胡風究竟何冤之有？對於胡風研究者而言，探究胡風事件的成因確實難以迴避。

回顧先前研究，過去的研究者多半會從「宗派因素」²²和「文藝理論因素」此兩種面向切入，藉此說明胡風所以被整是其來有自。所謂「宗派因素」，即回首胡風與周揚、何其芳等人在以往歷史中所發生的論爭和衝突，從個人層面的好惡出發，以及左聯內部宗派間的權力鬥爭，形成胡風事件發生的遠因；而「文藝理論因素」則是從文藝理論、寫作觀點等層面，分析胡風自身的文藝觀，和毛澤東、周揚所代表的「中共官方文藝觀點」（以下簡稱「黨文化觀」），兩者間存在之分歧和緊張關係，由此論證胡風事件背後的理論衝突。

²⁰ 此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大致如下：徐文玉《胡風文藝思想論稿》、尚延齡《胡風文藝思想新論》、梁震儒和顧榮佳編《披荊治林者的足跡》、文振庭和范際燕編《胡風論集》等。參見王麗麗《在文藝與意識型態之間：胡風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1-3。

²¹ 由於胡風事件明顯是由文藝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1988 年中共中央第三次平反的報告說明：「胡風事件並無犯罪行為，因此撤銷其政治、文藝思想、宗派問題等方面的指控。」胡風事件至此徹底平反。參見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89），頁 495-496。

²² 大陸學界所稱「宗派主義」一詞，義同於台灣的「派系主義」（factionalism），後文將統一使用「宗派主義」。

之所以形成上述兩種分析模式，主要來自於中共官方對胡風事件的認知。中共官方對胡風事件的論述，像是批評胡風和中共在文藝思想上的「兩條路線」，以及「以胡風為首的文藝小集團」等說法，相當程度地影響了往後研究者的視角，這也是往後研究者會不約而同注意到胡風事件的「文藝性」和「集團性」的原因。

毛澤東嘗試以政治手段，指導與控制文藝理論，初見於延安整風時期。儘管延安整風包含政治、文化、黨群關係之間諸多意涵，在此只須強調整風對於知識份子「自由化」的批評，以及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體現的毛氏「黨文化」觀。整風所為何來？撇開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因素外，要「整」的正是針對當時知識份子的許多「習氣」²³，這些習性和行為並不為毛所能見容。

打擊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作風，以及徹底摸清其思想面貌，更是發動整風的重要動機之一。²⁴整風的開始，對於知識份子的思想、私人生活等層面影響極大，生活的「泛政治化」成為常態，從此知識份子頂上戴上了「轡頭」²⁵。整風時期的嘗試，也成為未來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重要「公式」。²⁶

林蘊暉認為，中國文藝界之所以存在兩種不同的文藝思想，由於雙方由於鬥爭環境、鬥爭經歷的不同，故形成思想觀念上的差異，胡風代表的是身在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而毛澤東則代表身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林氏簡析胡風所認知的現實主義創作觀點，包含「寫真實」、「主觀戰鬥精神」等概念，概括來說胡風強調的是作家的主觀能動作用。反觀中共「黨文藝觀」的形成，經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展，儼然已樹立了理論典範，其重要內

²³ 包含知識份子的思想上「自由化」、左翼文學的雜文批評傳統、行為上的「個人主義」、「不聽話、不尊重領導」、「無組織、無紀律」。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337-342。

²⁴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頁 311-314。

²⁵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頁 337。

²⁶ 關於整風的具體過程，其中包含了文件學習、個人自傳與家庭歷史的審查、批評和自我批評。除了由上而下灌輸毛氏文化觀點外，以黨和個人的角度而言，中共藉整風獲得大量人事資料，形同黨對於個人歷史、思想和行為的牢牢掌控，知識份子「割尾巴」的過程往往是刻骨銘心的。參見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頁 24-34；頁 189-192。

容包括：「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大眾服務」，側重的是文藝的工具性；而「工農兵文學」，則是強調寫作對象必須緊扣工、農、兵。在毛的眼裡，一切的文化 and 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文藝的「政治標準」優先於「藝術標準」。²⁷簡言之，毛氏的文藝觀點，看重的是文藝的「政治性」、「唯物性」和「革命性」。胡風則認為，毛氏〈講話〉所倡導的文學風格，是簡單的「機械論」與「公式」，因而造成寫作的僵化，作家對於創作、題材選擇的自由，才是他所重視的。

王麗麗也認為，胡風之所以遇險，主要是碰觸了三個「地雷」：第一，胡風漠視了意識型態對其的「詢喚」；第二，其主張的文藝理論容易導致美學和意識型態的還原，因而在實際政治效果上，與主流文壇南轅北轍；第三，其具體組織文藝運動的方式亦潛藏危機。²⁸王氏回顧了胡風和黨文藝官僚（周揚、何其芳）的歷史論爭，認為兩派之間的爭議不僅是因個人意氣，而是源自兩個理論體系間的衝突。此外，王氏藉由分析三次文學上的論爭，說明胡風與左翼人士的論爭，始於學術討論，而其結果則是政治性的。胡風所對抗的文藝理論，隨後被毛澤東的〈講話〉列為「正統」，因此往後對胡風「屢次對抗〈講話〉的文藝方針」的指控，也變得其來有自。²⁹王氏的論點，大體不脫文藝上的「兩條路線」分析，她所提到的胡風一派的組織方式，即文藝的「集團性質」，勢必觸動中共政治上的敏感神經。

若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看，溫儒敏則提出，胡風與毛澤東對於「現實主義」具有不同的認知，胡風重主觀與體驗的現實主義，與毛澤東在〈講話〉中所論及的文藝思想，應分屬兩種寫實主義理論體系。胡與毛的差異，在於胡重視的是「真實」、「歷史」和「具體」的寫作方式，而毛則是重視寫實主義的「理想化」。³⁰在溫氏的脈絡下，筆者以為毛對寫實主義的理解，實則傾向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寫作目的，並非是為了揭發陰暗

²⁷ 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 496-498。

²⁸ 王麗麗，《在文藝與意識型態之間：胡風研究》，頁 13。

²⁹ 王麗麗，〈胡風與文學意識型態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論爭為中心（下）〉，《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期第 16 卷（海南：2003），頁 73-78。

³⁰ 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頁 187。

面，而是強調寫作的「政治性」和「工具性」，塑造正面形象各種「典型」，以宣揚革命的理想與光明。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研究者大多認同，胡風與毛澤東的文藝理論和觀點有所歧異，但文藝問題是否為造成胡風事件之主因，則難以肯定。若詳察胡風事件發展的過程，之所以從「文藝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顯然非文藝觀點能全然解釋。³¹

既然文藝觀點無法全然解釋胡風事件的成因，後繼研究者便開始關注文藝界內部的鬥爭，中國文藝界長久以來就存在「宗派」情節，回顧胡風與左翼文壇人士的人際關係，研究者多會注意到魯迅、胡風一派與中共文藝幹部間的恩怨和論爭，回首左聯成立的歷史，堪稱是左翼文壇的宗派鬥爭史。翟志成認為，中共看待文藝的指導思想，即視之為政爭黨爭的工具，具體方法則是聯合並組織左翼作家，使之成為中共的「文化軍隊」。而魯迅、胡風一派，為了反抗中共對文藝界的操縱，以及爭取更多創作、思想自由，進行了各種形式的「反控制」鬥爭。³²歷史上胡風和中共文藝幹部（周揚、林默涵、何其芳等人）曾有多次論爭和筆戰，如 1930 年代的「兩個口號論爭」³³和 1940 年代的「民族形式論爭」，在翟氏看來都是胡風「反控制」的具體作為。

二 宗派（派系）因素與個人因素

談到「胡風事件」的原委，較為完整的紀錄應是李輝的《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李輝親自訪談諸多「胡風份子」，並輔以中共官方文件，試圖給予「胡風事件」一完整之面貌。李氏以知識份子的角度（特別是胡風一類的國統區知識份子）看待此事件，認為 1949 年以前胡風與周揚的論爭，夾雜派系鬥爭的因素，無疑是造成「胡風事件」的重要原因，但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一錘定音」的角色。總之，李氏大體未脫「宗派鬥爭」的角度，但更為強

³¹ 周玉山，《大陸文學與歷史》（台北：東大，2004），頁 25-27。

³² 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 1-9。

³³ 即周揚主張「國防文學」口號，魯迅、胡風則主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雙方因而發生論爭。

調毛澤東的角色，且其筆法近似報導文學，對於涉入「胡風事件」的知識份子更是充滿同情。

若將「胡風事件」的形成，推及個人層面，就不能不注意到毛澤東的關鍵角色。從延安時期至建政初期，不論在高層政治還是文藝等面向，毛澤東堪稱逐步邁向權力的頂峰。中共建政以後，從批評《武訓傳》和批評俞平伯「紅學」等事件的過程中，皆不難看到毛主席、介入的痕跡。《人民日報》、《文藝報》上刊載的評論員文章和〈編者按語〉，更不時顯露政治鬥爭的風向。從目前資料可以看到，建政前毛澤東和胡風的私人來往稱不上密切。毛身在延安，而胡則長期身處國統區的重慶，毛、胡之間曾有三次短暫的碰面，但未有深入的交談。周正章曾評論毛澤東、周恩來和胡風間的關係，他認為胡風對於毛澤東、周恩來間的主從關係似乎不甚理解，胡風單純地以為與周談話，便能助其解決組織和工作上的問題。殊不知，真正具有決定權的是毛澤東，而毛是從「階級鬥爭」的概念來看待他的問題。³⁴

毛澤東無疑是「胡風事件」的主導者。據時任《文藝報》編輯的康濯回憶，起初毛對他所寫的〈編者按〉並不滿意，後來在《人民日報》上所看到的〈編者按〉為毛親撰，口氣乃轉嚴峻。³⁵其後，毛將舒蕪〈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此為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第一批材料）的篇名由「小集團」改為「反黨集團」，至此將批胡的論調提升至「反黨」的高度，且胡風最終被定性為「反革命」，亦來自於毛澤東的親手批示。³⁶

至於舒蕪，則是促使事件急轉直下的催化劑。舒早年為一思想進步青年作家，寫作方面頗受胡風之提拔，與胡私交密切，故長期被視作胡風一派。曾於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上發表〈論主觀〉一文，因為文中觀點使胡風與中共黨員作家爭論不休。舒蕪最為後人所非議的行為，是他將與胡風來往的私人信

³⁴ 周正章，《笑談俱往：魯迅胡風周揚及其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2009），頁198-199。

³⁵ 胡風〈我的自我批判〉一文的〈編者按〉為毛澤東所著，毛在文中嚴詞指責，胡風及其所領導的文藝集團，老早便與人民、共產黨敵對，毛並質疑胡風私信中所用的語言，與國民黨特務幾無二致。胡風，〈我的自我批判〉、〈編者按〉，《人民日報》（北京），1955年5月13日，第2版。

³⁶ 陳清泉、宋廣渭著，《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399。

件交予《人民日報》一位編輯，轉呈至中共文藝幹部林默涵手中，其後舒蕪並依林所擬之大綱，改寫為〈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一文，最終呈至毛澤東面前。³⁷故有學者認為，此乃事件急轉直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於舒蕪「交信」的始末尚難釐清，目前僅能依靠當事人的回憶。³⁸

三 思想史視角

研究者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觀察胡風事件，即重新審視胡風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的貢獻和地位。錢理群以「五四傳統的歷史承擔」這一命題來看待胡風，錢氏認為：在 1930 年代出現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使五四文學「反帝」、「反封建」性質發生動搖的情況下，胡風堅持了五四文學的民主主義傳統；在「抗日救亡」成為中心口號的歷史條件下，胡風繼承和發揚了五四反封建的啟蒙傳統；在知識份子與人民的關係上，胡風更側重於知識份子的啟蒙作用。³⁹錢氏筆下的「五四傳統」意即民族自我批判、反封建傳統，這也說明胡風所堅持的「魯迅精神」，也就是「批判的傳統」。

林賢治則是嘗試從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環境，反思 1949 年以後知識份子的精神生活與人格，並分析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重要議題——「組織化」。林氏指出，自中共建政後，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產生一種現象，即知識分子的「組織化」。「組織化」的基礎建立在單位制、人事檔案管理、街道管理、各式協會等，黨組織深入知識分子的個人生活。就中共的認知而言，組織化生活固然為群眾性政治運動的基礎，然而組織化生活與知識分子的批判性、獨立性是相衝突的，因而形成集體與個人間的緊張關係。⁴⁰最終林氏提出的問題亦值得思考，五四時所崇尚的個性、自由、民主、科學、價值重估、偶像破壞種種價值，

³⁷ 舒蕪，〈第一批胡風材料發表前後〉，收錄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北京：北京十月文藝，2000），頁 561。

³⁸ 關於舒蕪「交信」事件的始末，相關當事人的回憶可參照：林默涵〈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舒蕪〈第一批胡風材料發表前後〉、梅志〈歷史的真實〉，上述三篇文章，皆收錄於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以及許福蘆，《舒蕪口述自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一書。

³⁹ 錢理群，《胡風與五四文學傳統》，《文學評論》，第 5 期（北京：1988）。

⁴⁰ 林賢治，〈胡風「集團」案：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與精神事件〉，收於《五四之魂：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171-172。

為何最終卻蕩然無存？知識份子的獨立思考和批評何以消失？深受中國傳統影響的當代知識份子，終究無法自外於政治與權威。

第三節 研究方法

自五四運動以降，西方多元思潮（諸如「民主」、「科學」、「反傳統」、「反權威」等思想）開始湧入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展現救亡圖存的心態。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列主義引進中國，為何迅速讓知識分子出現「左傾」的情況？筆者認為在討論胡風個人之前，應先概觀地理解當時整體的社會、文化氛圍，進而討論個人思想的演變。王汎森曾提到「人群學」（prosopography）的概念，可運用於現代中國人物研究，意即在大環境的劇變之下，以個人生命歷程（life course）為例，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人生道路的安排、職業軌跡的設計都產生劇烈變化，他們不再遵循傳統的人生軌跡（如科舉功名），進而形成近代中國的「自由流動資源」。⁴¹循「人群學」和生命史的角度，胡風和「胡風份子」此一群體的生命歷程，除「知識份子的苦難」觀點外，是否還有其他命題有待討論？

筆者以為，欲研究胡風其人，應將胡風的個人生命歷程列於首位，參酌當時的時空脈絡與侷限性，方能較為貼近胡風的思維，不致將其作品支解為片段的理解。此外，從近代至現代思想史發展之歷程來看，「線性史觀」⁴²（或「進步史觀」）仍相當的影響力，然而此觀點常具「排他的」、「唯一的」⁴³等特質，故討論思想發展時，應盡量避免以「昨非而今是」此種理解方式。

⁴¹ 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台北：聯經，2007），頁 ii。

⁴² 引述王汎森說法：「『線性歷史觀』相對於循環或退化式的歷史觀，它認為歷史發展是線性的、有意志的、導向某一目標的、或是向上的、不會重複的、前進而不逆轉的。」見王汎森，〈近代中國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19：2（台北，2008.6），頁 2。

⁴³ 「線性史觀」常具排他性、唯一性等特點，以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為例，胡設定白話文為文體進化的頂點，再倒溯回去選取有關的材料來形成這個進化的系譜；胡亦斷言白話文和其他文體的關係是前者取代後者。見王汎森，〈近代中國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頁 41。

本文採「文獻分析法」，研究資料則以胡風著作為主體，依時序分析各時期胡風思想的演變。目前關於胡風本人的一手資料，當屬湖北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胡風全集》最為完整，其中收錄了他的詩、評論、雜文、書信、日記、回憶錄等，以分析胡風思想而言，應以雜文與評論較為重要，因雜文具有時效性、社會批判性和文學性等特質。此外，胡風家人、友人所出版之回憶錄，諸如妻子梅志所著《往事如烟：胡風沉冤錄》⁴⁴，女兒曉風的《九死未悔：胡風傳》⁴⁵，詳述胡風的生平事蹟，和其入獄後的心境變化。曉風所編之《我與胡風》⁴⁶，收錄大量「胡風份子」的回憶文章，亦可作人物的側面觀察。季羨林所編之《枝蔓叢叢的回憶》，則收錄 1980 年代「胡風事件」平反後，當事人（胡風、舒蕪、林默涵、康濯）所發表的回憶文章，對於「事件」發生之過程有詳細記載，亦可觀察多年之後當事人心境的變化。

除了胡風的個人心理探究外，本文旨在聚焦於胡風事件。現今關於胡風事件的一手資料，能夠看到的並不算多。中共官方出版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⁴⁷，可以觀察在胡風事件定性後，中共中央對此案的態度，以及其後的全國性政治調查是如何進行的。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⁴⁸和《毛澤東傳》⁴⁹中，則可看到毛澤東的手稿、批示等，進一步確認毛乃是胡風案的主要決策者。然而，關於胡風事件在中共內部的政治過程，目前並無官方檔案、文件的公佈可供查證。季羨林的《枝蔓叢叢的回憶》，收錄了二位相當重要的事件參與者，分別是任職於中宣部的林默涵和《文藝報》編委康濯，他們的回憶文章，可資補充決策過程的諸多細節。

⁴⁴ 此書附錄之〈胡風年表簡編〉，可供研究者參考。見梅志，《往事如烟：胡風沉冤錄》（台北：曉園出版，1990），頁 385-428。

⁴⁵ 曉風，《九死未悔：胡風傳》（台北：業強出版，1996）。

⁴⁶ 曉風編，《我與胡風》（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

⁴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1992），第一卷至第三卷。

⁴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1991），第五冊。

⁴⁹ 逢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2007），共六冊。

第四節 研究架構

第壹章為導論。

第貳章「胡風的人生歷程」。第一節敘述青年胡風入城就讀中學、大學最終棄學返鄉，此時期胡風開始接納「進步」思想並接觸社會運動。本節將分析此時胡風的心路歷程，以及同儕間所發揮的影響力。之後胡風留學日本，開始接觸各式社會主義思潮，並參與「左聯」東京支部的活動。筆者將分析胡風在日本的學、思經歷，以及其思想左轉的經過。第二節為「人生中期（1933-1949）」，敘述胡風自日本返抵上海，以寫作為業，政治生活方面，接下「左聯」宣傳部長之職，與周揚等中共文藝幹部開始實際工作上之往來，並擔任中共和魯迅之間的聯絡人。胡風和魯迅的結識與來往，影響胡風思想甚深，兩人關係情同師徒，但胡風自詡繼承的「魯迅精神」，實與中共並不合拍。抗戰時期，胡風主編《七月》雜誌，足以反映國統區文學的某些特徵。此處將分析左翼文學界內部的數次論爭，胡風在文壇論爭中向為要角，他與中共黨員作家的筆戰，又會為往後帶來哪些負面效應。

第參章「踏入『新時代』（1949-1955）」。1949年知識份子進入「新中國」，首要的功課便是思想改造。第一節將以數位知識份子的案例，描繪當時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態和其變化。第二節旨在描述中共建政之初，胡風的生活狀態和心境轉折，以及胡風如何面對中共的「改造」和自我檢討。胡風的工作安排並不順遂，其原因為何？第三節分析中共文藝政策的演變。在中共文藝政策逐漸收縮下，胡風和其友人的生活、工作處境更為嚴苛，發表、出版等公開發言權漸受剝奪，這也為後來胡風上書中央留下伏筆。

第肆章「再探胡風事件」。第一節旨在敘述「胡風事件」的發展和轉折，最終獲得平反的過程，進而分析胡風上書何以未能見容於中共。第二節「胡風事件」溯源，旨在論述事件的成因為何。此外，胡風的「反黨材料」被一再地「創造」，筆者將分析政治力介入其中的過程，特別是毛澤東所扮演之關鍵角色。

第伍章結論。本章為筆者的研究心得，簡析毛氏專權、過度強調「意圖倫理」、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等現象，和其為當代中國所帶來之危害。最後是本文的研究侷限與前瞻。





第貳章 胡風的人生歷程

一個人的生命歷程，相當複雜，非三言兩語所能道盡。本章簡述胡風的生命歷程，分析青年胡風親左思想的形成，以及個人性格的特質，做為討論胡風事件的準備。

第一節 青年時期

壹 童年生活與家庭經濟狀況

據胡風家人所編〈胡風生平年表〉，胡風生於 1902 年，在湖北省蘄春縣赤東湖畔中窯。胡風的父親名叫張濟發，胡父張濟發育有四子：大哥張名山、二哥張名梯、張光人（胡風）排行第三、四弟張學仁。

在談胡風的幼年生活之前，先簡述胡風的家庭經濟情況。胡風在其自傳性質的文章〈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中，曾描述其家世：

聽說原來是個富有的「世家」，但到了早死的祖父的前一代就已經衰落了。孤兒的父親與母親（一個窮苦的農民的女兒）結婚的時候，當天就得向鄰居借米。那以後是夫妻二人長年間做豆腐手藝的勞動。但到了我能夠有記憶的時候，兩個哥哥都成年了的家境，已經稍稍寬裕了。大哥是個能幹的做麵食的手藝人，二哥是一個勤勞的佃農。父親性情剛直，治家非常嚴厲。母親是一個心腸慈善而多感的女人，對於窮苦的鄰舍和親戚，總是偷偷地給予幫助；由於長年的艱苦的勞動和營養不良，害了貧血病，常常忽然間陷入意識迷糊的狀態。

因為勞動的人手不夠，在童年時代我做著牧牛，看守稻子一類的事情。到了十一歲或十二歲的時候才被送進一個村學。¹

¹ 胡風，〈為一個外國刊物寫的自傳〉，《胡風全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二冊，頁 659。

胡風父親張濟發，因是家中長子，從小在母親的壓力下外出謀生，也曾做過碼頭挑夫、店鋪雜工，在累積一些資本後，才能經營一些小生意。胡風的母親，是所謂「寒門媳婦」(童養媳)，在和胡父完婚時，家庭經濟生活仍相當清苦，以賣豆腐、豆渣維生。及至胡風出生之時，張家的經濟情況已大為改善，父親已無須經手粗重工作，並開始通過經商買賣獲利。²

胡風的童年，如同一般鄉間莊稼人，在放牛、種田農事中度過。對胡風的父親一輩而言，能夠識得文字、通曉數學算帳已是相當了不起。胡風的父執輩受傳統文化影響頗深，家中若能供養出一位「讀書人」，乃是光宗耀祖之事。事實上，影響胡風父親開始認真思考，供他上學之事，乃源於一次地方上的法律糾紛。據梅志回憶，時序已進入民國初年，有鄉里之人和張濟發因「侵產」官司而對簿公堂，雖然後續成功和解，卻在父親張濟發心中留下深刻的記憶，想到家中四子無一讀書人，竟無人能看懂「傳票」，胡父遂打定主意，必須送胡風進城讀書。³

誠然，胡父支持胡風外出求學，乃基於諸多功利上的考量，如光宗耀祖、謀求官職、帶家人風光進城之類的想法；但就另一方面來說，也是因為胡風的家境實屬優渥，⁴才能支持胡風屢次轉學、投考他校，最終資助其留學日本。

貳 求學與求變：從舊學到新學

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其首要就是以學生為主的愛國主義運動，青年的愛國情緒受到鼓舞，也提高了他們的政治參與感。學者林毓生以為，五四運動帶動了青年的自我覺醒，將讀書、社會、文化銜接起來，故產生所謂「新文化運動」。林氏認為新文化運動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激烈的、整體性的反傳統思想—對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全面而整體的反抗運動，在五四時代產生了；二，在此運動下，產生了對西方文化特殊的態度。林氏指出，五四時代可以看

² 梅志，〈胡風傳〉，收錄曉風編，《梅志全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第三卷，頁3-4。

³ 梅志，〈胡風傳〉，收錄曉風編，《梅志全集》，第三卷，頁22-24。

⁴ 關於胡風家庭的經濟狀況，論者以為是逐步上升的（在胡風離家之後），張家開始從事買賣和民間借貸，迅速累積資本，在土改時期亦被劃為地主階級。參見翟志成，〈胡風與胡風集團重要成員歷略〉，《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1983），頁106-110。

到整體性反傳統主義的崛起，五四反傳統主義者將中國傳統文化視作一有機體，既然文化是一個整體，如欲改變現狀，就必須全盤推翻之，林稱之為「意識形態式」(ideological)的全盤否定傳統運動。但林氏亦指出其矛盾之處，儘管反傳統主義者宣稱全盤否定傳統，但他們在面對當下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時，還是選擇全盤借用西方思想，來解決問題，此種以「思想為根本的整體思想模式」(holistic-intellectualistic mode of thinking)的解決方案，實際上仍來自於中國傳統。⁵林氏的論點，說明當時部分知識份子對於「傳統」態度的矛盾，一方面反對傳統，另一方面卻難以完全擺脫傳統的思維模式，期望藉一舉改變思想以竟全功。

以上所述，可以略知部份知識青年對待「傳統」的態度。回到胡風身上來說，五四這年胡風 17 歲（還未上中學），比之五四的「大學生世代」⁶（已是新文化運動健將），尚有年紀、知識上的落差，從胡風的求學歷程，還是能看到他與「傳統」的拉扯。

胡風在村學讀過幾年私塾，之後入城就讀一所公立小學（蘄春小學堂），但仍得不到學習上之滿足。1921 年胡風考取武昌的啓黃中學，在啓黃中學的日子，他是這樣回憶：

僅僅憑了一點國文的程度由一個閉塞的小縣城跑到武昌被 C 中學錄為備取生的時候，已是五四運動的兩年以後了。為什麼一定要反抗家庭，跑出來考中學，現在已經不能夠詳細地回憶。但當時對於一般以「法政專門」為唯一志願的地主少爺們有了強烈的反感，在專門教《左傳》、《古文辭類纂》的小學裡面又住不下去了，只是隱約地想著有更明亮

⁵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1983），頁 130-136。

⁶ 林毓生曾歸納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反傳統思想」的歷史進程：第一代知識份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此時引進西方自由民主觀念，他們並不十分了解民主的內涵，重點在於富國強兵；第二代知識份子：五四時代的老師輩如胡適、陳獨秀、魯迅等，當時的主流是激烈的反傳統思想；第三代知識份子：五四時代的學生輩如周恩來、毛澤東、傅斯年等，他們或有左、右派的分野，但皆主張以意識形態 (ideology) 來打倒帝國主義，其具體作法就是運用意識形態組織「革命政黨」。「反傳統思想」雖源自第一代知識份子如譚嗣同反「三綱」，但還未達到整體性 (holistic) 反抗的程度。參見林毓生，《思想與人物》，頁 233；林毓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頁 208-214。

的地方，因而跑了出來罷了。然而，雖然跑了出來，不過是在平裝的選本古文之外再加上了一些更繁重的課目，和那些成天在外面結交的小政客的前輩和喝著白開水說英語的同學總不能合在一起。除了課本和同族的 S 君之外，幾乎只能夠悄悄地在操場邊的小山爬上爬下。就在這個時候，不曉得是因了什麼偶然的機會（學校裡是沒有圖書館的），我接觸了雜誌和新書。

我讀著《嘗試集》，也讀著《女神之再生》，讀著《嚮導》，也讀著《努力週報》……但使我真正接近了文學也接近了人生的卻是兩本不大被人知道的小書：《湖畔詩集》和王統照的《一葉》。前者教給了我被五四運動喚醒了「自我」的年輕人的感覺，救出了我被周圍的生活圍住了的心情；後者所吐出的幻滅後的嘆息，恰恰提醒了我在生活裡追求著什麼的意識，使我很久地感到無名的悵惘。⁷

為何反抗家庭出外求學？胡風自述無法詳細的回憶，但是他對「地主少爺」以及專教古文的傳統小學，都心存反感。也許受到時代「懷疑傳統」思想的影響，他對傳統「舊學」沒有任何興趣，對於「新學」中熱門的法律、政治亦存反感。至於他究竟追求或者反抗什麼？可能胡風此時還未有答案。

儘管外在條件匱乏，學校中也沒有圖書館，胡風開始廣泛地閱讀，也開始接觸文學作品和「新書」，使他的心靈得到紓解和啟發。他參與武漢當地的互助社活動和閱讀《武漢評論》雜誌，帶給他不同的思維。於是，胡風也開始關注工人問題，愛國主義的思想也逐漸萌芽。1923年2月4日，當時京漢鐵路受英國帝國主義、中國軍閥的控制，鐵路工人為爭取組織工會的自由，而進行罷工抗議，是為「京漢鐵路大罷工」。2月7日，北洋軍閥吳佩孚進行軍事鎮壓，中共史稱「二七慘案」。胡風內心深受此事件的影響，於是動筆寫下以受迫害工人家屬為題材的小說《兩個分工會的代表》，投稿上海《民國日報》並獲發表。這可看作是胡風首次為工人處境發聲，開始關注社會問題，心中的革命意識亦漸萌芽。

⁷ 胡風，〈理想主義者時代的回憶〉，《胡風全集》，第二冊，頁268。

「二七慘案」後，胡風和友人相約投考，轉學進入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學，此時胡風和友人們還開始籌組社團「新蘄春學會」，並出版刊物《新蘄春》學報。1924年，胡風在學長宛希儼的介紹下，加入了共青團，開始初步接觸組織生活和社會主義理論。學者曾論，在「五四運動」後在思想界有一發展趨勢，由於歐戰後巴黎和會對中國處置的不公，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背景漸廣為人知，知識界從崇尚歐美文化思想，開始轉向崇拜社會主義。此外，知識份子對於現實政治中軍閥干政的情形，亦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滿。⁸胡風和同鄉友人出版之《新蘄春》雜誌，似可印證此一潮流。《新蘄春》旨在評論縣內的政情和經濟狀況，在思想上，宣傳婦女解放、婚姻自由等觀念，批評封建禮教等舊思維。在政治上，批評軍閥統治的缺失，並歌頌蘇聯和廣東革命政府的訊息等。在創作方面，胡風也寫過文章〈改進湖北教育的討論〉，與現實社會問題產生了聯繫，可以說，胡風有著當代青年的某些共同特徵：崇尚新思維、不安於現狀。

青年時期的胡風，開始對現實生活投入更多關注和批判。胡風一方面開始參與學生運動，另一方面也崇尚戀愛至上和藝術至上主義。在多元思潮的衝擊下，茅塞初開的胡風，其實在價值信仰上仍處於混亂的狀態，胡風形容他「腦袋擾成了混然一片」。⁹大概可以這樣說，此時胡風的思想，仍未有一明確的思想體系。如同前述，他對政治、社會及國家等議題，抱持高度參與感，可能是時代青年的共性之一。

胡風的求學歷程可謂一波三折。1925年發生「五卅慘案」，胡風參與了聲援上海工人的遊行運動，因此學校受到省政府方面的壓力，要求處分學生中的積極份子。是故，胡風自動退學，轉和友人相約投考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而最後選擇就讀清大英文科。1926年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在國民革命軍攻克湖北以後，方翰、朱企霞等一批「新蘄春學會」的同鄉同學，力邀胡風回鄉參加宣傳工作。胡風心動了，於是便暫棄學業返鄉「搞革命」。

⁸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上冊，頁64-67。

⁹ 參見翟志成，〈胡風與胡風集團重要成員略歷〉，《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116。

1926年胡風返鄉後，進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工作，可說是胡風真正實際參與政治活動（此前胡僅參與過共青團活動）。是時為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1922-1927），湖北省黨部主要為國民黨左派李漢俊、鄧初民等人所控制，但他們接受中共董必武、李富春的指示，留在政府內以合法身分作掩護，暗中擴張共黨勢力。鄧初民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部長，胡風便在其下宣傳科任事，同在湖北省黨部工作的朋友，尚有中共黨員詹大星、陳力、胡緘三，以及當時未入共黨的方翰等人。胡風他們在打「土豪劣紳」的過程中，槍斃了蘄春縣商會會長。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於上海發動「清黨」（中共稱之「四一二政變」），國共合作宣告破局。其後，胡風這群左派青年，便開始四處逃亡。胡風為避禍而逃往江西，為了隱蔽其身分，他甚至還參加了國民黨在江西剿共的政治工作，也由於這段不甚光彩的「黑歷史」，成為胡風難以解釋清楚的歷史問題，在胡風事件中更被視作「反革命」的重要罪證之一。¹⁰

綜觀胡風從小至大學的求學生涯，以及棄學返鄉參加革命等作為，胡風自己形容為「理想主義者的年代」，可見其不切實際。就整體革命形勢來說，此時期中共在南方的「革命」屢遭挫折，中共方面錯估工人的革命能量和作用，而胡風等左翼學生儘管對革命充斥熱情和理想，終究難抵現實政治的殘酷，在各地國民黨響應「清共」後，胡風等人面臨人身安全的威脅，只能選擇隱蔽或逃亡。

¹⁰ 在中共全面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時，專案組認定《反共日刊》上的一篇〈反共宣傳大綱〉為胡風所寫，後來也成為判刑的主要依據之一。事隔多年，梅志仍在回憶文章中為胡風的「政治歷史問題」多所澄清，梅志認為胡風之所以承認撰文一事，是因為專案組的「逼、供、信」作法。參見梅志，〈歷史的真實〉，季羨林編，《枝蔓叢叢的回憶》（北京：北京十月文藝，2001），頁566-567。筆者以為，上述僅為梅志單方面之說法，其真實性仍有待釐清，不宜盡信。

第二節 人生中期（1933-1949）

胡風逃離武漢後，還是必須面對工作、生活著落等現實問題，他曾試過在上海賣文為生，但心裡還是亟感空虛、苦悶，在友人的引薦下，胡風也在江蘇南通中學當過國文教師。由於一直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這段時期可說是胡風人生職業的探索期，最後在朋友的邀約和家人的經濟支持下，胡風決定留學日本。

壹 負笈日本：左翼思想萌芽

1929年，胡風赴日留學，經過短期語言學校的訓練，考入慶應大學英文科。在創作上，胡風一面學習日文，一面嘗試翻譯著作，他開始使用筆名「谷非」，翻譯著作《在彼得格勒的美國鬼子》，逐步成名於中國留學生圈和文壇。值得注意的是，胡風參加了日本左翼文人集團所舉辦的「藝術學研究會」，初步認識左翼思潮和理論，期間胡風結識了許多日本友人，包括「普羅文化聯盟」的黨組負責人池田壽夫。所謂「普羅文學」，其源由便是俄國革命的餘韻，「普羅」一詞為「無產階級」(proletariat)之音譯，意指無產階級的大眾文學。

以下先簡述左翼文化的源流。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憑藉其革命的經驗，對外輸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觀點，其內容除了政治革命，亦包含文學革命。1928年，蘇聯在莫斯科和哈爾科夫先後召開了「世界革命作家大會」，成立「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擴展其宣傳攻勢，中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簡稱「左聯」）即是此聯盟的成員之一，「左聯」實際上也是國際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一環。¹¹

「五四」文學革命後的中國文壇，正處百家爭鳴之勢，多元西方思潮進入中國，此時文壇可說是各式文學社團林立。其中有一支派，親近左派思想的青年，與中共在思想上相呼應，積極推動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於是1930年3月組織成立「左聯」，並尊魯迅為其首。「左聯」的文學觀點，深受當時蘇聯和日

¹¹ 周玉山，《大陸文藝新探》（台北：東大，1984），頁81。

本等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影響，像是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化派」和文學組織「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中文音譯簡稱「拉普」）的影響，其主要論點為「文藝組織生活」和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的強調。¹²

此時胡風除接觸日本的普羅文學和馬克思主義，同時也關心中國國內左翼文化的發展。談到胡風的政治活動，首先他參加了「左聯」的東京支部，與馮雪峰建立通信關係，並接受其指導。¹³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胡風和許多中國留學生同感憤慨，愛國情緒昂揚，胡風先是加入日本反戰同盟，爾後加入日共地下黨。胡風在日共的實際工作，主要是反對日本的侵略，並「喚起中國人民和日本無產階級共同戰鬥的國際主義覺悟」，他們成立「新興文化研究會」，也出版刊物《新興文化》。¹⁴

但是他們的政治活動，受到日本警方的關注。1933年，胡風被日本警方逮捕，審訊、拘留達三個多月，最後因未能探查出有關日共的細節，日警方將胡風等一批留學生驅逐出境、遣返上海。

貳 「左聯」時期：初涉政治與職業寫作

前已提到「左聯」的成立，此處簡述「左聯」的活動情況，「左聯」表面雖尊魯迅為精神領袖，然實際上為中共黨組織所領導。¹⁵要言之，中共既期許「左聯」成為對抗國民黨的文化陣線，進一步收攏左派作家；另一方面，「左聯」實際上服膺於共產國際，是國際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一環。「左聯」在成立之時，經大會通過了〈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等文件，¹⁶從其內容可得

¹²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2001），頁210-212。

¹³ 梅志，〈胡風傳〉，收《梅志全集》，第三卷，頁75。

¹⁴ 梅志，〈胡風傳〉，收《梅志全集》，頁158-177。

¹⁵ 中共在「左聯」內設有黨團，歷任書記包括：馮乃超、陽翰笙、錢杏邨、馮雪峰、葉林、周揚、夏衍、洪靈菲、柔石、田漢、胡也頻等。並在左聯上置領導機關「文總」（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和「文委」（屬中宣部下轄之機構），其中一套人馬、兩塊招牌，顯示中共對「左聯」的主導性。見周玉山，《大陸文藝新探》，頁96-97。

¹⁶ 〈行動綱領〉的要點：一，我們文學運動的目的，在求新興階級的解放；二，反對一切對我們的運動的壓迫。而其工作方針為：一，吸收國內外新興文學的經驗，以及擴大我們的運動，要建立種種研究的組織；二，幫助新作家的文學的訓練，並提拔工農作家；三，確定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及批評理論；四，出版機關及叢書小叢書等；五，從事產生新興階級文學的作品。見周玉山，《大陸文藝新探》，頁87-88。

知，多半照搬蘇聯「拉普」的共產主義教條。此外，「左聯」還成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會，積極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和蘇聯文學作品進入中國，在「文藝大眾化」、「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等方針下，形成一股重要的左翼文學派別。

胡風在日本時期就已加入「左聯」，遣返回國後，周揚要求胡擔任「左聯」的宣傳部長（周揚自任組織部長和中共黨團書記），胡風實際負責宣傳的工作。胡風在宣傳部設立三個研究會：理論研究會、詩歌研究會、小說研究會，並出版內部刊物《文學生活》。此外，胡風還肩負一重要任務，經中共中央特科吳奚如的委託，胡風擔任中共和魯迅間的「機要交通員」，負責中共與魯迅的聯繫工作，這段關係直至 1936 年 4 月下旬，馮雪峰由陝北返抵上海後，由馮直接聯繫魯迅，方結束這項任務。¹⁷

胡風和魯迅的交往，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1934 年至 1936 年 10 月 19 日魯迅逝世，胡風和魯迅間的往來相當密切，據研究者統計，《魯迅日記》中魯迅和胡風的來往次數達 121 次（包含書信往來、拜訪、聚會），儘管數字未必能體現交情，但多少能呈現雙方來往之頻繁。¹⁸

1930 至 1940 年代，是胡風文學理論的量產期，著作數量頗豐。¹⁹胡風尊魯迅為其文學理論的導師，將自己之前所接受的左派文學理論，結合魯迅雜文所體現的批判現實主義，成為其自身理論的基礎。1936 年 10 月魯迅病逝，胡風參加「魯迅治喪委員會」，並被託付起草訃文，沉浸在深沉的哀痛中。胡風被列為「魯迅紀念委員會」的顧問，並參與《大魯迅全集》（《魯迅全集》日文

¹⁷ 胡風自述：「吳奚如說，1936 年，我是中央特科和魯迅之間的交通員。但據我的記憶，當時吳是在中央軍委工作的（也許特科是屬中央軍委的），我是必要時才向魯迅傳達黨的要求，沒有明確具體的工作任務，如交通員。」見胡風，〈答陳漱渝〉，《魯迅研究動態》，1981 年第 4 期；吳奚如的回憶文章亦提及此事。參見曉風編，《我與胡風》（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上冊，頁 20。

¹⁸ 魯迅和胡風的往來，除「左聯」的公事往來外，也有互相書信贈書、家庭聚會等私人活動，胡風還為魯迅作壽，可見其私交甚篤。參見周正章，〈魯迅日記中的胡風〉，《笑談俱往：魯迅、胡風、周揚及其他》（台北：秀威資訊，2009），頁 152-157。

¹⁹ 期間出版的評論集有：《文藝筆談》（1934-1935）、《文學與生活》（1936）、《密雲期風習小紀》（1935-1938）、《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1937-1941）、《論民族形式問題》（1940）在混亂裡面（1941-1943）、《逆流的日子》（1944-1946）、《為了明天》（1946-1948）、《論現實主義的路》（1948）

版)的編纂、翻譯等工作,胡風為此付出頗多精力。胡風、馮雪峰被視為魯迅弟子,胡風既有「魯迅傳人」的稱號,亦自詡繼承魯迅的批判性和抗議精神。至於「魯迅精神」對於當權者而言,是顯得如何不合時宜,此時胡風還未有認知。

參 抗戰與《七月》

1937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將中、日兩國捲入戰爭的漩渦。戰爭之於文學,向來是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主題,文學史家在描述抗戰時期文學,其共同的主要特徵是「戰爭」與「救亡」。然而隨著戰事的發展,又形成各異的地緣政治文化,即所謂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淪陷區文學等地域性差異。國統區文學的特徵,其基調便是「救亡」,從五四承襲的「啟蒙」、「個性解放」、「社會革命」等主題暫時退出主位。也由於國、共的第二次合作,昔日文學界各派作家們因而能夠暫棄前嫌,成立全國文藝抗敵協會(簡稱「文協」)²⁰,實現文學界的國共大聯合。國統區文學在文體上,「報告文學」和「通訊」是常見的體裁,因能滿足大眾所需的新聞性和紀實性。此外,各式詩歌(牆頭詩、傳單詩、槍桿詩)亦配合通俗化、大眾化的特性,以利戰時宣傳的目標。大體而言,此時期的國統區文學,強調文學的功利宣傳性質,以及現代文學和民族主義的結合。

至於解放區文學,在中共「紅色政權」的領導下,對社會結構(土地制度、地主階級)進行改革,許多從淪陷區來的文藝工作者,與當地的群眾性文藝活動相結合,成立各種文化工作社團,如西北戰地服務團、太行山劇團,除了創作演出外,也協助展開群眾文藝運動,因此培養出一批農民詩人、農民作家,他們使用純粹的民間文藝形式來創作表演。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其著名的〈講話〉,周揚、何其芳等一派中共黨員作家皆奉其為圭臬,在〈講話〉的指導下,特別是在作品題材、主題和人物描寫上,頗具鮮明的特色,作家們甚少揭露現實生活的矛盾與黑暗,取而代之的是,著重「對新

²⁰ 「文協」成立於武漢,發起人包括各方代表97人,選出周恩來、孫科、陳立夫為名譽理事。理事45人,其中有:郭沫若、茅盾、馮乃超、夏衍、胡風、田漢、丁玲、老舍、巴金、鄭振鐸、朱自清、郁達夫、朱光潛、張道藩等人,並出版會刊《抗戰文藝》。見錢理群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484。

社會新制度的讚美以及人民群眾鬥爭生活的熱情描繪」。在描寫題材上，農民、士兵、幹部成為作品中重點表現的對象，經過「翻身」、「解放」的「新人」成為文學的主角。²¹要言之，解放區文學主要集中於描寫民族鬥爭、階級鬥爭和勞動生產，其政治功利性、政策宣示等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但也誠如胡風的批評，此時期文學存在「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傾向」，作家們「廉價地發洩感情或傳達政治立場」或寫成「抗戰八股」，為了達成其政治目標，而產生種種僵化的現象。²²

胡風認為，文學必須發揮更多鼓舞的作用，用以反映抗戰中人民的熱情。在此背景下，胡風約稿蕭軍、蕭紅、艾青、田間等作家，籌畫出版《七月》雜誌。《七月》初刊於上海，淞滬戰後，胡風為避戰禍來到武漢，《七月》亦復刊於武漢。儘管處於顛沛之中，胡風在《七月》仍投注了相當大的精力與熱情，支持他的顯然是高漲的愛國情緒：

這《七月》，在目前，是頂大的也是最有內容的雜誌，為了作者們，為了讀者們，為了無數萬的英勇的戰士們正在用生命保衛它的苦難的祖國，我不能不用去我底血液撫養她。比《木屑文叢》，比《海燕》，比《工作與學習叢刊》，我更愛這《七月》，因為我編輯她的時候，有時憤激，有時流淚，有時苦惱，有時為了一篇文章底取捨要費去幾小時的考慮……²³

胡風獨身在武漢辦《七月》，中間遭遇許多困難，感情上他飽受妻子梅志的責備（因為獨留梅志在湖北老家照顧家人），僅能依靠魚雁往返維繫感情，《胡風家書》常可見到胡風對梅志吐露思念，妻子的支持無疑是胡風最重要的精神依靠。胡風在戰亂時代籌辦雜誌，其經濟上的困境更是顯而易見的，不僅雜誌經費籌措遇到困難，他的生活費也經常透支。²⁴在如此艱困的處境下，愈能體現胡風的執著。

²¹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 491。

²² 胡風，〈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胡風全集》，第二冊，頁 575-577。

²³ 曉風編，《胡風家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 37-38。

²⁴ 曉風編，《胡風家書》，頁 36、頁 42。

從文學上來說，胡風和其他文學派別，在文學理論上各有其見解。胡風可代表國統區文學流派中的一支，有學者將胡風一系作家和其文風稱作「七月派」。「七月派」主張高舉五四精神，他們的理解是崇尚個性追求，持續魯迅式的國民性批判的精神。胡風以《七月》為其文學陣地，培養許多青年作家，如路翎、艾青、阿壠、彭柏山、舒蕪等，形成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學術社群，逐步樹立其文藝界理論家的地位。

肆 文學界的論爭

在 1930 至 40 年代的中國左翼文學界，發生過多次論爭，其中不全然是文學理論之爭，可見中共介入其中的主導成份。以下舉三次論爭為例：「民族形式」論爭、「兩個口號」論爭和香港批判，胡風皆參與其中，與周揚為首的中共黨員作家時有紛爭。下文將分別探討歷次論爭，進而論證其背後的政治意義。

一 「民族形式」論爭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曾有過推廣白話文學的嘗試，文學「大眾化」是當時提出的目標之一。抗戰時期，由於宣傳之需要，文學「大眾化」問題再次引發討論，許多利用「舊形式」創作的通俗化作品大量出現。在中共領導的解放區之中，文藝工作者、作家們將其書寫和對話的對象，轉向農民，且採用農民較容易接受的傳統、民間文藝創作方式，運用各式新文體（如新章回體小說、民歌體敘事詩、新歌劇等）來創作。²⁵至於「民族形式」口號出現和其政治意涵，源自 1938 年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做〈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之報告，毛說：「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至此方確立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概念。此外毛還反對「洋八股」和教條主義，必須「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²⁶1939 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在中共的組織下，開始進行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1940 年，《新華日報》社舉辦「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國統區也

²⁵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 491-492。

²⁶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1），第二卷，頁 534。

開始「民族形式」的討論，此時論爭聚焦於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以及如何對待中外文化遺產等問題。郭沫若以〈「民族形式」商兌〉一文，主張民族形式要根植於「現實生活」，因為「民族形式的中心泉源，毫無可議的，是現實生活」。胡風則寫下〈論民族形式問題〉參加論戰，胡風企圖以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論對這場論爭加以總結。胡表面上駁斥向林冰的教條主義、公式主義，但在文中也批評了陳伯達、艾思奇、周揚、郭沫若等人的意見。胡風認為現實主義的原則是以「內容決定形式」，並指責這些參與者，僅僅抓住一個「形式」，但完全忘了「民主主義的內容」。²⁷胡風也同意，不能離開內容去獨立把握形式，民族形式應是「從生活裡面出來的」，也是「反映民族現實的新民主主義的內容所要求的、所包含的形式」。²⁸經過爭論後，儘管雙方在觀點上有共通處，但胡風「將人罵盡」的行文風格，也埋下諸多人事恩怨的種子。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以及「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等主張，可以說是毛開始重視意識形態「詮釋權」的開端。中共在其主導的左翼文學界，也大肆鼓吹「民族形式」的討論，不盡然是純文學性質的討論，部分也是基於政治宣傳上的需要，期望塑造文學界「積極響應」中共文藝宣傳的態勢。但是胡風不明究理，堅持自己所理解的馬列主義（甚或求諸原典），和多數中共黨員作家展開筆戰，實際上也破壞了中共在文學界「統一戰線」的計畫。

二 「兩個口號」論爭

1936年春，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在其刊物倡導國防文學創作，並成立文藝家協會，參加的有郭沫若、茅盾、郁達夫、葉聖陶、傅東華、鄭振鐸、徐懋庸等人。所謂「國防文學」，其實是王明路線的產物，當時中共內部國際派當道，王明為貫徹蘇聯的意志，呼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中共應在統一戰線中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在國統區主持文藝工作的周揚，便堅持王

²⁷ 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48-49。

²⁸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501。

明路線，於 1936 年春解散「左聯」，希望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建立一個容納各派系作家在內的文化統一戰線。²⁹

1936 年 4 月，馮雪峰以中央特派員的身分抵達上海，和魯迅、胡風取得聯繫，針對「國防文學」的口號，由馮雪峰創議、魯迅同意、胡風執筆，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之後胡風便發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甚麼？〉。儘管雙方口號各異，但研究者認為，在「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間，除了在「聯合」問題上有所差異外（前者認為應無條件聯合；後者認為應有條件聯合，且由左派掌權），實際上並無不同。³⁰周揚一派便對胡風發動筆戰，其中徐懋庸寄給魯迅一信，內容批評胡風的私心，並質疑胡風是「南京來的」奸細。於是魯迅參戰回應〈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表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是他所贊同的，故請胡風代筆，也因為魯迅親上火線，至此針對胡風的攻擊便暫告停歇。

在「兩個口號」論爭中，除了看到中共意欲掌控左翼文學陣營的主導權，以推行其政策路線外，還交織著左翼陣營內部，複雜的宗派情結和人事因素，魯迅、馮雪峰、胡風被視作一派，胡風和周揚間的個人恩怨，也就更為難解了。

三 「論主觀」和香港批判

1945 年 1 月，胡風在其主編的《希望》雜誌，發表舒蕪〈論主觀〉一文。也因為這篇文章，在文學界引起小規模的爭論。據林默涵回憶，〈論主觀〉和胡風的〈置身在民主的鬥爭裡面〉兩篇文章引起了中共所領導的重慶文藝界的注意。並召開針對《希望》的座談會：

於是 1945 年 1 月 25 日，由黨的文委負責人之一馮乃超主持，在郭沫若領導的文工會召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座談對《希望》雜誌文章的意見。到會的有：茅盾、邵荃麟、馮雪峰、蔡儀、胡風、何其芳、劉白羽和我等人。茅盾首先發言。他對〈論主觀〉很不贊成，提出了批

²⁹ 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 21。

³⁰ 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 22。

評意見，認為文章對大後方文藝界情況的分析不符合實際。茅盾生氣地說：洋洋幾萬言，實際上是「賣野人頭」。說完就退席了。後來馮雪峰等人講了幾句，會沒有再開下去。³¹

對於 1945 年的重慶批評，林默涵說：「只在黨領導的進步文藝界內部對胡風等人的觀點提出不同的意見，沒有在社會上公開。」中共試圖先在內部整合胡風一派的理論歧見，但顯然未能達到中共預期的效果，才會說座談會「開不下去」。

時至 1948 年，此時中共在內戰中已漸獲優勢，在文學上更有餘裕來解決理論整合的問題。於是一群移居香港的黨員作家（如邵荃麟、喬冠華等「才子集團」，受中共文委領導），再度對〈論主觀〉發動批判，也是對胡風文藝理論的清算。³²邵荃麟在香港《大眾文藝叢刊》（中共文委的機關刊物）上發表〈論主觀問題〉一文，將其對舒蕪的批評，使用「舒蕪等人」、「主觀論者」等詞彙，並將舒蕪和胡風的文學理論劃上等號，順道扣了胡風一頂「主觀論者」的帽子。³³舒蕪〈論主觀〉中的哲學理論，和胡風主張的「主觀戰鬥精神」被看作一脈相承，儘管胡風本人認為兩人在理論上仍有差異，³⁴但對於中共而言似乎並不重要，其重點在於他們同屬「胡風派」³⁵。林希便如此表示：「由批評〈論主觀〉，到確定一個『主觀論者』，繼而涉及到全部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由

³¹ 林默涵，〈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林默涵問答錄之一〉，收季羨林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 465-466。

³² 此時尚有邵荃麟〈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喬冠華〈文藝創作與主觀〉、胡繩〈評路翎的短篇小說〉等文章，這些作家實際上多為中共黨員，他們的文章不應僅視為個人意見的表達，很大程度上可體現中共黨的意見。

³³ 林希，《白色花劫：「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頁 52-53。

³⁴ 胡風未必同意舒蕪的理論觀點。胡風在多年後表示：「〈論主觀〉所強調的主觀是脫離實際的，是抽象的，片面的，是主觀主義。我所提出的『主觀戰鬥精神』是指作家在社會生活中，在創作過程中應有的愛愛仇仇的感情。通過這些主觀方面的真誠的感情來理解人物，創造人物，而絕不是主觀主義。」見胡風，〈關於《七月》和《希望》答問〉，轉引自林希，《白色花劫：「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頁 44。

³⁵ 據「胡風份子」耿庸回憶，他在 1946 年左右便聽過「胡風派」這一說法，他被歸類為胡風派，只因他在《希望》發表過文章。茅盾也在回憶中表明：「只要有人對該文（指〈論主觀〉）的觀點有所批評，就會引起一些人的反駁，而且會嗅到一股相當強烈的宗派氣味。」以上似可說明，當時左翼文學界分黨結派的情況，所謂「宗派因素」的糾紛實積怨已久。見季羨林，《枝蔓叢叢的回憶》，頁 298；頁 466-467。

此，對胡風的所謂『清算』，實質上是對原國統區文學隊伍的『清算』。³⁶從批評胡風始，終至全盤否定國統區文學，足證中共是打算如何「總結」國統區文學，以及作為國統區文學理論代表的胡風，中共正為其後大規模的批判，預作理論基礎之準備。

胡風和周揚之爭，表面上是左翼「革命陣營」內部的理論爭端，若不陷入論爭細節，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其背後實則是文學與政治關係的命題。對胡風來說，文學是關乎反映現實生活，藝術有其特殊與獨立性；對周揚、毛澤東而言，則看重文學的政治性質（「文藝為政治服務」），另須服從黨性（寫作不可揭發「革命隊伍」的陰暗面），否則便是有損於「革命」。論者有言，七月派「不是一個迎合時代政治需求的文學流派」。³⁷胡風和周揚的差異在於，胡風在文學創作上堅持己見，以及堅持理論的可討論性；周揚則是選擇服從毛式文藝觀點，並成為黨的文藝官僚。但在新政權建立後，居上位者取得了理論詮釋權和話語權，原本對等的理論論辯已不可奢求，在中共的邏輯下，胡風只能面臨「改造」或「反改造」的二元抉擇，選擇後者的結局是不言而喻的。

本章簡略回顧胡風的生平，描述胡風如何從中國傳統知識範疇，進入「新學」體系接觸西方思想，終而留學海外並接受（日本）左派思想。「五四」知識份子的共通處，在於其強烈「救亡圖存」、「強國強種」的要求，民族主義、愛國思想也滿溢於胡風的心中。時至 1930 年代至 40 年代，中國文學界也出現左、右派的論爭和分野。隨著中共逐漸擴展其政治勢力的同時，中共欲「控制」文學界，並使之為其所用的目標，亦將逐步明確。中共建政以後，將以黨為中心的「一元化領導」（思想、軍事、政治、政策、組織）推及全國。胡風未經「延安整風」、「思想改造」的洗禮，對於組織生活的紀律亦相當陌生。下一章將會談到，1949 年後胡風面臨的巨大衝擊和心理不適應。

³⁶ 林希，《白色花劫：「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頁 53。

³⁷ 周燕芬，《執守·反撥·超越：七月派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62。

第叁章 進入「新時代」（1949-1954）

對中共與知識份子間之關係，宜作簡略歷史回顧。自中共建立之初，便與知識份子關係密切，初期的領袖如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亦多為具全國知名度的知識份子。中共依循列寧之建黨理論，知識份子既作為「革命先鋒隊」和職業革命家，也是工人階級的啟蒙者、教育者，本身便具備領導無產階級的職責。然而依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知識份子屬資產階級範疇，而在「人的社會存在決定其思想意識」的理論下，知識份子的世界觀也必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此即知識份子的「原罪」。由此可見，馬列主義中對於知識份子的雙重態度，知識份子既有革命的領導作用，但本身亦背負資產階級出身的「原罪」，而馬克思、列寧也未曾在理論上處理此一問題。針對此一矛盾，翟志成便指出：列寧主義的政黨理論，其本身屬菁英主義範疇，黨的組成便是「知識份子黨」¹，中共作為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政黨，一方面以革命先鋒隊自居；另一方面卻因「原罪」思維，處處提防、敵視和整肅知識份子。²1930年代在江西蘇區的「打AB團」事件，毛澤東在肅清異己（如贛西南領導李文林：知識份子出身）的過程中，將地主、富農和知識份子相連結的邏輯，可以看到毛對知識份子的態度，具有某種激進思維成分。³

儘管在中共成立後的一段歷史過程中，知識份子在黨內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卻是複雜的。前文（第貳章第二節）曾提到1930年代「左聯」的成立，在「左聯」成立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中共黨組織和知識份子的衝突。是時，以周揚為首的「中共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

¹ 以黨員人數比例而論，中共知識份子黨員的比例一向超過全黨之半數（「一大」至「三大」期間皆是如此），「四大」以後全力發展工人黨員。至1927年「五大」召開時，工人黨員比例才超過半數，是時知識份子佔19%。以高層政治格局來說：「一大」的十二位代表皆是知識份子；「二大」時十二位代表僅項英一位工人，但未入選中委會；「三大」時中央委員九人，有三位工人，但政治局無一工人；「四大」時中央委員九人，僅項英一人入選，但還是未能進入政治局；「五大」二十七位中央委員，有六位工人，但七位政治局委員中仍無工人。由上可見，在中共成立和發展前期，黨內基本上是以知識份子為領導主體的政治格局。參見翟志成，〈中共與黨內知識份子關係之四變：1921~1949〉，《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_下期（台北：1994年6月），頁203-208。

² 翟志成，〈中共與黨內知識份子關係之四變：1921~1949〉，頁199-202。

³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13-25。

委)在「左聯」內部成立黨組，制定了嚴格的紀律規範，不僅約束黨員知識份子，也擴及左翼知識份子群體，許多人不能忍受放棄獨立性，因而退出「左聯」。此外，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周揚和魯迅、胡風的衝突，實際上是魯迅等人不滿周揚等黨員作家，試圖將知識份子的專業工作納入黨的政治軌道，只憑藉黨的授權就可充當知識界的領袖。此時中共對待知識份子，開始逐漸展現將知識份子「工具化」以便利用的傾向。⁴

1940年代的「延安整風」，中共開始嘗試運用非肉體暴力的「思想改造」，交互運用教化與強制兩種手段。在「王實味事件」中，除了王因為批評黨內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等現象，而被殺雞儆猴外，基本上中共對知識份子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取而代之的是，整風中的精讀文件，寫自傳、反省筆記、「小廣播表」，毛澤東融理論灌輸（學習文件）和暴力威懾（「肅反」、製造「特務案」）於一爐，給予知識份子黨員龐大壓力。⁵由思想層面的強迫學習，至個人私領域的重重壓迫（抽查筆記檢查思想、「小廣播」杜絕人際往來），終而公開全盤否定自我，成為「新人」。這是「延安模式」所留下的經驗。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態度，從肉體消滅到「思想改造」，終至「工具化」的歷史過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多年內戰，共產黨終奪得政權。對於一個新政權而言，如何鞏固政權是首要課題，在中共建立政權的過程中，許多人會關注於初期「五大運動」⁶的推展，探尋中共是如何從其宣稱的新民主主義階段，過渡至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從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會著重中共高層政治的路線角力，分析政策的施行和其影響，上述這套思想改造政策，亦擴及全國範圍。

然就微觀視角而言，知識份子作為人民群體之一，他們如何回應時代的變化？及至個人來說，作為革命「同路人」的胡風，他對新政權的理想、期待，與實際生活境遇間有何落差？他的心境是如何？這是筆者感興趣的地方。

⁴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77-78。

⁵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頁423。

⁶ 1950年代，中共有所謂「五大運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政治運動。

第一節 建政初期知識份子的態度

中共藉由歷次政治運動的洗禮，足以讓知識份子繃緊神經。⁷意識型態方面，新政權除了大肆灌輸各種新式價值觀（如工、農階級的優越性），黨內對知識份子的態度，「原罪論」⁸有其歷史因素，皆使他們如坐針氈、動輒得咎。就知識份子的角度而言，最初迎接新政權的態度為何？

大略來說，1940年代後期，國內的政治勢力可分為三派：左派（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右派（與國民黨關係密切）、中間派（在國、共兩黨外，採取中立者）。1949中共建立政權後，原國民黨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多數選擇離開大陸。如極言反共的傅斯年，因理念與中共相去甚遠，便選擇來台灣。留在大陸者，部分在「鎮反」、「肅反」運動中，失去工作、自由甚至生命。至於共產黨員知識份子，則從反體制者，變為新體制內逐步官僚化的知識份子。但此兩類知識份子皆屬少數，絕大多數知識份子則游離於體制之外。他們在政治上接受和擁護共黨政權，但在理念上仍堅持自由主義傳統，他們願意為國家的重建做出貢獻，但並沒有依附權力的思想準備，仍保持其獨立性。學者魏承思指出，多數知識份子之所以擁護新政權，主要出自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以及對共產黨缺乏了解，許多人在抗戰勝利後是採「中間路線」的態度，但是隨著國民黨政府在施政上面臨經濟崩潰，官員貪汙腐敗不得人心，如劉大杰、譚其驤兩位教授，便由中間派轉向左傾派。⁹

至於中立派的轉變，學者錢理群以沈從文為例，指出沈同時具備「鄉下人」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雙重身分，故其案例具有相當代表性。中共建政初

⁷ 翟志成認為，歷次政治運動對於知識份子而言，已造成巨大壓力：在「土地改革」中，斬斷知識份子家庭在農村的經濟基礎；「鎮壓反革命」則是中共使用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震懾知識份子的心靈；在「抗美援朝」中，則動輒以「漢奸」、「賣國賊」等反革命帽子，威嚇不服從的知識份子。見翟志成，〈中共與黨內知識份子關係之四變〉，頁234。

⁸ 何方分析中共長期不信任知識份子的原因，除蘇共的理論基礎外（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動搖性、無紀律性），尚有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特殊歷史情結（如毛在富田事件對富農、知識份子的態度），知識份子在思想、組織紀律、階級分析等處各有其弱點，也是其「原罪」之所在。見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2008），上冊，頁242-248。

⁹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81-82。

期，沈從文的心理狀態是異常煎熬：在政治上，沈並無明顯政黨傾向，但因沈向持反對「作家從政」、反對內戰等立場，被中共指責為右翼反動派；文學上，來自郭沫若〈斥反動文藝〉文中的批判，沈從文被打擊為「粉紅色」（指其描寫性事之露骨）的反動作家；在家庭，沈從文的兒子生於新政權，接受共黨思維，與他時有爭執，面臨親情和黨性的兩難。錢理群歸納，沈從文作為一個「中間偏右」的知識份子，與新政權之間找到三個思想上的契合點：第一，「新愛國主義」，沈原有的愛國、強國思想，結合新國家有組織、有計劃領導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沈逐步接受了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第二，「新人民觀」，由於沈是鄉下人，與社會中下階層本身具有精神上的聯繫，沈也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發現「一種新的人民典型」，這些皆與與中共所稱之「新人民」概念，有其共通的思想基礎；第三，「新唯物論」，沈雖當過教授，但他實際上並非學院派出身（未曾上過大學），和學院體制存在一定的隔閡，1949年後北大中文系也沒接納他，所以毛澤東的「新唯物論」（如反對「本本主義」、真理來自實踐等）說法，與他不謀而合。此外，沈所從事的文物、服飾研究，也不為當時「學術權威」所承認，是故沈也頗能接受毛澤東的批判思維。沈從文之對新政權的態度，有著半強迫、半自願的成分，隨著中共黨政體制的強化，強迫的成分日益增加，自願成分日漸減少，沈最終選擇沉默並「改造」自我，不復從前的那位文學家了。¹⁰

從中立轉向左派的案例，還有季羨林。建政前季羨林未加入中共（至1956年才申請入黨），讀大學時和胡喬木是同學，在學生運動的潮流中，自稱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對政治他並不十分積極。1935至1946年間，季羨林在德國攻讀博士，1946年，季返國至北大任教。所以迨中共勝利，他自己形容其心境，等同於多數未出逃台灣的知識份子，其實對共黨、共產主義並未了解，但是對國民黨政權腐敗的失望卻是肯定的。面對新政權，他談到他的適應過程：

但是我們也有一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份子的真實心情，我不了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四十歲，算是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算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

¹⁰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台北：聯經：2012），上冊，頁35-45。

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¹¹

季羨林很快便度過最初的不適，喊口號也可以喊得比別人都大聲，但是他反視自己：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¹²

季羨林只覺得自己是個百無是處的「摘桃派」，未曾在戰爭年代中拋顛瀧血，只是平白享受「解放」的好處。在國內情勢變化之際，季還在國外留學，追求自己名山事業，他自覺十分可恥。季稱最崇拜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他們是「最可愛的人」。¹³

1949年政權更迭，對於許多未參與「革命」的知識份子而言，其心態多半是複雜的。在愛國主義思想的時代潮流下，未曾投筆從戎的知識份子，沒有對戰爭（或「革命」）做出實際貢獻，多半會覺得內心慚愧。另一方面，雖然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未必皆心向共黨，但多數對國民黨政府的施政感到失望。相對於國民黨政府官僚的貪汙腐敗、執政能力低落，新成立的中共政權則

¹¹ 季羨林，《牛棚雜憶》（香港：三聯書店，1999），頁220。

¹²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220。

¹³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221。

素以紀律嚴明、清廉、體恤人民著稱，¹⁴民心之向背同樣可見諸知識份子身上，知識份子的態度從對國民黨絕望，轉向期待中共之新政權。至於「思想改造」，許多知識份子最初也未必抱持反對心態，更不乏自願接受「改造」的案例。但是在「改造」的過程中，人身自由的成份日益減少，思想控制的成份日漸增加，許多人感到難以適應，胡風便是一例。

第二節 胡風的生活和心境轉折

1948年1月6日，胡風北上進入東北解放區。同年3月，胡風又隨中共中央統戰部進駐北平。在多年戰亂之後，他和許多故舊再次重逢。然而此時周揚、丁玲等，已身為中共黨內文藝領導，地位已非同日而語。

壹 第一次「文代會」全盤否定「國統區文學」和胡風文藝思想

1949年7月2日，中共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第一次「文代會」），這是個結合解放區文藝工作者和國統區「進步」文藝工作者，展現團結以迎新政權的盛會。

然而，在第一次文代會的籌備時期，就可略見胡風和中共間的矛盾。原本，胡風被選入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其他成員為：楊翰笙、葉聖陶、馮乃超、周揚、茅盾、胡繩、黃藥眠、鍾敬文、楊晦等，從這些成員可以看到，許多人正是前述「香港批判」（見第二章第二節）的成員。當時的起草委員會，原屬意由胡風負責起草總結報告，報告關於國統區文學工作的狀況。但是胡風已經意識到，這份報告必須按照「某些人」的意見起草，若依他們的看法，則必須體現對國統區作家和作品持懷疑否定的態度。胡風便覺得不知該如何是好，若按

¹⁴ 1949年，當時還是小學生的錢理群，便親眼目睹共軍進入上海後，為不擾民而露宿街頭的情形，可見紀律之嚴明。見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頁25。

自己的看法來寫，自然要得罪人；但若按要求「吹捧些名家名人」，他又不願意，於是便「堅辭」了。¹⁵故最後是由茅盾等人，執筆國統區的總結報告。

文代會正式開始後，選出新文聯的領導班底，郭沫若為主席，茅盾、周揚為副主席，常委二十一名，胡風是八十七名委員之一。¹⁶7月4日，茅盾作了題為《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茅盾在發表報告時，附帶談到起草的情況，特別註明：「胡風先生堅辭。」茅盾在報告中介紹國統區文學，對胡風文藝思想觀點進行不點名批判，並將以路翎小說為代表的作品，列入所謂「不正確的傾向」之中。¹⁷茅盾更在報告的第三部分「文藝思想理論的發展」，專列一節來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標題為「關於文藝中主觀問題，實際上就是關於作家的立場觀點和態度的問題」：

1944年左右在重慶出現了一種強調「生命力」的思想傾向，這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禁受不住長期的黑暗與苦難生活的表現……然而有人以為革命理論的學習是足以使作家「說謊」，以為發揚作家的「主觀」才會有藝術的真實表現。他們認為既然是革命的內容，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場，如果本來沒有革命的立場，怎樣努力去學習和改造都是空的。他們以為，作家過著怎樣的生活就可以怎樣的「鬥爭」，這樣的說法在國民黨統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剝奪時，本來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但他們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眾的現實鬥爭相結合的必要。……所以這在實際上正是游離於群眾生活以外的小資產階級的幻想。¹⁸

可以想見，胡風在聽取此報告後，心中的反抗、不滿和消極情緒。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也談到會後的心得：

報告在大會提出後，國統區的代表們中間嘩然了起來。但我沒有再表示什麼。代表們不滿，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我是冷靜地看明白了：這個聽說是以胡繩同志為中心所改寫的報告，骨子裡幾乎主要是以所謂

¹⁵ 曉風，《九死未悔：胡風傳》（台北：業強，1996），頁178。

¹⁶ 曉風，《九死未悔：胡風傳》，頁179。

¹⁷ 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香港：香江出版社，1989），頁24。

¹⁸ 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頁25。

胡風文藝思想為對象，而且是把問題的本來內容簡單化了甚至歪曲了以後再加以論述的。整個十年來國統區文藝的主要障礙，原來是所謂胡風文藝思想。無論對我或對整個文藝工作來說，都是一個太嚴重了的問題。聯繫到會議開始前以來的情况，我覺得同志們是把我當作了文藝工作上的罪人，即使不是唯一的但也一定是最主要的罪人看待的。¹⁹

中共向來具備「總結歷史」的傳統，第一次文代會在中共的主導下，顯然並非單純為了團結文化（文藝）工作者之目的，中共意欲在其指揮下，徹底總結抗戰時期的文藝工作，更重要的是，要能夠「正確地」評價國統區文學。此時胡風的「堅辭」，看在中共眼裡，固然意謂相當程度的「不合作」，胡風給予中共事後責備其態度的理由，並非明智之舉。由於胡風性格上的固執，和其對自身理論的堅持，皆使他在待人處事態度上，缺乏轉圜餘地。

貳 工作安排不順遂：《文藝報》編委始末

在中共即將奪權之際，已經開始陸續論功行賞，安排各式人等的工作職位。中共也準備讓胡風擔任《文藝報》編委的工作；不過，胡風雖長期追隨中共，卻未答應《文藝報》的工作安排。

早在 1949 年 3 月左右，胡風便隨中共統戰部進入北京。周恩來曾囑咐胡風，到北京後和周揚、丁玲研究一下組織新文協的問題（胡風原是舊文協負責人之一）。4 月 15 日，在文協籌備會上，安排由胡風擔任《文藝報》（文協機關刊物）編委這項工作，才突然被提上人事名單。據胡風自述，在此之前都沒有同志向他知會過此項人事安排，由於他的「惶恐和消極情緒」，他沒有馬上答應。

¹⁹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况的報告〉，《胡風全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六卷，頁 111。

4月16日，胡風和周恩來在某個會議上碰了面，周恩來說知道胡風「要忙起來了」，故胡風認為此人事安排是總理周恩來的意思。然而，胡風心中滿是疑惑，周揚作為文藝主要負責的領導人，卻為何未曾找胡風談過話，溝通工作上的目標和做法？4月18日，胡風造訪沙可夫（原名陳維敏，中共黨員），希望能親訪周揚與之詳談，但沙可夫表示，周揚忙碌無法接見，於是胡風便請沙可夫轉達周揚：「這個工作由我做恐怕不合適。」胡風自陳此時心中想法：

我以為不好直接說出來也用不著說出來的那意思是，希望周揚同志約我直接談一談，看他態度怎樣，希望他把現實情況和政策要求告訴我，把他的意見告訴我，我也預備可能時說一說對文藝情況的看法，至少也要彼此間對這個工作本身取得某一限度的共同了解。²⁰

表面看來，是胡風拒絕了黨的工作安排，其實並不盡然。胡風單方面地期待周揚，主動和他溝通黨的政策並取得共識。但後續的發展是：周揚和沙可夫都沒有給予正面回應，只透過其他人（茅盾）催促過他數次，並無親自約見的安排。於是胡風得出的結論是：

無論從抗戰期間和解放後看，周總理總是希望我工作並鼓勵我工作的，基本上是信任我的，但文藝上的負責同志好像是不信任我的，至少是不支持我做這個工作的。在具體領導關係上沒有保證，在這樣的文藝思想情況和人事情況下，以我的個性和看法，主持一個領導性的理論刊物是無法做的。……²¹

當然，不能說胡風沒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以他的性格和看法，在沒有得到充分「信任」的情況下，做此工作肯定是要「犯錯誤」的，何況「我也不能在具體問題上都去找周總理。」²²這裡可以看出胡風的固執和消極心態，他認為黨既欲交付一重要工作給他，卻不是由文藝領導人周揚親自面談，他可能感受不到誠意所在。再者，由於胡風一直未能解決入黨的問題，所以會有「在具體

²⁰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109。

²¹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109。

²²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109。

領導關係上沒有保證」疑慮，終而認為無法勝任此職。至於周揚、胡風的歷史恩怨和人際關係，使他誤以為一切的不順遂，皆是周揚從中作梗，這也影響了之後他的政治判斷。

胡風已經錯過一次工作安排的機會，1951年1月胡喬木約見胡風，機會再次到來。胡風自述，胡喬木對他傳達了以下意見：「一，他說我不該把別人都看做異端；二，黨對於一些同志並不是論功行賞，而是他們都戰鬥了過來，現在也都在戰鬥著。如果他同意我的看法，那別的同志全要反對他的。」胡喬木給了胡風三個工作選擇：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文藝報》負責、中央文學研究所教書，要他決定一個並以書面答覆。胡風還是猶豫了，他以「抓不著工作實際情況的基本內容」、「不瞭解整個文藝實踐情況」、「考慮到一個非黨員怎樣工作的問題」等理由，希望能和胡喬木再次面談，最後才申明願意聽從分配。²³之後胡喬木便沒有回答，留下不歡而散的結果。

儘管胡風自言，之所以未輕易接受指派的工作，是因為「不願隨意敷衍了事」，但後來外界還是盛傳：是胡風拒絕了這三個工作的指派。顯然胡風在處理工作的態度上過於謹慎（或是拘泥），最後導致他進退失據。1953年，胡風終於參與了《人民文學》的編輯工作，但他還是認為並未受到信任（某些工作似有保密性質），意見也未受接納，一年間編委會僅開過三次，最後甚至編輯部也和他也斷絕聯繫了。²⁴

參 胡風的經濟狀況和職業志向

1949年以前的知識份子，基本上是靠自己的稿酬、版稅、工資生存的，他們以自己的腦力勞動，換取日常生活之所需。中共建政後，原本的知識份子群體（包括學者教授、職業作家），待遇大致如何？中共建政之初，便對全國職業作家進行經濟上的收買（即所謂「包下來」），大部分的知識份子被編入文

²³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117-118。

²⁴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141-143。

化教育單位，對 1949 年前的專業技術職務名稱，大致予以承認，工資待遇也維持原狀。²⁵

據學者翟志成的研究，中共對文化（文藝）工作者的收買的方式有二：第一，將舊有版稅制度廢止，改行新式稿酬制。舊有版稅制以銷售量和書籍定價，依一定比例抽取版稅來給予作家，此制度基本上是以市場供需關係為考量，將知識和文藝「商品化」。中共所建立之新式稿酬制度，新制度是以字數、定級、定額、印刷遞減率來計算稿酬，保障多數作家的基本收入，較無須受制於市場。第二，將全國職業作家，使絕大多數加入「文聯」或「作協」，成為文藝幹部，依照個人以往的名氣、地位，和所謂「對革命的貢獻」，分別享受不同的文藝級幹部待遇，在建政初享供給制（由國家供應一切食、衣、住、行開銷），1953 年改為工資制，所有幹部（包括文藝幹部）按照級別，領取不同等級的薪資。²⁶依翟氏推斷，作家憑所謂「文藝級」所領的薪資，以及作家的地位，應不比大學教授來得低，因為胡風、路翎、阿壠等，都可輕易成為大學教授，而大學教授卻未必能輕易成為作家。以珠江電影製片廠的編導王為一為例，翟認為王僅屬二流文藝家之輩，其工資仍有每月二百七十九元，比起珠江製片廠的工人，每月只有五十元之譜，已是數倍之多。²⁷

魏承思針對上海知識份子的研究，證明自 1949 年中共進城至 1950 年代中，知識份子大致仍保持著原來的生存條件。雖然工資收入略有下降，但許多人在工資之外，從事寫作或翻譯的稿酬和版稅收入仍相當可觀。魏舉《新民日報》記者吳承惠為例：「1957 年前，我的生活很富裕，給文藝出版社寫一本通俗小冊子的稿酬就有 2000 元人民幣。我每月工資 130 元，而稿費可以賺到 200 到 300 多元，要比工資高出 2、3 倍。那時候很容易給文人一種錯覺，既然稿酬比工資高，還不如辭去公職做自由撰稿人。我幸虧沒有辭職，否則到 1960

²⁵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頁 66。

²⁶ 翟志成，〈中國大陸稿酬制度研究〉，《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1983），頁 203-206。

²⁷ 翟志成，〈中國大陸稿酬制度研究〉，《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 208。

年代初，稿費取消後，就難以生存了。」²⁸當時有許多知識份子依賴稿酬和版稅謀生，作家劉紹棠的例子亦足供說明：

1957年反右前，小說稿酬每1000字分別為20,181,512元，我的小說1000字18元。然而，出書付酬，完全照搬蘇聯方式，3萬冊一個定額，每增加一個定額便增加一倍稿費。發表之後出書，出書又印數多，稿酬收入也就相當可觀。我專業創作時已出版4本書，收入一萬七八千元。稿費收入的5%交黨費，但不納稅。存入銀行，年利率11%，每年可收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當於一個12級幹部工資。那時物價便宜，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豬肉6角。我買了一所房子，住房5間，廚房1間，廁所1間，堆房1間，並有5棵棗樹和5棵槐樹，只花了2000元。²⁹

劉紹棠是位著作頗豐的小說作家，上文可見其生活狀況，實屬優渥。

由上可以推測，當時胡風的待遇應並不算太差，那麼他的不滿從何而來？從中國傳統事業格式(career pattern)來看，知識份子期待的仍是「學而優則仕」。現代中國雖已歷經廢科舉，繼而共產革命將所有知識份子網羅進國家之手，但這項傳統價值是否依然存在？胡風對工作安排的想法，是否也受到上述觀念的影響？筆者以為，胡風總期待能為人民做一番事業、影響更多民眾，他其實並不排斥政府工作。

由於胡風一直未能解決組織(入黨)問題，長期以黨外「同路人」的身分與中共互動，胡風的工作安排問題，一直困擾著他，也成為他和中共的眾多矛盾之一。胡風既然多次拒絕了中共的人事安排，他心中究竟是何想法？胡風在和妻子梅志的家書中提到，他曾表示願組織劇團工作，或者專職寫作、籌辦刊

²⁸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頁69。

²⁹ 牛漢，《荊棘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頁324-325。

物，但中共方面則希望胡風去清華擔任教職，但胡風最不想做的工作，便是學校教授，他稱作「塞到冷廟」。³⁰之後，胡風也透過關係打探消息：

今天去找了邵爺（按：邵荃麟），態度比上次冷淡得多。說是，軍師（按：胡喬木）說工作還在我自己的意思，又提到專門寫作也好，之類，預備組織人到朝鮮長期住，之類。劇團，說要節約，根本取消了。刊物提都不提。說軍師已轉報父周（按：周恩來），看軍師有時間談談，父周有時間談談否，之類。³¹

主辦劇團的想法，他自知難有機會，最後亦無下文。不論是作家、主辦刊物或者辦劇團，胡風都盡可能尋找一個創作和發聲的空間。胡風既不願做學校教授，但又期望獲得一個能夠發揮創作所長，以及發揮其影響力的職位。筆者以為，胡風自陳「我們沒有居人上的雄心」³²，抗戰時期編《七月》期刊又頗具熱情，胡風應希望能獲得，一個對大眾（特別是知識份子）具廣泛影響力的職位，《文藝報》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文藝報》編委對胡風而言應是理想的職位。但是經過第一次文代會的起草過程，顯然胡風不願在他人的主導下「唱同調」，胡風又認為，工作的前提是：要能夠獲得「黨的認可和信任」下。

工作的問題，胡風歸因於無法得到中央文藝領導（特別指周揚）的信任，胡風希望與周揚、胡喬木溝通，甚至「直達天聽」找上總理周恩來，但皆未能如願。在中共文藝領導的組織管理下，周揚便是黨的具體代表（即黨的代言人），而胡風與周揚的矛盾難解，也是胡風之後會選擇「上書」直通高層的原因之一。

³⁰ 胡風致信梅志（1951年10月15日），《胡風家書》，（上海：復旦大學，2007），頁241。

³¹ 胡風致信梅志（1951年11月4日），《胡風家書》，頁247。

³² 胡風致信梅志（1949年11月8日），《胡風家書》，頁129。

肆 胡風派同受打壓

胡風自述 1949 年入京後的創作歷程，最初寫一些報告散文，發表並未受阻礙。政協會議以後，當時他滿懷熱情寫下「歌頌祖國」的詩《時間開始了一歡樂頌》，但等到胡風投稿第二章《光榮贊》時，已無法在《人民日報》發表，只能投到地方報紙《天津日報》上。³³胡風所寫的長詩（共有《歡樂頌》、《光榮贊》、《青春曲》、《安魂曲》、《勝利頌》等五個樂章），在出版上便遭遇困難，胡風只能自行安排，透過上海海燕書店、天下圖書出版公司兩家私營出版社，方能順利出版。³⁴在「抗美援朝」運動時，胡風受范長江（時任《人民日報》社長）的鼓勵，寫下新詩《為了朝鮮，為了人類！》，欲發表卻被《人民日報》壓下，後來更被「黨內同志」評為所謂「壞詩」的例子。³⁵胡風的創作、發表和出版備受打壓，他也舉出諸多類似案例，證明其在發表文章時，經常面對斷章取義式的批評，胡風說：「這批評也是不從內容出發，割斷前後的聯繫對片段下了歪曲的解釋，而且還故意地拉到政治問題和人事問題上去，完全出乎我的意外。」³⁶胡風此時還未了解，在中共眼裡，文學向來不是「純粹」的，而是可以表現階級立場與觀點的。

遭批評的例子，還有阿壠。阿壠，原名陳守梅、又名陳亦門、筆名 S.M。阿壠是國民黨南京中央軍校第十期畢業，抗戰初期曾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受訓，後在國民黨胡宗南部當少校軍官。他雖非中共黨員，但曾多次為私下蒐集國軍軍事情報，透過胡風轉交中共。³⁷阿壠既具軍人身分，也鍾情文學創作，1949 年後在天津文聯工作，任職天津市委文聯委員會委員，主編天津文聯機關刊物，同時兼任南開大學中文系講師。³⁸阿壠歷來被視為「七月派」的一位骨幹人物，七月派在小說上有路翎作為代表，詩歌創作方面有田間、綠原、魯藜、艾青，至於文藝理論方面則有阿壠作為代表。

³³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 144。

³⁴ 周正章，《笑談俱往：魯迅、胡風、周揚及其他》（台北：秀威資訊，2009），頁 184。

³⁵ 胡風，《胡風全集》，第六卷，頁 145。

³⁶ 胡風，《胡風全集》，第六卷，頁 144。

³⁷ 林希，《白色花劫：「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頁 95-97。

³⁸ 翟志成，〈胡風與胡風集團重要成員略歷〉，《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 145。

1950年，阿壠發表〈論傾向性〉和〈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兩篇文章。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陳湧的文章〈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評阿壠的論「傾向性」〉。陳湧文中批評阿壠的文章「關於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作了不正確的錯誤地解釋」，並扣上阿壠「歪曲」毛澤東的文藝思想、馬列主義的錯誤這頂帽子，指責其「歪曲和偽造馬列主義」。³⁹批評一波未平，3月1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史篤（蔣天佐）的〈反對歪曲和偽造馬列主義〉，指責阿壠歪曲馬克思的原話，藉以推銷自己錯誤的論點。3月21日，在眾多壓力下，阿壠上呈檢討信致《人民日報》，表明他在寫作時，手邊僅有一些馬列主義理論的「鈔本」，所以才會在引用馬列主義理論時有所疏漏。3月26日，《人民日報》在發表阿壠檢討信〈阿壠先生的自我批評〉，編者按說明儘管歡迎阿壠的檢討，但重點是要「我們在文藝思想上達到一致」。⁴⁰林希說：「他們（指中共和陳湧等）是將這兩篇文章作為靶子來打的，踏過阿壠，他們要再次向胡風發難。」⁴¹阿壠遭受嚴厲批評，被視作對「胡風小集團」的一記當頭棒喝。

胡風在家書中談到阿壠和路翎的情況：「今天，與守梅、嗣興玩了一天。他們現在都卡著，原因很簡單，就是不讓他們出頭。不惜壓死工作來壓死他們。路翎不在乎，但守梅顯得很沉重的樣子。我想，這個考驗，對於他們說不定也是好的。」⁴²可見除了胡風的個人問題外，「胡風派」相關成員的工作問題，同樣遭遇各種困難，發表作品亦備受阻撓。中共開始逐步醞釀對胡風一派的公開批判，先是阿壠遭受批評，胡風的詩作《時間開始了》也受到批評，《文藝報》也刊載批評路翎的小說《女工趙梅英》等等。中共正運用其文宣工具，逐步施加壓力。阿壠被迫投書《人民日報》進行檢討，但還是被《文藝報》評論為：「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自我批評的一例」。

1950年3月14日，周揚在對全京津文藝幹部做報告時，更嚴厲批評阿壠：

1950年3月14日，周揚同志在文化部大禮堂向全京津文藝幹部做大

³⁹ 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頁47。

⁴⁰ 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頁52-52。

⁴¹ 林希，《白色花劫：「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頁105。

⁴² 胡風致信梅志（1951年4月10日），《胡風家書》，頁238。

報告，講的是遺產等問題。其中特別提到陳亦門（即阿壠）同志當時發表的兩篇文章，態度激憤得很，把這當作小資產階級作家小集團的抬頭，危害性等於社會民主黨。他指著台上的四把椅子說，有你小資產階級一把座的，如果亂說亂動，就要打！狠狠地打！……⁴³

同樣境遇的還有路翎。路翎，原名徐嗣興，因《七月》結識胡風，是七月派著名的小說家，著有《財主底兒女們》、《飢餓的郭素娥》。如果說阿壠遭受批評，是因為被抓住一些小錯誤而借題發揮，那麼路翎小說遭受批評，可能找不到太多堅強的理由。1948年的「香港批判」，路翎的小說也是主要對象之一，胡繩發表之〈評路翎的短篇小說〉，批評路翎的小說體現了「精神奴役創傷」，而「精神奴役創傷」正是胡風文藝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故遭受批評。⁴⁴韓戰爆發後，路翎跟隨人民志願軍赴朝鮮，發表一系列小說《初雪》、《戰士的心》、《窪地上的戰役》。隨即報刊上出現讀者來信，指責路翎「歪曲了志願軍戰士的形象」、「把戰爭描寫得殘酷與陰暗」、「企圖以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代替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等等。⁴⁵回國之後，路翎擔任作協理事，撰寫劇本《祖國在前進》，但劇院公演亦遭受阻力無法演出。路翎所遭受的迫害，確實很多無理之處。在1955年文聯的擴大會議上，路翎講述自己遭迫害的原委，指責周揚等實行「宗派和軍閥統治」，周揚也不得不承認：「在批評路翎作品的某些文章中，正如其他不少的批評文章一樣，曾表現了一種粗暴的態度。路翎先生不滿意這種批評是應該的，有理由的。」⁴⁶

胡風和其友人的遭遇，可說是無獨有偶。胡風將一切的不如意，皆歸因於與周揚間的個人恩怨和人事因素，是其政治判斷的失誤。對中共而言，黨內對胡風等人的意見並非無中生有，後面將論及中共開始部署對「胡風集團」的文藝批判，目前這些打壓不過是後續許多政治行動的先聲。

⁴³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115。

⁴⁴ 林希，《白色花劫：「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頁119-120。

⁴⁵ 林希，《白色花劫：「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頁122。

⁴⁶ 翟志成，《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164-165。

第三節 中共文藝政策的緊束

中共自創立之初，便深受列寧主義建黨理論之影響，在此列寧主義式政黨內，所有權力都應集中在黨中央，任何的派別活動都不具有合法性。⁴⁷在延安整風時期，中共開始在黨內推行黨一元化領導的政策，黨一元化領導的政策有兩個重要層面。第一，是各級政府機關、軍隊單位和群眾群體，都應服從於同級黨組織的領導；第二，所有下級黨組織應必須服從於上級黨領導。⁴⁸黨一元化領導的政策，除具有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也適應於戰爭時期的需求，至此中共建立了金字塔型的權力領導格局。1949 年中共建政後，更將此黨一元化領導原則推至全國。

魏承思指出，在共產黨中國，真正摧毀民間社會、深入控制社會生活的政治力量並不是國家，而是黨。國家和黨這兩個權力源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表面權力和實際權力之間的關係，政府機器通常是掩蓋了保護了政黨的真正權力。⁴⁹是故，新政權看似「包下了」各級人等，使其「參與」國家體制，但實際上的控制權仍在中共手中。對於描述中共領導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學者鄒讜則使用「全能主義」(totalism) 這一概念，表明它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概念的不同處。「全能主義」表示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國家職能可以擴展到社會生活的任何領域，而不受道義或意識形態的制約，只有最高領導人可以限制這種擴展並隨時改變它。⁵⁰鄒讜也指出，「全能主義」指國家對社會控制力強弱的程度問題，國家對社會與個人控制是動態的關係，意即可多可少。⁵¹

若遵循上述原則，觀察中共的文藝政策，黨對社會的控制是時緊時鬆，總體朝向緊縮發展。自 1949 年建政始，中間歷經批評電影《武訓傳》、批評俞平

⁴⁷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4），頁 141。

⁴⁸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下冊，頁 384。

⁴⁹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頁 20。

⁵⁰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頁 142-143。

⁵¹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頁 226-227。

伯的紅樓夢研究，到 1955 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共知識份子政策乃是逐步收縮，帶給知識份子不小的心理壓力。

1950 年 1 月，毛澤東要求知識份子參加土地革命，要他們親自參與開大會、劃分階級、鬥爭地主和沒收土地，藉此過程爭取知識份子對土地革命的認同。同年 6 月，毛澤東發表公開談話，要求知識份子進行自我改造，此時的改造主要是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大致上運用整風時期的辦法，學習文件、聯繫自己思想、進而自我批評，基本上對知識份子的態度是寬鬆的，許多懷有負罪感的知識份子也踴躍參與。1951 年 5 月，毛澤東開展對《武訓傳》批評。在政權日漸鞏固後，毛展現他對文化議題的興趣。《武訓傳》原為頌揚武訓的興學精神，但毛澤東乃從階級鬥爭的觀念著眼，對《武訓傳》的批評，意在指責其背後的「封建思想」、「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毛將《武訓傳》的批評升高到路線層次來批判，開啟了學術和藝術問題政治化的惡例。⁵²

中宣部在 11 月 23 日向中央作〈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文藝幹部整風學習的報告〉。1951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下達〈中共中央關於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學習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國各機關按中宣部報告之計劃，在黨內、外範圍進行「文藝整風」。中宣部的報告，原本是針對黨內文藝領導幹部的各種缺失：第一，遷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放棄思想鬥爭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對思想工作的嚴肅性；第二，脫離政治，脫離群眾；第三，嚴重的自由主義，缺乏批評和自我批評，缺乏學習。比較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檢討後的改善方法：

一、糾正文藝脫離黨的領導的狀態，對文藝工作的重要情況和問題經常向黨中央報告請示。認真組成中央宣傳部的文學藝術處和電影處，使成為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有力工作機關。宣傳部這次所召集的文藝工作會議，以後準備經常舉行，使形成文藝領導工作的核心。

二、徹底整頓文聯各個協會的工作，使成為組織作家參加實際鬥爭、學習、創造和展開批評自我批評的中心。……

⁵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662。

三、改善對電影工作的領導，草擬了一個中央關於加強電影工作的決定草案，日內送上請審。

四、整頓文藝刊物，使成為嚴肅的戰鬥的武器。決定將《人民戲劇》《人民音樂》《新戲曲》《北京文藝》停止出版，集中力量辦好《文藝報》和《人民文學》，使前者成為領導性的藝術評論和文藝學習的刊物，後者成為領導性的發表指導創作的刊物。同時，加強《說說唱唱》使成為指導全國通俗文藝的刊物，並定期地選印劇本和歌曲，以供應全國廣大的需要。這個計劃已商得各方同意，擬以文聯名義正式做出決定。

五、對文藝界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展開有系統的鬥爭。……⁵³

可以看到毛對《武訓傳》的當頭棒喝，促使中宣部趕緊「檢討」，並收縮文藝政策以「跟上腳步」。原本是中宣部針對文藝幹部的自我檢討，毛澤東則認為應拓展至黨外文藝界。中共對文藝界的領導便開始逐步加強，舉凡電影、文學、藝術各層面皆設置文藝領導部門。最重要的是，中共預備「對文藝界的資產小資產階級思想展開有系統的鬥爭」。而且這段引文的末段已遭刪除，文內僅註明「此處編者有刪略」，固然無法證明胡風此時已被納入鬥爭標的，但也留給後人一些想像空間。

自中共建立政權，便將原有的黨一元化領導，擴展至全國範圍。甚者，在一元化領導原則下，已身為全黨最高領袖的毛澤東，其個人的政治、文藝觀點，更容易成為黨內的權威性看法。毛澤東對文藝和理論問題，本已有濃厚興趣，政權初步鞏固後，毛更有餘裕處理文藝議題，所以中共對文藝界的控制便有增無已。至於胡風方面，中共建政後，幾乎所有文藝工作者，皆已納入中共的組織控制範圍，胡風當然也不例外。此時胡風仍然堅持自身的文藝理論和創作觀點，而中共文藝領導對胡風的「改造」嘗試，也始終未收其效。在文藝觀點、人事往來以至工作安排等諸多方面，胡風和中共黨組織間的摩擦日益增加，皆為往後胡風上書中央，終而形成政治事件，留下了伏筆。

⁵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文藝幹部整風學習的報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第二冊，頁464-466。



第肆章 再探胡風事件

前文已提到，中共新政權的成立，已讓知識份子的生活產生諸多變化。對於胡風而言，他也面臨許多困難，如文藝創作發表受阻、工作安排不順遂、與中共文藝領導相處不睦等。胡風自認未獲黨的信任和重用，固然心存不滿，他曾嘗試透過周恩來，轉達下情以獲得黨中央的理解，然而始終未能如願。百般無助下，胡風只好「上書」中央，希望藉此扭轉局勢。然而胡風的「三十萬言書」，針對中共文藝領導和政策，提出許多尖銳批評；再者，舒蕪向中共遞交他與胡風的私信，揭露了胡風的真實面目，終而導致胡風上書一事，轉變為「反黨」、「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中共一手炮製的「胡風案」，不僅牽連甚廣，更讓知識份子無不膽戰心驚，堪稱現代「文字獄」。下文將詳述胡風事件的發展經過，探究事件的成因，終論毛澤東的關鍵角色。

第一節 胡風事件的發展和轉折

壹 知識份子思想改造與舒蕪的「倒戈」

在談論胡風事件前，宜先簡述其時代背景。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來，便開始在全國範圍要求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一時間各式自我批評文章傾筐倒篋而出，其中更不乏頗具知名度的所謂「大知識份子」，如朱光潛、馮友蘭等人的自我批評。1951 年 5 月，毛澤東對電影《武訓傳》發表批評，可視作自中共建政以來，首次將政治力伸入文學、文化批評的領域。1951 年 9 月至 11 月間，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文藝工作會議，對黨內文藝工作領幹部行檢查。11 月 26 日中宣部下達〈關於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即所謂「文藝整風」的開始。「文藝整風」的對象，主要是中共黨內的文藝幹部，以及黨外「小資產階級」文藝工作者，其方式基本上是以學習文件、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主，通過官方控制的各地作家協會，組織作家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其他文章，也就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毛式文藝觀。¹此時

¹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2001），下冊，頁 665。

知識份子的心理壓力，主要來自於中共所營造之社會輿論壓力，他們必須了解，自己原有的生活習慣、思維模式以至意識形態，並不符合時代的需要，一切皆可冠以「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帽子。簡單講，他們是待改造的一群有「原罪」之人。

在此次文藝整風中，向來與胡風親近的舒蕪，被中共視為突破胡風問題的「利器」。1952年5月25日，舒蕪在《長江日報》發表了〈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文中除了呼應毛澤東〈講話〉中的文藝觀點，更重要的是自我檢討與全盤貶抑，舒蕪檢查了自己過去的「錯誤思想」，一方面否定自己當年〈論主觀〉²文中的觀點，等於間接指責了胡風的文藝理論；另一方面，他還直接點名批評與胡風思想接近的呂熒、路翎等人，項莊舞劍、矛頭直指胡風。此時的舒蕪所以將砲口對內，合理猜測可能中共對他做了些「工作」，以他作為胡風集團的「起義份子」，尋求處理胡風問題的突破口。究其個人而言，舒蕪可能因為仕途不得志，故藉此機會向中共表態以打破僵局，並尋求政治「過關」。

舒蕪的文章隨後為《人民日報》所轉載，而在其〈編者按〉（胡喬木撰）中也首次提出「小集團」的概念：

本文原載於五月二十五日《長江日報》。作者在這裡所提到他的論文〈論主觀〉，於一九四五年發表在重慶的一個文藝刊物《希望》上。這個刊物是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辦的。他們在文藝創作上，片面地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而實際上否認了革命實踐和思想改造的意義。這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舒蕪的〈論主觀〉就是鼓吹這種文藝思想的論文之一。下面發表的這篇文章表現舒蕪對於他過去的錯

² 見《舒蕪集》（石家莊：河北人民，2001），第一冊。〈論主觀〉於1945年1月發表在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近人認為此文頗能體現當時舒、胡二人關係之親近。牛漢則認為，〈論主觀〉的主要觀點是旨在對抗毛的《講話》。見牛漢口述，何啟治、李普西編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118。

誤觀點已提出了批評，這是值得歡迎的。³

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對於舒蕪的檢討予以肯定，但也表明其對於胡風一派的文藝觀點仍相當有意見。大體而言，此時對胡風的批評僅於文藝思想層面，並未上綱至政治層面。

其間胡風亦嘗試撰寫檢討文章〈學習，為了實踐〉，託予和他素有交情的中共黨員彭柏山，將此文送京進閱。此外胡也寫信給周揚，說明其對於〈編者按〉的惶恐不安，但周揚回信表示，胡風的文章沒有自我批評，不宜發表。周揚通知胡風應親往北京，參加討論關於胡風文藝思想的會議。⁴為此，胡風便前往北京，希望解決思想檢討的問題。

1952年7月，胡風自滬抵京，在檢討會前和周揚有過數次談話。據胡風的說法，周揚是這樣對他說：

他（按：周揚）的態度很嚴厲。關於我本人的，主要思想有幾點：（一）我反對了黨員的意見，但黨是代表群眾的，黨內人的意見總要對些。又說社會民主黨最危險，這是一九五〇年三月他向幹部作的報告中已經提出過的。（二）舒蕪是進步了（他說不是投機取巧），舒蕪說的「幾個人」，實際上是指我。（三）我說的話九十九句對，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錯了，那就全部推翻了。（四）他覺得過去的事不必談，但還有幾個人受我的影響，所以，要舒蕪和受我影響的青年來出席，也要茅盾來出席，大會小會輪流地開。（五）要我主動檢討，少說或不說優點，只說缺點。（六）要打掉我的架子。⁵

³ 舒蕪，〈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北京），1952年6月8日，第3版。

⁴ 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香港：香江出版，1989），頁127。

⁵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六冊，頁125。

對照周揚於 7 月 23 日給周恩來的報告：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彭柏山同志（現任華東文化部副部長，過去和胡風關係較好）即告我，胡風知道我來，很願和我見面。我和柏山，一道親自到他家裏，吃了飯，談了三個小時之久。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黨走的，在文藝事業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態度也是認真的，但他的文藝理論是有錯誤的。主要是片面地強調「主觀精神」，實際上就是拒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家到工農群眾的實際鬥爭中改造自己，在這個基本點上，他的理論和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正違背的。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藝理論上十分輕視自己民族的傳統。他很激動地把《文藝報》的一期內部通訊及編者按語給我看，他認為《文藝報》的這種作法是無理的。……他又談到您給他談過他跟別人不合作的問題，他說他一向都是和我們合作的。我說事實並不是如此，我現在不談我們兩人之間過去的關係，這已是二十年前的舊事了，在這個問題上，我作為黨員應當負更多的責任。我只提兩次文藝上的爭論，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左右關於民族形式的爭論。他把我們共產黨員作家和當時被疑為與國民黨有聯繫的向林冰相提並論，左右開弓，而他的整個觀點是反對民族形式的。另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到四八年關於主觀問題的爭論。他不但沒有很好地考慮共產黨員作家（這些作家過去又都是和他比較接近的）對他提出的批評意見，相反，對這些善意的批評採取一律罵倒的態度。我根據這兩件事說明，他不但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態度上也是不夠合作的。⁶

應該說周揚的看法，可以相當程度代表黨中央的態度。此時周揚對胡風的批評，主要仍集中在是「文藝理論」和「態度」上。周恩來也曾在信件中「提點」過胡風，周說：「舒蕪的檢討文章，我特地讀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讀它幾遍。」⁷此中意涵，也許當時胡風尚未深刻體會，他必須瞭解的是，「黨內人」

⁶ 轉引自林默涵，〈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林默涵問答錄之一〉，收錄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 478-479。

⁷ 轉引自林默涵，〈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林默涵問答錄之一〉，收錄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 481。

的意見才是正確的。特別在文藝思想和理論上，仍須以毛澤東的意見為依歸，而毛的〈講話〉一文，正是毛式文藝觀的具體陳述。

1952年9月至12月間，共開了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在第一次開會前，中央發給胡風看了舒蕪的〈致路翎的公開信〉打印本，文章中再度重提「小集團」的派系主義，和其「錯誤」的文藝思想。⁸舒蕪將鋒芒指向路翎，實則意在胡風。舒蕪之所以宣告和胡風決裂，並向胡風集團招降，不難看出來自中央的背地指示，和他自己的投機心態。

1953年2月15日，中宣部向周恩來和中共中央送上〈關於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經過情況的報告〉，其中將胡風文藝思想主要的錯誤歸納為三項：一、抹煞世界觀和階級立場的作用，把舊現實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實際上就是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藝來代替無產階級的文藝；二、強調抽象的主觀戰鬥精神，否認小資產階級作家必須改造思想、改變立場，片面地強調知識份子作家是人民中的先進，而對於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則是十分輕視的；三、崇拜西歐資產階級文藝，輕視民族文藝遺產。這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⁹在這場批判會的尾聲，與會者希望胡風能夠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並進行檢討，胡風表示願意考慮，但實際上仍為自己的思想多所辯護。

之後，林默涵〈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¹⁰和何其芳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¹¹兩篇批評文章接連問世。林默涵的文章雖以個人名義發表，但實際上卻代表文藝界領導層的看法，於是次日《人民日報》便轉載了林文。據林默涵回憶，他之所以發表文章，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經過座談會，最好希望胡風自己寫一篇自我批評。如果他自己不肯寫，那就要發

⁸ 舒蕪的〈致路翎的公開信〉中點出「胡風集團」的五點錯誤：一、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二、否定黨的領導；三、援引同調、辯護自己；四、在文藝思想上，根據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指導；五、由於我們的錯誤思想，使我們在文藝活動上形成一個排斥一切的小集團，發展著惡劣的宗派主義。見李輝，《歷史悲歌：胡風冤案集團始末》，頁130。

⁹ 見林蘊輝，《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9），頁504-505。

¹⁰ 林默涵，〈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人民日報》，1953年1月31日，第3版。

¹¹ 何其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文藝報》，1953年2月15日，第3期。

表一兩篇公開的批評文章，因為胡風的文藝思想在文藝界是有影響的」。¹²中共為迫使胡風就範，其步驟大致如下：首先是在報紙上公開批判、施加壓力，督促胡風進行自我批評和寫檢討文章。接下來安排所謂「討論會」，要求胡風在會議上做批評和自我批評，目的就是要在「理論」、「態度」等問題上，徹底壓倒胡的銳氣。這也意味著，中共的文宣部門，之所以拉高批評的聲調，除了針對胡風個人的態度問題外，也重視胡風問題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而社會上的輿論和風向，向來是中共文宣部門所欲塑造和主導的。

貳 胡風的反擊：上書明志〈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

中共的文宣攻勢暫歇，但胡風的生活處境仍一如往昔，工作分配、居住場所等安排不盡如意。在眾人的協助之下，胡風決定上書言志，除詳述中共文藝官僚周揚、何其芳等人歷來對他的打壓，還包括文藝寫作現況下的各種缺失。胡風這種「清君側」的想法，是認定中共高層的決策乃被周揚等官僚所蒙蔽，因此寄望於高層政治中找到著力點，方能予以政敵致命的打擊。

1954年3月至7月間，胡風在路翎、徐放、謝韜、綠原和其他友人的協助下，完成了〈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所謂「三十萬言書」，後簡稱〈報告〉）。1954年7月22日，胡風向時任國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習仲勳，當面遞交〈報告〉。〈報告〉主文共分四個部分：一、幾年來的經過簡況；二、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三、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四、作為參考的建議。¹³胡風「上書」中央的舉措，應可看作是他對現況的反擊。

〈報告〉的第一部分，主是胡風的自我檢討。儘管他承認自己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但也指責文藝領導（周揚、林默涵、何其芳）對他的不信任。胡風回顧自1948年進入解放區以來，他和友人在報刊發表文章所遭遇的種種打壓和困難，以及自身工作安排的不順遂，並解釋他何以未接受中共的「組織安排」。

¹² 林默涵，〈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林默涵問答錄之一〉，收錄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487。

¹³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冊，頁93-103。

〈報告〉的第二部分，是胡風對自身文藝理論的辯護，並反駁林默涵、何其芳二人的批評文章，指責他們犯了「主觀主義」、「庸俗機械論」的錯誤。胡風還提到，中共文藝領導憑藉所謂五把「理論」刀子，對作家和創作實踐所造成的壓迫，即著名的「五把刀子」說：

在這個頑強的宗派主義的地盤上面，僅僅通過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對我的批評所看到的，在讀者和作家頭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

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否則，不可能望見和這個「世界觀」「一元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影子，這個世界觀就被送到了遙遙的彼岸，再也無法可以達到，單單這一條就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啞了。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場或少一點立場。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農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農兵生活裡去之前逐漸麻痺了感受機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過去和現在的生活當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吸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農兵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這就使作家脫離了實際，脫離了勞動，無法使現實內容走進自己內部，一天一天乾枯下去，衰敗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話或反話。

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繼承」與「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缺點；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文藝的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夠偷偷地接近一點生活，也要被這種沉重的復古空氣下面的形式主義和舊的美感封得「非禮毋視」，「非禮毋聽」，「非禮毋動」，因而就只好「非禮毋言」，以至無所動無所言了。

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忠於藝術」就是否定「忠於現實」，這就使得作家變成了「唯物論」的被動機器，完全依靠題材，勞碌奔波地去找題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題材」也

不能成為題材，任何擺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為「典型」了。而所謂「重要題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東西，革命勝利了不能有新舊鬥爭，更不能死人，即使是勝利以前死的人和新舊鬥爭，革命勝利了就不能有落後和黑暗，即使是經過鬥爭被克服了的落後和黑暗，等等，等等。這就使得作家什麼也不敢寫，寫了的當然是通體「光明」的，也就是通體虛偽的東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後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進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脫離政治脫離人民為止……（按：原文如此）

在這五道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麼作家與現實的結合，還有什麼現實主義，還有什麼創作實踐可言？

問題不在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個隨心所欲地操縱著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義。¹⁴

胡風原本所說的五把「理論」刀子，意指馬列主義理論在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理解下，被曲解成「公式化」的教條：第一，「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第二，「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第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第四，「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繼承』並『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的缺點」；第五，「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忠於藝術』就是『否定忠於現實』」。可以看到，胡風並非譬喻「理論」為刀子，也沒有說「理論」等同於「刀子」的意思。胡風的原意，是指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宗派主義」，也因為他們的「宗派主義」思維，他們才會利用「理論」的權威，以「理論」作為他們打擊異己、恫嚇作家的工具。

〈報告〉的第三部分，胡風則指出「以周揚為中心的宗派主義統治」對文藝界產生的負面影響，周揚「企圖人工的把自己首先造成毛主席文藝思想的唯一正確的解釋者和執行者的統治威信。」而且「擺出我就是黨的架子，任何理論問題用組織手段解決。」周揚對作家們實行「小領袖主義」（意即對內樹立

¹⁴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卷，頁302-304。

不可質疑的威信)，對於創作則主張「主觀公式主義」。胡風最後說：「分析了這些事實以後，我完全確定了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領導傾向和黨的原則沒有任何相同之點。我完全確信：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非黨傾向的宗派主義統治，無論從事實表現上或思想實質上看，是已經發展成了反黨性質的東西。」¹⁵對胡風而言，周揚在文藝界的領導，實際上抑制了胡風和其友人的工作權，他們的文章、作品發表處處碰壁，在工作職位的安排上亦未能如願。〈報告〉一文列舉如此多事證，便是為了證明在周揚等人領導下的文藝界，產生各種弊端，而胡風的上書就是希望一舉擊垮周揚和其宗派，徹底扭轉文藝界的情勢。

〈報告〉的第四部分是「作為參考的建議」。胡風在此章，針對黨和文藝間的關係、作家與組織運作，以及對話劇界、電影界等領域，向中共中央提出全面改革文藝界的現況的方案。此處胡風大量引用了蘇共文藝政策的語彙，而其中許多批評是相當尖銳的，例如：「任何一個文學流派或團體都不能而且不應當以黨的名義出場。」、「黨應該主張這個領域中各種集團和派別自由競賽。用任何旁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都不免是衙門官僚式的假解決。」、「黨應用一切辦法根除對文學事業的專橫和不勝任的行政干涉的嘗試。」等等。¹⁶

在胡風看來，文藝的特殊性是首要的。他建議黨不要直接干預文藝界，也不宜用行政領導的方式強求文藝的平均化、標準化、少數服從多數，而「絕對必須保證個人創造性、個人愛好的廣大空間，思想和幻想、內容和形式的廣大空間」。解散現行的創作機構，由作家自願組成新的「勞動合作單位」和成立新刊物，並且將權力置於主編之手，具選稿、作品發表與否、管理作家待遇等權，黨不宜多加干涉。¹⁷

¹⁵ 關於文藝領導的問題，胡風在報告中嚴厲指責周揚，形容其為「以周揚同志為中心的非黨傾向的宗派主義」，且一併批評了林默涵、何其芳等人，最後建議中央在「清算宗派主義的統治」後，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和發揮群眾的創作潛力。參見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冊，頁98-102。

¹⁶ 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胡風全集》，第六冊，頁403-404。

¹⁷ 見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1983），頁95。

參 政治風向的轉變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¹⁸一文，開啟批判俞平伯「紅學」的先聲。毛在批判《文藝報》浪潮中，使用所謂「壓制小人物」、「壓制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等詞彙，故胡風可能樂觀地以為，這是他的〈報告〉發揮了作用，於是胡風在會議亦「適時」發言，加入批判《文藝報》的行列。然而中共中央之所以批評《文藝報》，和胡風批評《文藝報》的目的不盡相同，並不容許胡風混淆其性質。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刊載周揚〈我們必須戰鬥〉，文中除再次確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針對胡風）、以及批判《文藝報》對「資產階級思想投降」（針對《文藝報》主編馮雪峰）的錯誤，最後還特別提到「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¹⁹

1955年1月12日，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準備公開印發胡風的〈報告〉，其中的〈主席團文字說明〉乃由毛澤東所修改。毛在〈說明〉文中說明，將胡風的《報告》，視作對1953年《文藝報》刊載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風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兩篇文章，所進行的「反批判」。²⁰

胡風顯然了解公開批判的風險，1955年1月14日晚間，胡風便找周揚承認錯誤，並要求在即將公開的〈報告〉的卷首，附上他的最新檢討文章：〈我的聲明〉。在〈我的聲明〉中，胡風放低姿態，說明自己提供的材料，其態度是「錯誤的、有害的」；此外，也說材料中「許多對於文藝運動所得出來的判斷，是帶有很大主觀成分的，有不切合實際之處」，表態希望得到中央的諒解。周揚隨即寫信向上請示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和毛澤東，陸、毛當即批示「不予登載」，毛還說：「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批判，不要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裡躲藏起來。」²¹毛的批示足以說

¹⁸ 袁水拍，〈質問「文藝報」編者〉，《人民日報》，1954年10月28日，第3版。

¹⁹ 周揚，〈我們必須戰鬥〉，《人民日報》，1954年12月10日，第3版。

²⁰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2007），上冊，頁301。

²¹ 毛澤東，〈對周揚關於同胡風談話的報告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2007），第五冊，頁9。

明，此時胡風雖試圖表態承認錯誤，但這種事到臨頭式的檢討，顯然並不符合毛的要求，更何況批判的部署已然就位，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在收到胡風的〈報告〉後，向中央提交〈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節錄其開頭如下：

胡風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個關於文藝問題的意見的長達三十萬字的報告。報告內容分四部分，其中理論部分主要是反駁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風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文章，在這一部分中，他很有系統地堅決地宣稱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他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在「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掩蓋下，借「現實主義」之名來否定文學的黨性原則，抹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文學的作用，否認作家深入群眾生活與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否定民族文藝遺產和民族形式。他認為我們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提倡作家到工農兵生活裡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寫革命鬥爭的重要題材，是插在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他片面地誇大我們文藝工作中的缺點，汙蔑現在文藝界的領導是「瘋狂」的「宗派主義」的「軍閥統治」。胡風報告中關於文藝工作的組織領導部分則是主張取消作家協會等團體的刊物而改辦所謂「會員刊物」，實質上是取消黨對文藝工作的統一領導的原則，取消作家的統一組織，使文藝運動成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動。報告的其他兩部分，主要是對宣傳、文藝工作方面許多黨員負責同志特別是周揚同志的惡毒的人身攻擊，所講的「事實」，許多是捏造的、不符事實的，以汙蔑和挑撥離間為目的的。²²

中宣部報告之前段，已經開宗明義指出，胡風是「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中宣部更指出：是胡風「否認」了文學的黨性原則；「抹煞」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文學的作用；「否認」了作家深入群眾生活與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否定」了民族文藝遺產和民族形式。最

²²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六冊，頁27-28。

後一句至為關鍵：「他（胡風）認為我們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提倡作家到工農兵生活裡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寫革命鬥爭的重要題材，是插在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從中宣部的報告來看，中宣部欲向上傳達的概念是：胡風竟然如此猖狂，敢於「否定」那些在中共眼裡看來，顯然是「不證自明」的原則。

筆者意在指出，中宣部對胡風的批評，顯然是故意曲解胡風的原意，來塑造對立的形勢。胡風也天真地認為，回歸馬列主義理論的討論，便能解決文藝領導濫用理論來壓制作家和作品的情況，然而他未曾了解的是，所謂「真理」和「理論」的詮釋權，只存在於政治領導人的手中。誰掌握了政治權力，誰就具備詮釋真理的權力。就結局來看，可以說中宣部簡單運用了「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邏輯，便給胡風扣上所謂「五把理論刀子」的帽子。

中宣部報告的中段，旨在陳述胡風「錯誤的文藝思想」的歷史根源和其內容。末段亦值得一看，具體闡明中宣部的建議和相關部署：

一、將胡風給中央的報告中關於思想和組織領導兩部分印成專冊，由作家協會主席團加上按語，隨《文藝報》一九五五年第一、二期合刊附發，同時也附發林默涵、何其芳過去批評胡風的文章，以便展開討論和批判，我們已將這個作法徵求郭沫若、茅盾和老舍等的意見，他們也同意這樣做。

二、繼續在《人民日報》、《文藝報》及其他報刊上發表批評胡風的文章，廣泛地吸收黨外作家和青年作家參加這個思想鬥爭。

三、作家協會及各地分會及其他文藝團體應適當地組織各種討論會座談會來討論和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

四、各省市應召集黨員作家、有關機關和學校中黨的負責幹部開會，說明胡風的錯誤思想以及對這種錯誤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的重要意義。對同情胡風思想或接近胡風小集團的黨員作家，應向他們明白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人民的，是與黨的總路線、黨的文藝思

想不相容的，凡是黨員，都應該同這種錯誤思想劃清界線，並積極參加對胡風錯誤思想的鬥爭。

五、各地黨委宣傳部應積極領導當地文藝界對胡風思想進行批判。

六、對胡風小集團中較好的份子應耐心說服爭取，對其中可能隱藏的壞份子，應加以注意和考察。²³

中共中宣部對批判胡風的具體建議，在此時顯然具有主導性，往後中央亦追認中宣部的部署。可以看到，此時的工作重點是，「教育」黨內外作家了解胡風文藝思想的「錯誤」性質，進一步推展「思想鬥爭」。但對「胡風份子」基本上是寬容的，還會使用「耐心說服爭取」等字眼，可見「肅反」尚非此時的主軸。

中宣部上呈其報告後，毛澤東作何感想？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後，在上面加註：「（胡風的思想）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所進行的攻擊，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²⁴毛將胡風的對抗，視作「階級鬥爭」的反映。1月26日，中共中央發佈〈中共中央批發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的指示〉中指出：

中央批准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現將這個報告發給你們。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他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各級黨委必須重視這一思想鬥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鬥爭來看待，把它作為在黨內黨外宣傳唯物論

²³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頁36。

²⁴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302-303。

反對唯心論的一項重要工作來看待。²⁵

由上可見，中共中央除了關切胡風個人問題外，更重要的是，胡風的文藝思想，對於許多文化人是有相當影響力的，也因為「（胡風文藝思想）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故須嚴厲批判之，且將其視作「思想鬥爭工作」（宣傳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的一環。

此時從毛澤東的批示和中共官方文件中，雖然可以看到「反動」、「反黨」、「反人民」等用語，但基本上未達「反革命」的高度。中共主要還是將胡風視作「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究其動機，此時文藝整風的目標是「資產階級唯心論」，毛需要一個在歷史上夠「左」的知識份子作為「樣板」，說明在革命隊伍內部仍然有矛盾存在，方能證明批判胡風「錯誤的文藝思想」確有其必要性，應該繼續深入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以上資料也表明，此時毛澤東和中共文宣部門，對於胡風問題顯然已有定見。將胡風〈報告〉一文公諸於世，並尋求公開批判，是希望藉輿論壓力，徹底清算胡風問題，且含有「教育」大眾的用意。而此毛〈說明〉一文，足以說明胡風上書〈報告〉，並未扭轉中共高層的政治判斷。

胡風事件的轉折點，發生在 1955 年 4 月之間。是時，舒蕪和胡風的來往信件，因為各種因素，最終交到了中共手裡。²⁶就目前資料看來，由於舒蕪的私信，使得胡風事件的政治性質，產生關鍵的變化。從這些信件中，讓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得以窺見胡風的內心世界，信中可以看見諸多字句，表露胡風對中共文藝官僚、文藝政策施行的不滿，以及宗派主義的情緒（特別是對周揚的反感）。因此，兩相對照胡風日前公開發表的自我檢討，更顯見其態度的反差。中共既然無法「改造」胡風，那麼胡風便注定成為反面的「典型」了。

²⁵ 轉引自林默涵〈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林默涵問答錄之一〉，收錄於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 498。

²⁶ 關於舒蕪交信事件之始末，有三種說法：一，舒親自交付中央（林默涵說）；二，舒交由人民日報編輯一女編輯，輾轉交入林默涵手裡（康濯說）；三，人民日報女編輯葉遙（葉為舒蕪妻的同學）先向舒蕪組稿，於是舒將原信交由葉遙「核實」，這才將信件轉交中央。詳見林默涵〈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林默涵問答錄之一〉、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舒蕪〈第一批胡風材料發表前後〉等三文，收錄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 462-563。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轉載舒蕪〈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一文,舒蕪將胡風和他的信件加以編纂、註釋,旨在揭露胡風一派「文藝小集團」的運作,和其暗自批評中共領導、政策的種種情事。此文的〈編者按〉原由《文藝報》編輯康濯所撰,毛澤東過日後並不滿意遂親自改寫之,這也是首次在報紙上,將胡風一案提高至「反革命」的高度。²⁷在胡風事件定性為「反革命」後,5月初,由中宣部和公安部共同組成胡風問題的專案組,在全國各地開始調查胡風等人的歷史情況,並收集有關信件。5月17日,公安部先行拘捕了胡風。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才舉行會議,投票通過了取消胡風人大代表資格的決議。²⁸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6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三批材料〉。6月20日,由人民出版社於合併前三篇材料並出版之,題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

舒蕪「編纂」第一批材料的經過,可以發現「材料」任意拼湊的狀況。「第一批材料」包含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舒蕪的原文〈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毛將舒原句「小集團」改為「反黨集團」);第二部分是附錄,胡風〈我的自我批判〉。關於第一部分,主體是34則書信片段,分別取自胡風致舒蕪的28封信和致路翎的1封信。簡述舒蕪的「創作」情況,舒蕪先是「按照林默涵同志所給擬定的四個小標題,進行摘錄、分類、註釋」²⁹,並在每一類摘引後面加了一段總結。論者以為,除了文前的〈編者按〉另有來歷(毛所撰),舒蕪作為這篇材料的編者,以及註釋和每一類摘引結語的撰寫者,這材料的著

²⁷ 舒蕪的原文題為〈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其〈編者按〉原是《文藝報》主編康濯所寫,其用語較為和緩。但在周揚將此文請示毛澤東後,毛親改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改寫之〈編者按〉用詞亦轉趨嚴厲。對於胡風事件政治性質的轉變,周揚、康濯等人亦感相當意外。參見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季羨林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511-519。

²⁸ 關於召開人大常委會的時間點,有兩種說法:一是林默涵說,5月16日之前(即胡風被捕前);二是梅志說,5月18日(即胡風被捕後)。胡風專案審訊員王文正的記憶應較為準確,他存有〈新華社十八日電〉,確認人大常委會在1955年5月18日舉行第十六次會議,會後決議拘捕胡風。見王文正,《我所經歷的胡風案:法官王文正口述》(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7),頁20-21。

²⁹ 舒蕪,〈第一批胡風材料發表前後〉,收《枝蔓叢叢的回憶》頁562。

作權和其責任當屬舒蕪無疑，而他多年之後在回憶錄中的卸責，實際上也是一種不負責任。³⁰

舒蕪在林默涵的指示下，在材料中使用下列標題加以分類：

一、從這一類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十多年來胡風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二、從這一類的材料當中，可以看出十多年來胡風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

三、從這一類材料當中，可以看出十多年來胡風為了反對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為了反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隊伍，怎樣進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動

四、從這一類的材料當中，可以看出胡風十多年來在文藝界所進行的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動，究竟是以怎樣一種思想、怎樣一種世界觀作基礎³¹

可以看到，中共先是設定題目、題綱（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進而擬定標題（上述四個標題）。先是確立打擊目標，之後才指示舒蕪依標題拼湊內容。而舒蕪在編輯材料的過程中，更不乏斷章取義、去頭去尾的作法。《胡風全集》第九卷中所收錄的書信，全集的編者將舒蕪摘引的信件，另以黑體字標記出來，從標記中便可清楚看到，舒蕪是如何「拼湊」和「製造」這些材料。論者張業松曾舉胡風批評聞一多的例子，證明舒蕪是如何顛倒是非。舒蕪在材料中稱胡風：「他把所有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一律罵作『蛆蟲』、『市儈』等等，甚至對聞一多先生加以侮罵，把他的進步也罵為投機。」然而經張氏比對後，整份材料中，胡風使用所謂「蛆蟲」和「市儈」等用語，分別僅出現過一次而已，何來「一律」之說；此外，經張氏考證雙方原始信件後，胡風之所以批評聞一多，實際上是為了答覆前一封舒蕪的來信（1944年11月23日），因為舒

³⁰ 張業松，〈剪接、拼貼、注釋與事實的再生產：胡風事件「三批材料」生產過程溯源〉，收王德威等，《一九四九以後》（香港：牛津大學，2010），頁232。

³¹ 舒蕪，〈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人民日報》，1955年5月13日，第3版。

蕪在這封信中提到：「聞一多之為人極不堪。最近的表現。投機而已。」表明是舒蕪評價聞一多「投機」在先，胡風附和舒蕪在後。³²

可以看到，儘管中共的政治壓力介入其中，但舒蕪的責任卻是難以迴避。舒蕪迫於政治壓力，撰寫批評胡風的文章以示對中共表態，原是無可厚非的行為，實際上也很多人這樣做了。然而，舒蕪實是難逃「言不符實」、「上綱上線」和斷章取義，必須承擔構陷胡風於罪的責任。

「第三批材料」問世後，中共已定性胡風為「反革命集團」，提升至全國層級的高度。6月14日，中共中央便下達〈關於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給各地黨委的指示〉：

一、《人民日報》已於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四日兩次發表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密信，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其中特別是五百萬能看報的知識分子）揭露這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特務分子集團的真相。這種揭露已經引起了廣大人民對胡風集團及類似胡風集團的暗藏在革命隊伍內的各種反革命分子的警惕，並開始起來揭露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二、鎮壓反革命運動，把公開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肅清了，現在的反革命分子，很多是用像胡風集團這樣的兩面派手法進行活動的、而對於這種玩弄兩面派手法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全黨的警惕性是很不高的。胡風集團居然能混在左翼陣營裏二十年，直到現在才被發覺，就是我們警惕不高的明證。直到現在，黨內黨外有一部分人，還認為胡風集團不過是文化特務，在文化教育機關以外是沒有這種特務的，因而是可以不加警惕的，甚至以為這不過是文藝思想問題，或文藝界派別鬥爭問題，中央是小題大做，認為胡風總還有些（功績），胡風的意見總還有些對的地方等等。在兩批材料發表之後，胡風集團的分子，順著我們來罵胡風，但既不揭露自己，也不提供有關胡風和他們自己

³² 張業松，〈剪接、拼貼、注釋與事實的再生產：胡風事件「三批材料」生產過程溯源〉，收王德威等，《一九四九以後》，頁235-237。

的政治背景的材料，企圖蒙混過關，保存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力量，我們有些同志也就不加警惕，相信他們。反革命造謠說共產黨仗勢欺人，說對共產黨連意見也提不得的等等，有些好人對這種謠言，也將信將疑。這些都說明，黨內黨外還是有一些人，對於暗藏的反革命，還是沒有足夠的警惕性的。

為了進一步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央已經準備好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其中顯示出胡風集團的重要分子阿壠原來是軍統特務；顯示出一九四六年阿壠和胡風是知道蔣介石匪幫反共戰爭的軍事部署的，並且因為蔣匪要徹底消滅我們而感到異常高興。至於胡風本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被國民黨逮捕兩次，均被釋放，到了日本又被日本政府逮捕後釋放，抗戰時期他和國民黨的張道藩、劉百閔、潘公展等 CC 分子往來甚密，並單獨被蔣介石召見過。為了各地有所準備，中央決定推遲到六月十日來發表這批料，同時發表社論。主要目的，就是要全黨和全國人民對胡風集團這一類的暗藏的反革命提高警惕。(後略)³³

由上可見，中共將「胡風份子」和「國民黨特務」掛勾，是為了強化逮捕胡風的正當性和必要性。當然後來我們也知道，當時這些所謂「罪證」，其實多數是任意拼湊、杜撰而來，與事實有很大出入。中共之所以要將胡風一派鬥垮鬥臭，表面是為了延續「鎮壓反革命運動」未竟之功，強調「階級鬥爭」和內部腐化的危機，以肅清革命隊伍內的不良分子，這種理由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來說，確實不難理解。另一方面來說，中共實欲藉打擊胡風、揭露其「真面目」，來為文藝整風的推波助瀾，塑造形勢來威嚇這些知識份子，號召他們進行深刻「反省」和「坦白」，這才是至關重要的目標。

胡風事件在胡風本人遭逮捕後，迅速擴展為全國性的肅反、清查工作。據相關部門的統計：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共觸及 2100 餘人，逮捕 92 人，隔離 62 人，停職反省 73 人。1956 年底，正式定名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

³³ 陝西省檔案館，全宗 123，目錄 40，案卷 1，頁 5-13。轉引自林蘊輝，《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頁 517-519。

78人（含中共黨員32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23人。至1958年5月，78人中給予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等處理的有61人。被捕的92人中，共有三人被具體判刑：1965年判處胡風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1966年判處阿壠、賈植芳有期徒刑12年。1965年底，胡風假釋出獄。1969年文革期間，胡風再被加判無期徒刑，再度入監。³⁴

在全國範圍開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行動，大量運用「文字獄」和「株連」的方式，確實在多數知識份子心中掀起不小的波瀾和震撼，還有許多胡風份子，是在睡夢中、沒有心理準備的狀態下被逮捕，並接受審查。誠然，此次運動符合毛「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說法，其鬥爭目的「不但在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份子，主要地是藉著這一鬥爭提高廣大群眾（主要是知識份子和幹部）的覺悟，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國民黨特務份子，帝國主義特務份子，托派份子和其反動份子）。」³⁵可以知道，胡風事件除了有對外整肅知識份子思想，亦有對內整頓革命隊伍的意涵，有其更深遠的政治目的。

肆 胡風案的平反

1978年，最高法院撤銷對胡風無期徒刑的判決，並宣布釋放。1979年4月，胡風因不服1965年的判決，因而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訴。198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黨組向中共中央作了復查報告。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此復查報告，即〈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的通知〉：

「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份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份子的，一律改正，恢復名譽……。凡因「胡風問題」受到株連的，要

³⁴ 林蘊輝，《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頁520-521。

³⁵ 〈中共中央關於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給各地黨委的指示〉（1955年6月14日）。轉引自林蘊輝，《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頁520。

徹底糾正。

造成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件錯案的責任在中央。³⁶

1980 年的復查報告中，仍保留評價胡風的三項政治性結論：「（胡風）把黨向作家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等正確的指導思想，說成是插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胡風等少數同志的結合帶有小集團性質，進行過抵制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損害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活動」；「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雖然在政治上為胡風平反、恢復名譽，但對於胡風的文藝思想，以及政治歷史問題的結論等方面，仍使用「過去的一些提法」，也就是尚留有「尾巴」，胡風家屬不能滿意。於是又經過相關部門的再次復查，時至 1988 年 6 月 18 日，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同意，中央辦公廳發出〈中央辦公廳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

一、〈通知〉中說：胡風把「黨向作家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提倡到工農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寫革命鬥爭的重要題材等正確的指導思想，說成是插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經復查，這個論斷與胡風同志的原意有出入，應予撤銷。

二、〈通知〉說：「胡風等少數同志的結合帶有小集團性質，進行過抵制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損害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活動。」經復查認為，在我國革命文學陣營的發展歷史上，的確存在過宗派的問題，因而妨礙了革命文藝界的團結。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時間長，涉及的人員也較多，不同歷史階段的矛盾還有不同的狀態和變化。從胡風同志參加革命文藝活動以後的全部歷史看，總的來說，他在政治上是擁護黨中央的。因此，本著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和團結起來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對這類問題作出政治性的結論。這個問題應從〈通知〉中撤銷。

³⁶ 中共中央批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復查報告〉（1980 年 9 月 29 日）。轉引自林蘊輝，《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頁 522。

三、〈通知〉中說：「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經復查認為，對於胡風同志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應按照憲法關於學術自由、批評自由的規定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由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正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決斷。這個問題也從〈通知〉中撤銷。³⁷

對胡風和其家屬而言，1988年的〈對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才撤銷了對胡風之政治性結論，並且不對文藝問題作出論斷，回歸所謂「雙百」方針。至此，可以看作是徹底恢復胡風的政治名譽，此時胡風也已不在人世了。胡風曾經堅持的文藝思想、觀點，以及學術創作的自由和獨立性，竟也要如此多年方能實現。

胡風個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對於外人來說可能並不特別重要。然而對於中共而言，如何「正確地總結」和「評價」歷史，則向來是一個相當重要、且具高度政治敏感的問題。儘管中共方面，使用所謂「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說法，迴避評價胡風個人政治歷史的問題。但是中共使用官方文件，以確認一個人的「政治標準」合格與否的作法，亦足證明現代中國「泛政治化」的現象。

³⁷ 〈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1988年6月18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冊，頁27。

第二節 胡風事件溯源

壹 胡風事件之遠因：文藝理論的衝突

在導論文獻回顧的部分可以看到，已有許多論者談到胡風與毛澤東在文藝觀點上的差異，筆者希望在此略作補充。在當代中國文學史脈絡下，「現實主義」(realism)無疑是一重要的文學理論典範。而下文所欲探討的重點，在於現實主義的發展的源流，以及胡風與毛澤東各自是如何理解現實主義，因而在概念上形成衝突。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除了現實主義思潮進入中國。當時許多知識份子深受「進化論」的影響，因而接受文學發展的階段論，認為必須經歷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潮發展(理想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溫儒敏認為，五四的現實主義作家多半是「為人生」的理解，凡是密切聯繫現實生活的創作都可以說是「為人生」，但這種理解會造成過分強調文學的功利性(如教化民眾、足救時弊等)。魯迅的小說創作深受「為人生」的影響，他既認同文學的功利性，也主張文學有利於「思想革命」。魯迅重視外國現實主義正視現實、如實描出的精神，並致力於「國民性」的批判，從而將現實主義推到有目的的解剖反映社會的高度。³⁸

胡風自認承襲了「五四」和魯迅「現實主義」的精神，胡風談到「五四」之於文學的意義：

我們把五四的新文學叫做「革命文學」，我們驕傲這個革命傳統，正是因為它代言了一個偉大的精神：不但用被知識份子發動了的人民底反抗帝國主義的意志和封建買辦底奴從帝國主義的意志相對立，而且要用「科學」和「民主」把亞細亞的封建殘餘摧毀。

³⁸ 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25-27。

當時的「為人生的藝術」派和「為藝術的藝術」派，雖然表現出來的是對立的形勢，但實際上卻不過是同一根源底兩個方向。前者是，覺醒了的人把他底眼睛投向了社會，想從現實底認識裡面尋求改革底道路；後者是，覺醒了的「人」用他底熱情膨脹了自己，想從自我底擴展裡面叫出改革底願望。如果說，前者是帶著現實主義的傾向，那後者就帶有浪漫主義的傾向了，但他們卻同是屬市民社會出現的人本主義底精神。

這原來不應該分裂的兩種精神，在偉大的先驅者魯迅裡面終於得到了統一。³⁹

胡風所謂的「五四革命文學」，是以對抗帝國主義（對外）和封建主義（對內）為目標，其中存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股流向，而最後是在魯迅身上「得到了統一」。胡風既承襲了魯迅的批判性現實主義，還有他的人文主義關懷精神。

「五四」在政治、經濟、外交等面向具多重意涵，此處著重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回顧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發展，並非單向、一元的發展，1917年的新文化運動，承襲了自晚清以來的革新概念，在文學界倡議改革，從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所提倡的白話文學，以及陳獨秀所提出的「文學革命」，都表明了此時期文學上求新、求變的多元思潮，而其共通性在於：「重估一切價值」。⁴⁰現在來看「五四」時期，誠然是一個思想紛雜的時代，左、右派思潮各有其擁護者，而思想選擇往往也影響其政治選擇，胡風和毛澤東對於現實主義各自有其理解，胡風是從文學家、作家的角度看待理論問題；而毛澤東則更像是政治家，毛的文藝理論乃是服膺於政治需要，具有更明顯的功利性質。

³⁹ 胡風，〈文學上的五四：為五四紀念寫〉，收《如果現在他還活著：後期弟子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26-27。

⁴⁰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2001），頁3-6。

一 毛澤東的「現實主義」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的文藝觀點，傳統論者認為多承襲自馬克思、列寧以及史達林。⁴¹談到關於「現實主義」的問題，馬克思並沒有明確的論點，他只是激烈地反對浪漫主義，而恩格斯對於現實主義則有所發揮，他認為現實主義除了細部、細節的真實外，還要正確地表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⁴²

馬、恩二人未盡完善的文藝思想論述，乃由其後繼者列寧所繼承，列寧更致力於明確文藝與共黨關係的論述，故列寧更應被視為共黨文藝理論的建構者。列寧於 1905 年發表的〈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便指出，出版物應當是黨的出版物，寫作事業不應該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應該是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該是在黨的組織、計畫的統一下運作。⁴³列寧還說，文藝不能脫離共黨的指導，一切出版事業應在共黨的監督之下，作家們也應加入共黨組織，並接受黨綱和決議的約束。⁴⁴列寧更強烈要求作家應具有「黨性」。大體而言，列寧為共黨文藝政策和組織、管理方式設計了一藍圖，不論是寫作事業還是作家，皆在此一牢籠的掌控之下。

至史達林時期，史達林將俄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融會而成「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文藝方面，史達林運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詞彙，給予文藝作家和作品更為嚴格的指導和規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其革命上和政治上的目的，而非單純追求文學、藝術上的「寫實」。在寫作方法上，作家必須以「歷史樂觀主義」來認識生活現象，也必須配合政治功利上的目的：在奪取政權之前，以暴露敵人的黑暗面為主；攫取政權後，以歌頌社會主義的光明面為主。由此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具有明顯的政治功利性質，並非單純的審美藝術標準。

⁴¹ 周玉山，《大陸文學與歷史》（台北：東大，2004），頁 1。

⁴² 恩格斯，〈恩格斯給哈克納斯的信〉，收錄曹葆華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年），頁 6。

⁴³ 周玉山，《大陸文學與歷史》，頁 8。

⁴⁴ 徐瑜，《中共文藝政策析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23。

從毛澤東現存的文件和談話中，除了反映毛個人的文藝觀點，毛實際上還具有處理文化工作者與革命事業、文化與政治等關係的企圖。而毛澤東本人的文藝思想，更在延安整風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逐步形成為中共的「黨文化觀」⁴⁵。

談到毛澤東關於文藝方面最重要的論著，則不能忽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日至5月23日，中共中央在黨內整風的基礎上，邀請文化人召開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會議中，毛以黨的領導人的身分作總結式發言，是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文幾經潤飾和編修後，1943年10月19日發表於《解放日報》，後來也收錄於《毛澤東選集》中。〈講話〉一文，可視作毛式文藝觀的具體表述，隨著毛在黨內權力的確立，〈講話〉的內容亦逐步成為中共黨的文藝觀點。⁴⁶同年11月，中共中央宣部所發佈的《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其內容旨在確認毛在〈講話〉中的文藝觀點，和黨的觀點並無二致，至此正式形成黨的文藝政策文件。毛澤東的〈講話〉不僅是毛個人的理論闡述，它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文藝運動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後更成為中共制定文藝政策指導文藝運動的根本方針。⁴⁷

簡述毛澤東〈講話〉的核心內容：一，文學藝術是為工農兵而創作；二，藝術家應深入群眾生活；三，藝術是為政治而服務。⁴⁸學者認為，〈講話〉所提出的問題，主要環繞著黨應如何領導文藝的根本性政策問題，包括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政治、內容與形式、普及與提高、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文學批評標準、對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以及文藝隊伍的建設、統一戰線等問題，這些「多屬所謂文藝『外部關係』問題，而對文藝本身的規律細節討論較少。」⁴⁹毛澤

⁴⁵ 所謂「黨文化觀」包含五個核心概念：一，中共領導文藝的基本方向為「工農兵方向」，此為文藝家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二，知識份子須接受「無產階級」的改造；三，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的體現，革命文藝家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四，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的陰暗面；五，強調「民族形式」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352。

⁴⁶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頁351。

⁴⁷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496。

⁴⁸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847-879。

⁴⁹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497。

東提出革命文藝應是「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毛將文學創作的對象指涉為「大眾」，即廣大的普通民眾（主要是農民）；對於知識份子則呼籲「思想改造」，不容許過多的個人自由，並且在寫作上應追求「大眾化」，要「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工農兵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毛澤東主要從政治家的角度要求文藝界思想的統一，立場要有所轉變，其途徑就是與工農兵結合，以解決思想統一的問題和創作泉源的問題。⁵⁰

既已確立了工農兵的寫作方向，毛澤東更進一步闡述文藝與政治的關係：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併行或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51

毛之所以強調文藝從屬於政治，有其特殊之歷史時空背景（抗日戰爭），以及革命上的現實需要。也因此造成文學上的一些負面效果，諸如公式化、概念化等寫作僵化、題材單一等情況。

至於毛澤東對於文學作品的優劣評斷，則可見於以下論述。毛澤東在〈講話〉一文中，曾談到動機與效果的關係，他提到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然而何謂「好」與「壞」的政治標準呢？毛說：「一切利於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與前述相反，便是「壞」的標準。如何判斷好、壞的標準，毛提出了動機（主觀願望）和效果（社會實踐）這組概念：

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定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統一論者……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

⁵⁰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 499。

⁵¹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865-866。

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⁵²

可以看到，毛澤東相當重視文藝作品所帶來的效果（社會實踐），儘管毛批評機械唯物論強調效果否認動機這種論點，但是毛所提出以社會實踐來檢驗動機，仍然是將社會實踐放在較高的位階，好的動機不見得會產生好的效果，但是壞的效果則肯定不具備好的動機，這就是他所說的「動機和效果統一論」，其所謂之「標準」，只存乎毛的內心世界。

二 師承魯迅：胡風的「現實主義」

毛澤東和胡風文藝思想的分歧，首要是對於「現實主義」理解的差異。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曾表示：「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此時的毛，直言反對暴露革命隊伍的陰暗面。儘管毛也聲稱，他並不反對雜文對革命群眾和革命政黨的批評，但這種批評「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⁵³由此可以看出毛式文藝觀的政治功利性質，僅允許「有利於革命」創作的存在。

談到胡風的現實主義理解，必須簡述 1940 年代在國統區所發生的現實主義與主觀論爭。胡風自 1930 年代起，就開始批評創作中的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胡批評了當時蘇聯傳入的「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認為唯物主義的教條忽視了作家本身的體驗和感受。在 1930 年代中期，胡也批評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口號傳入後，只注重作品的理想性和激勵作用，同樣忽略了創作中主體性因素。胡風在 1948 所寫的《論現實主義的路》，有其對於現實主義的理論性闡述，胡風認為現實是主觀體驗過的現實，是作家親耳所聞、親眼所睹，是所謂的「感受世界」；此外，在作家心中還有一個理想化的世界，胡風稱之

⁵²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868。

⁵³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 872。

為「觀念世界」。而現實主義創作的過程就是這兩個世界的「相生相剋」的過程。⁵⁴

論者在分析胡風現實主義理論時提到，胡風現實主義的核心是強調主體性，其認識論為馬克思唯物主義，但反對屈就客體的機械唯物論，反對文學上的客觀主義傾向；強調藝術創造過程中體驗的重要作用，胡風所說的「主觀戰鬥精神」、「到處有生活」、「精神奴役創傷」，都是主體性的體現。論者並指出，胡風和周揚分別代表現實主義中國化的兩種潮流：周揚的現實主義是文學理論與政治話語、權力話語的結合，在政治功利主義的影響下，因而獲得權威性；胡風的文學理論亦有濃厚政治色彩，但是他反對以政治標準裁決藝術和學術上的是非。⁵⁵

胡風的理論文章確不易讀，魯迅曾說：「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眾化……」⁵⁶大體而言，胡風對文學理論的見解有其堅持，並不輕易「附和」毛〈講話〉的內容。胡風在題材上主張「到處都有生活」，認為作家在題材選擇上有充分的自由，這和毛主席主張工農兵方向就存在衝突。而胡風提出的「精神奴役創傷」，則是承襲五四改造國民性的問題、正視人民的缺點，也批評當時將人民理想化、抽象化還有貶低知識份子的情況。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風的文學理論和毛氏文藝觀存在諸多差異。

如果能夠同意胡風繼承了魯迅思想此一論斷，那麼分析魯迅、胡風和毛澤東思想的差異，將能進一步說明毛、胡的對立因素。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一文中曾說：

這時（按：革命成功後），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後，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採用起

⁵⁴ 見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頁 506。

⁵⁵ 周燕芬，《執守·反撥·超越：七月派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21-123。

⁵⁶ 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2005）第六卷，頁 555。

來，在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割掉他的頭，前面我講過，那是頂好的法子，——從十九世紀到現在，世界文藝的趨勢，大都如此。⁵⁷

魯迅這番話無疑是有遠見的，一旦革命取得成功，不論雜文還是任何不滿於現狀的批評，也將勢必鳥盡弓藏了。何況在毛〈講話〉發表之時，「革命」還尚未成功，毛已不容雜文這種「異音」的存在。

胡風和其友人們，對於毛式文藝觀的不滿所在多有。向來與胡風友好的張中曉（在胡風案中被列為「胡風份子」），就曾明確表達其對毛〈講話〉的批評，他在 1951 年 8 月 23 日給胡風的信中談到：

關於魯迅雜文的一段，是完全不對的。雜文，是從現實人生要求中隨處發掘出一切新思想的鋒利的鋤頭。假如僅僅把它看作「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之下，沒有言論自由，故以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按：毛講話中所言）才「正確」，那就根本沒有讀懂魯迅。

其他當然還有好幾點。以上的一些，我覺得特別重要，而且深刻的感覺得它是不對的。總觀全書，其本質是非現實主義！

這書，也許在延安時有用，但，現在，我覺得是不行了。照現在的行情，它能屠殺生靈，怪不得幫閒們奉之若圖騰！⁵⁸

張中曉將毛的〈講話〉譬喻作「圖騰」，也暗諷和挖苦了文藝界的「幫閒們」（按：意指中共文藝官僚）奉毛〈講話〉為圭臬的情況。

胡風作為魯迅的忠實追隨者，他曾在文章中闡述其對魯迅雜文的看法。胡風認為，魯迅的雜文時常是從日常瑣事中，點出背後的原則問題和思想模式。魯迅雜文除了主張批評時弊，更看重其思想基礎。魯迅雖偏好使用尖銳、刻薄

⁵⁷ 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台北：谷風出版社，1980），第七卷，頁 114。

⁵⁸ 張中曉給胡風的信（1951 年 8 月 22 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轉引自李輝，《歷史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頁 102-103。

的筆鋒針砭時弊，但胡風也為魯迅辯解，魯迅曾說有所謂「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熱諷」的區別，「冷嘲」者是在一旁說風涼話、認為世事無一可為；而「熱諷」則反之，實際上魯迅對諷刺的對象充滿深厚的同情，是故魯迅的雜文刻意名之為《熱風》。胡風評論魯迅《熱風》的主要精神：第一，可以看到魯迅「反妥協」、「反改良」、「反虛偽」的精神；第二，他所談的都是從實際出發的小問題；第三，他是有人道主義的。⁵⁹

誠然，胡風自視其文藝理論傳承魯迅的教導，論者翟志成指出，胡風一派所堅持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其認為凡屬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必須要通過作家的主觀戰鬥精神（作家的自我）與客觀實踐（作家的生活體驗）相結合方能產生。而套用共產主義理論和教義指導創作，就是文學上的「機械唯物論」，因此會形成缺乏作家的生活實踐的「主觀公式主義」的作品。翟氏認為，胡風一派對「公式主義」、「客觀主義」的攻擊，實際上便是對中共文藝領導權的一種否定。⁶⁰此論述也提供給我們更多思考，胡風事件中除了文藝理論的長期紛擾這一因素外，是否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貳 胡風事件的近因

前文已經論及，毛澤東、胡風在文藝理論上的差異，也有論者提及中共文藝領導權的爭奪。筆者以為，「文藝思想衝突論」並非影響胡風事件的最主要因素。儘管毛澤東向來關切文學問題，但更多時候毛是站在最高領導者，從政治觀感、政治影響的觀點來看待問題。以胡風事件來說，毛澤東顯然欲藉胡風一案來達成其政治目的，也就是進一步推動文藝整風，和之後全國性的肅反運動。此外，當中就有幾個重要因素，觸動了毛敏感的政治神經，使他對胡風必欲除之而後快。

⁵⁹ 胡風，〈關於魯迅的雜文〉，收《如果他還活著：後期弟子憶魯迅》，頁128-129。

⁶⁰ 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45。

一 胡風對「改造」的不滿情緒

由於舒蕪和胡風往來信件，將胡風的內心世界公諸於世。然而，胡風的真實想法何以觸怒了毛？筆者以為，胡風長期以來對中共文藝幹部的敵視心態、文藝界的派系競爭，以及檯面下的集團式運作、黨內幹部的「通風報信」，⁶¹在在碰觸了毛敏感的神經。此外，胡風對於毛式文藝觀點的批評，以及胡在人前人後「面貌」的不一致，都是促成性質轉變的原因。那我們便接著要問，何以胡風的真實想法，會不見容於毛呢？

如果能夠同意，中共整風的目的，在於讓知識份子揭露內心的真我，使之無所逃於黨的法眼，然後再進行無止盡的檢討和自我批評（實乃自我詆毀和自我貶低）。那麼便不難理解，胡風私信的揭發是如何觸怒了毛澤東，其中多所顯示了胡風的不順從和不滿，此正說明了中共對胡「改造」的失敗。

學者翟志成曾分析「胡風集團」是如何運用策略來對抗中共文藝領導，首要方針便是「保存力量」。胡風曾去信路翎、張中曉，反對他們在文字上與中共領導正面交鋒，提醒他們要站穩「立場」和警惕「態度」，以免落得中共批評之口實。實際上，胡風則使用表面擁護毛〈講話〉、寫應景八股文章、爭取領導、爭取入黨等作為。⁶²在翟氏看來，胡風一派的作法顯然具兩面性，表面上對中共領導表現服從，實際上以推翻文藝領導之現況為目的。

至於胡風的內心世界，可以從胡風寄給妻子梅志的信件中略見一二。文藝整風開始之初，胡風是怎麼看待整風的：

新花樣又來了：開始整風。明天要聽大約是軍師（按：胡喬木）、子周（按：周揚）之類的報告。還要我參加一組開會呢！他們是，盡可能地在玩耍權威。我想，要參加就參加罷。將盡量給他們面子。不過，

⁶¹ 胡風和其友人信件往來頻繁，私下皆用暗語稱呼中共文藝官僚，被中共視作「反革命」的罪證。而在胡風〈報告〉的撰寫過程中，實際上是多人（路翎、徐放、謝韜、綠原和其他等）的集體創作，組織下而有團體運作，亦不為中共所喜。「胡風集團」成員中，聶紺弩、劉雪葦、彭柏山等皆為中共黨員，偶爾也會透露黨內的政治風向給胡風。

⁶² 翟志成，〈魯迅與胡風之反控制鬥爭〉，《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頁 80-81。

我將不說什麼意見。此事不必為外人道。⁶³

我去參加了「所」的一次「漫談」，空虛之至。我看，這一「整」，將不會有什麼結果，只有更萎縮下去的。但在他們自己，又一定是「基本上成功」的。我看，人們都乾枯而虛浮，精力浪費得實在可惜得很。誠實的人應該自己做事，不過，現在的情形，不給浪費精力實在難得很。……⁶⁴

面對文藝界整風，胡風顯然覺得不甚耐煩，所以選擇陽奉陰違。就胡風看來，「整」的結果只會讓教條主義更為「猖狂」，最終導致文藝創作的進一步萎縮，文壇的「生氣」也「非再窒息一兩年不可」。

前文提到，19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了舒蕪的〈從頭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同年7月19日，胡風應周揚「討論文藝思想之邀」進京，9月至12月間，在北京共開了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

進京檢討的胡風，此時亦試圖揣摩黨內的政治風向。胡風在信件中談到與陳家康談話的內容：

上策，靜聽他們批評，是錯的地方檢討，不錯的地方不理，也不反撥；中策，一句話不說，另外做什麼工作或研究去；下策，公開討論，成一對立形勢。他說下策萬萬不可取。……不用說，是一個人事問題。但誰也不承認是人事問題。就是如此。上次談話中，他說，你向來批評人，現在就是要你也認一次錯。也就是所謂拿下架子的問題。這次不這樣明說了，改成了尊重毛澤東思想，檢查自己，是一件好事，云云。⁶⁵

⁶³ 胡風致信梅志（1951年11月28日），曉風編，《胡風家書》（上海：復旦，2007），頁255。

⁶⁴ 胡風致信梅志（1951年12月2日），曉風編，《胡風家書》，頁258。

⁶⁵ 胡風致信梅志（1952年7月28日），曉風編，《胡風家書》，頁281。

然而，胡風還是未選擇「上策」（即接受中共的批評），他堅持「要麼，公開討論，要麼，一聲不響」。顯然，面對上面檢討的壓力，胡風也許願意寫官樣文章、寫檢討文章，他可以為「生活態度」（即不尊重領導）作檢討，但是在文藝理論問題上，胡風卻是半步不肯退讓，他說：「（在態度問題）以後是理論問題，但這是要對歷史對真理負責的東西，不是什麼個人受『屈』的問題，我只有實事求是，一寸也不能馬虎的。」⁶⁶

胡風檢討文章〈對我的錯誤態度的檢查〉已上呈中央，但是接下來是毫無反應的「冷戰」。胡風可能自己也明白，他所做的檢討並未符合黨的標準，胡說：「這幾年來，我們當作一個爭真理的問題看，那是基本的錯誤，我們太不懂這個社會了。」⁶⁷確實，胡風一直想把「態度」和「理論」問題分開處理，在「態度」方面選擇性承認錯誤，但堅持「理論」的公開討論，殊不知中共的「思想改造」，其目的便是完成在政治、文化、思想等領域的一元化領導。

在「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接近尾聲時，胡風是這樣記載：

最後一次會，晚八時到一時過或二時左右。發言者有胡（按：胡繩）、邵（按：邵荃麟）、艾（按：艾青）、田（按：田漢）、子周（按：周揚），還有師爺（按：陽翰笙）。兩次，師爺都參加了的，可見嚴重程度。內容不必說了，應有盡有。至於態度，理論上給以根本否定，政治立場卻給以全盤肯定。態度，是好的。結論呢，要我自己做。待要我發言，已無時間了，詩人（按：何其芳）嚷著明天還要開會。說了我的態度和收穫。對無恥（按：舒蕪），只簡單提了一點。沒有時間，他們也無心來研究問題。就這樣，告一段落了。⁶⁸

胡風文藝理論座談會，如此虎頭蛇尾地收場，恐怕胡風也覺得莫名其妙。會中肯定了胡風的政治立場，但在「態度」上卻完全否定，這個必須由胡風「自

⁶⁶ 胡風致信梅志（1952年8月6日），曉風編，《胡風家書》，頁287。

⁶⁷ 胡風致信梅志（1952年9月6日），曉風編，《胡風家書》，頁304。

⁶⁸ 胡風致信梅志（1952年12月12日），曉風編，《胡風家書》，頁350。

己來做的結論」，此時顯然他還未能意會的是：能夠「過關」與否，正取決於他的「態度」表現。

二 胡風與周恩來的接觸：跨越組織原則

在談論中共和文藝工作者關係時，可將經濟、人事組織兩部分分別討論。經濟上，中共欲將文藝工作者全數「包下來」，建政初期中共便將全國職業作家組織加入「文協」、「作協」，成為文藝幹部，領的是「文藝級」幹部待遇，依幹部級數之分別，領取不同的薪酬。就人事組織管理而言，文藝工作者亦屬公職幹部之列，中共管理其錄用、調配、任免、使用、升遷、交流、培訓、考核、獎懲、監督、工資、福利等全方位活動。幹部管理的首要原則是「黨管幹部」，所有幹部都由中共各級黨委管理，而在「黨管幹部」的原則下，實行分級管理制，一般來說是「下管兩級」。⁶⁹

胡風和周恩來間的接觸，始於 1930 至 1940 年代，期間胡風在武漢、重慶辦《七月》和《希望》雜誌，當時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周恩來，都曾給予道義和經費上的支持，還為他安排工作解決生活待遇之問題。⁷⁰用胡風自己的話講，當時他是「間接受周的領導」，直至中共建政後，胡風都還和周恩來保持通話的管道。而胡風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他屢屢透過關係找上周恩來，希望周的「關切」能夠幫助他解決人事問題：

剛才宴會上知道，父周（按：周恩來）為我事囑人打電話問軍師爺（按：胡喬木），回答說二三日內即解決，我提過劇團，但他們希望我到清華擔任課。云。父周底意思是，兩者都可以搞，很好，云。那麼，也許不久軍師爺要找我談話的。教書，決不幹。我不讓他們把我塞到冷廟裡去。劇團，我看他們也是無法安排的。至於父周，現時正忙於開老區代表會，過後又是政協全國委員會，恐怕還是一個不能見面。我看，慢慢磨罷。……⁷¹

⁶⁹ 林蘊輝，《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頁 472-473。

⁷⁰ 周正章，《笑談俱往：魯迅、胡風、周揚及其他》（台北：秀威資訊，2009），頁 188。

⁷¹ 胡風致信梅志（1951 年 10 月 9 日），曉風編，《胡風家書》，頁 241。

胡風寫信給周恩來，除希望由周來解決其工作問題外，還有政治問題：

今天給父周寫了信，明天送出，表明了政治要求，申請審查。⁷²

已有研究者指出，胡風未曾瞭解毛澤東與周恩來間權力關係的消長，是胡的一大失誤；此外，胡風將一切打壓，皆看做是周揚「隻手遮天」的行為，而未能看透周揚實是貫徹毛的文藝方針，以及毛、周間的主從關係。⁷³在延安整風後，高層政治格局中，已顯見毛澤東與周恩來間的權力消長。周恩來的「經驗主義」，已飽受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個人權威的進一步確立，毛才是具掌握「最終決定權」的決策者。尤其在毛歷來關心的文藝議題上，周恩來也曾提點過胡風：「理論問題還是應該聽主席的。」可惜，胡風似乎還是出現了政治判斷上的錯誤，誤以為周揚、何其芳等人的打壓，是帶有個人恩怨的宗派主義行為，而周恩來才是最終拍板者，還以為上書周恩來可以扭轉此一劣勢：

可以看得出來，此事還是父周在指揮，而且總得談，而且最後還得要父周來作主的。⁷⁴

胡風除了未能深刻體會高層政治氛圍，實際上他也甚少經歷「組織生活」（胡風未曾正式入黨），所以在走投無路之際，選擇上書中央，力陳執行文藝政策執行者的錯誤，期望說服高層決策者改弦更張，以達成「清君側」的目的。從往後中共歷史來看，不論是陳企霞的「匿名信」事件、抑或彭德懷的「萬言書」，上書中央、「直通天聽」的做法，似乎難有好結果。筆者以為，由於中共向來強調「民主集中制」領導，試圖跨越中共組織階層的上書行動，或是區別對待領導階層的行為，亦或許觸碰了組織紀律的敏感處。

⁷² 胡風致信梅志（1951年12月3日），曉風編，《胡風家書》，頁259。

⁷³ 周正章，《笑談俱往：魯迅、胡風、周揚及其他》，頁185-186。

⁷⁴ 胡風致信梅志（1952年8月27日），曉風編，《胡風家書》，頁298。

三 毛澤東作為關鍵決策者

胡風和其相關的文藝問題，本應由中共中央文藝主管機關（即中共中央宣傳部）所負責。但我們可能會問，毛澤東是從何時開始關注胡風問題，又從何時開始介入？而終將其定性為「反黨」、「反革命」的高度？

前文已經提到，中共中央從 1952 年就決定開始公開批判胡風，當時中共對胡風的態度，是希望他主動檢討、打掉他的「架子」，好好進行思想改造。據當事人林默涵的回憶，在 1952 至 1955 年間，主要是周揚在負責部署批評胡風的相關事宜，而周揚向上徵詢的對象，主要是總理周恩來。從 1952 年 7 月間周恩來、周揚間的信件往來來看，周恩來（高層方面）是同意周揚的批評步驟：先由中宣部召集黨內文藝幹部討論胡風理論，由林默涵為中心發言人，安排小型座談會讓胡風進行自我檢討和批評。

7 月 23 日周揚致信周恩來（前文已引此信前段，見第肆章第一節），此信末段談到，處理胡風問題的過程和步驟：

上海文藝整風開始的時候，夏衍同志曾問及對胡風如何處理。我寫信給夏衍、柏山同志，主張積極吸引他參加學習並對領導提批評的意見，然後採取適當方式，對他的文藝思想進行批評，幫助他作自我檢討。他在整風中寫了一篇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十周年的文章，其中對自己的文藝思想毫無批判，此文，上海方面沒有發表。對胡風理論的批評，上海方面表示困難，沒有進行。同時，北京《人民日報》發表了舒蕪的自我檢討的文章，按語已正式提出胡風理論錯誤的問題，最近《文藝報》發表了有關胡風思想的兩封讀者來信，胡風更急切地要來北京，而這個批評的工作，也只有由北京來做了。他于 19 日到京，現住文化部。我已和他談了一次話，我表示希望他能對自己過去的理論採取客觀的批判的態度。我們準備由中宣部先召集少數黨內的文藝幹部討論胡風的理論，指定由林默涵為中心發言人（他正在準備），雪峰、丁玲等同志都準備發表意見，黨內討論意見一致後，即召開討論胡風理論的小型文藝座談會，由胡風首先作自我檢討性的發言（我已

告他準備，估計他的自我批評不會很好)，然後大家發表意見，進行辯論。批評的文章，選擇一兩篇好的在報上發表。如果他的發言有較好的自我批評，也可以發表，我們當努力爭取他轉變和改正自己的錯誤。

以上意見是否妥當，請示知。

致此

布禮

周揚 7.23⁷⁵

周揚對周恩來事無鉅細，上報處理胡風問題的經過。文中提到，上海方面難以進行胡風文藝理論的批評，或許是因為彭柏山（後被定為「胡風份子」）掩護。中宣部擬定批評的策略，先是黨內統整意見一致，方才召開文藝座談會。

7月27日，周恩來在回覆周揚的批示中說：

周揚同志：

同意你所提的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檢討步驟，參加的人還可加上胡繩何其芳，他們兩人都曾經對胡風進行過批評。不要一次就得到大的結果，但他既然能夠並且要求結束過去二十年來不安的思想生活，就必須認真地幫助他進行開始清算的工作。一次不行，再來一次。既然開始了，就要走向徹底。少數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讀者，和他進行批評鬥爭。空談無補，就要把他放在群眾生活和工作中去改造，一切都試了，總會有結果的。

周恩來

7月27日⁷⁶

⁷⁵ 周揚致信周恩來（1952年7月23日）。轉引自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季羨林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479-480。

⁷⁶ 〈周恩來給周揚的批示〉（1952年7月27日）。轉引自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季羨林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480-481。

中宣部依照周恩來的指示，自 1952 年 9 月起，陸續安排了四次胡風文藝思想的座談會。1952 年 2 月中宣部回報座談會的情況，送交〈關於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經過情況的報告〉予中央，周恩來在看過此報告後批示：

對胡風的方針和態度正確。已告中宣部應該堅持下去，繼續對他的思想作風和作品進行嚴正而深刻的公開批判，但仍給予工作，並督促其前往前線或工廠與農村中去求鍛鍊和體驗，以觀後效。⁷⁷

從以上文件中，可以看到高層決策者（中共黨中央）和執行者（中宣部）的決策、溝通過程。基本上，此時中共黨內對胡風，仍是採相對溫和的態度：以「爭取」和「改正錯誤」為主。傳統說法所謂：「周揚乃挾個人宗派恩怨」，來對付胡風，可能是不盡公平的。從執行者中宣部的具體作法來看，是針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錯誤、態度錯誤進行批評，至少表面上並未剝奪胡風的工作權，但認為胡「不適合擔任批評性的文藝刊物（指《文藝報》）的編委」，實際上胡風和其友人在文章發表上，確實是處處受挫。

早在中共建政前，毛澤東已然知道胡風這一號人物。毛澤東實際著手處理胡風和其文藝思想等問題，則大致在 1953 年左右。前文提到，1953 年初，林默涵〈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何其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二文，實際上反映了對中央胡風文藝思想的想法，也開啟了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公開批評，可以推測此時期中共中央對胡風問題的決策，主要是由周恩來和中宣部在處理，毛澤東可能無暇顧及於此。然而在林默涵公開批評胡風文藝思想後，一位民眾在聽取林的報告後，感到不解和苦惱，故寫信向毛澤東反映此情況。毛看過此信，後隨即批示中宣部副秘書長熊復：「此事請你調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⁷⁸代表毛開始關心胡風和其文藝思想的問題。

⁷⁷ 〈周恩來對中宣部的批示〉（1953 年 3 月 5 日）。轉引自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季羨林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 483-484。

⁷⁸ 〈毛澤東在一封人民來信上的批語〉，手稿，1953 年 3 月 4 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 300。中共曾發佈〈政務院關於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文件中政務院指示：「各級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門對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的工作，應經常檢查總結、定期向上級報告。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和中央直屬省市人民政府，應每半年向政務院作一次關於處理此項工作的總結報告。」，筆者猜

1954年秋、冬左右，《文藝報》已開始集中火力批評胡風，開始全面批判胡風過去的發言。據康濯的說法：《文藝報》批判胡風乃是毛澤東交下的任務。1955年始，《文藝報》在合刊上附發《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即擷取自1954年胡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並且連續數期在報上重點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另一方面，《文藝報》除了批判胡風，也持續督促胡風進行自我批判，胡風所寫的〈我的自我批判〉，在《文藝報》的批評協助下，修改至三稿才大致符合其要求。1954年3月左右，《人民日報》已收到舒蕪的私信材料，並轉至中宣部林默涵處。經林默涵、周揚過目後，覺得此材料相當重要，於是又交回舒蕪編寫註釋。

此時毛澤東的介入值得重視。據當時《文藝報》編委康濯回憶，那時《文藝報》已備妥發稿，但周揚表示胡風問題應當先請示毛主席，在毛澤東看過此二文以及康濯所寫的按語後，毛說：

周揚同志：

按語不好，改寫了一個，請你和陸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為可用，請另抄付印，原稿退還給我為盼。

毛澤東 5月11日

後面毛還有兩段話，分別是：

如不同意，可偕定一千今晚十一時以後，或明日下午，來我處一商。

可登人民日報，然後在文藝報轉載，按語要用較大型的字。⁷⁹

測毛所看到的人民來信，應是機關彙整後所呈上。〈政務院關於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1951年6月7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

⁷⁹ 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518。

毛澤東覺得，康濯原本的按語過於溫和，他便自行「改寫了一個」。據康濯回憶毛澤東修改稿件的情況：

文前我（按：康濯）寫的那個按語，主席畫了個框框，中間打了個大叉。最後是舒蕪的材料，毛主席把這個材料的題目改了，原題〈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改成了〈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

我還發現，主席看清樣是很費力的，我們排的新五號字，很小、很密，主席一邊看，一邊拿了一枝鉛筆，每一行每隔三五個字都要在旁邊畫一點，一直畫了兩萬多字。⁸⁰

1954年5月13日，便決定由《人民日報》公佈〈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同時發表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以及毛改寫的按語。胡風事件的政治性質的轉變，目前多認為乃是毛澤東「欽定」之。據上述康濯的回憶，舒蕪的揭發材料，是在周揚上呈請示毛澤東後，毛寫下了上述批示、並改寫按語（也就是後來見報的〈編者按〉），用詞才轉趨嚴厲、強硬許多。最後，毛還大筆一揮，將舒蕪原題〈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改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從「文藝小集團」、「反黨集團」到最終「反革命集團」的提法，多數人相信這是毛澤東為胡風定性最關鍵的證據。

還有一段插曲，在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發表當天，胡風就致電周恩來，表示《人民日報》錯刊他的稿件，報上刊載的是〈我的自我批判〉的二稿、加上三稿的附記，而非胡風最終定稿的三稿。於是，周恩來隨即撥電給主管《文藝報》之周揚，以及《人民日報》的鄧拓，要求核實並發文檢討。至於該如何檢討，由袁水拍、林默涵、康濯等人聚會周揚家中商討，周揚決定向上請示毛澤東。隨後周揚帶回毛的口諭：「主席說，什麼二稿三稿，胡風都成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報》的稿樣為準，要《文藝報》按《人民日報》的重排。」此外，周揚還透露：「主席說，胡風是要逮捕的，不過他是全國人大代表，必須經過人大常委會批准以後才能逮捕，這件事已經同少奇同志和總理商量的了，還得要

⁸⁰ 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519。

幾天才能辦妥。」⁸¹其中的轉折，也可看出毛澤東決策在先，其他高層人士（劉少奇、周恩來）知情、跟進在後。

至於其他文藝官僚當時的態度為何？當事人胡喬木的回憶中說：「抓胡風，我是不贊成的。毛主席寫的那些按語，有些是不符合事實的。胡風說，三年局面可以改變，毛主席認為是指蔣介石反攻大陸。實際上，胡風是說文藝界的局面。」再對照陸定一的說法：「陸定一說過，胡風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質時，毛澤東找了他和周揚、胡喬木商談。毛澤東指出胡風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來。周揚和他都贊成，只有胡喬木不同意。最後還是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定了胡風為反革命。」⁸²綜上所述，可以確認毛是將胡風定罪的最終決策者，也是最關鍵的角色。

本章大致敘述了胡風事件發展的過程，其中可以看到中共領導階層中分工負責的情形，毛澤東作為最高領導者，卻具有隨時、隨處介入的權力。胡風事件之所以演變成為政治逮捕、清查肅反，毛應負最大的責任，而非事後中共所謂「擴大化」的錯誤來為其卸責。毛澤東「卡理斯瑪式」（charismatic）領導的缺失，在於個人權威的極度擴張下，其他領導人難以制衡其權力，專斷獨行在所難免。中共歷史中，發生多次以知識份子為對象的「冤假錯案」，皆和毛密切相關，除胡風事件外，尚有王實味事件，以及「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等案。下一章為本文的結論，筆者將對胡風事件進行反思，進而評論中共與知識份子間的關係。

⁸¹ 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季羨林主編，《枝蔓叢叢的回憶》，頁 522。

⁸² 陳清泉、宋廣渭著，《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1999 年），頁 399。



第五章 結論

在反思「胡風事件」之前，先簡略回顧事件的成因。前文（第肆章）已詳述胡風上書直諫，終致獲罪的經過。「胡風事件」之所以發展至此，其中包含諸多因素。先就遠因來說，1930至1940年之間，胡風在左翼文藝界引領風騷，他所主編之《七月》和《希望》雜誌，培養許多新生作家和讀者，具有一定影響力，胡風在左派理論上頗有產出，因而有「理論家」之譽。胡風雖貌似與中共「神交」已久，但他始終未進入解放區，實際上也僅接觸過周恩來、周揚等部分中共人士，而未有過真正的黨內組織生活。回到中共方面，中共在國共鬥爭中先是遭遇挫敗、開始「長征」，逃至延安方才穩住陣腳，隨著國內、外政治情勢（西安事變、對日抗戰）的變化，中共才獲得穩定發展的契機。延安時期，毛澤東致力於文化理論、思想的創作，並開展「整風運動」，目標是掃除黨內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以及知識份子「自由化」¹等現象。整風的結果是，毛澤東樹立了毛式文藝觀的權威，並且完成黨在思想、文化上的一元化領導。由於延安經驗，中共已經明瞭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所謂「鬧獨立」）性格，以及主導文化界輿論的重要性，故當政後仍將「整風」和「思想改造」等辦法，擴及全國。影響「胡風事件」的因素，還有胡風與周揚的歷史恩怨。自「左聯」時期以來，胡風與周揚間已發生過數次理論論爭，再加上「魯迅情結」²等問題，成為他們二人難解之歷史恩怨。總之，中共與胡風在文藝理論解釋權的鬥爭，再加上周揚與胡風的人事恩怨，是「胡風事件」的遠因。

¹ 有關延安時期知識份子「自由化」的現象，主要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三八節有感〉，當時王的批評是針對黨內的等級差序制度和官僚化；而丁則是批評有關性別平等的問題。高華認為，毛原希望藉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來打擊黨內的「教條主義」，然而王實味、丁玲等人的尖銳批評，讓毛認清黨內知識份子「自由化」的嚴重性，並予以嚴厲打擊，故王、丁等後來皆遭受無可抹滅肉體和心靈苦痛。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320-336。

² 周揚曾向魯迅說，胡風是南京派來的內奸，魯迅除了表示他不相信外，還對兩人做出評價：「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按：周揚）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引自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2005），第六卷，頁554-555。

至於「胡風事件」的近因，魏承思曾指出，毛澤東（和中共）之所以製造胡風事件這場「文字獄」，其焦點不在於毛、胡文藝思想的對立，而是這些人的獨立性已然成為知識份子「工具化」的最大阻礙。³在魏看來，胡風等人抗拒中共對「知識份子工具化」，是造成胡風事件的重要因素。筆者以為，胡風等知識份子，為何會對中共「工具化」堅決抗拒，源自其認知的「五四傳統」：自由主義的思想、批判性現實主義的創作思維。基於此思想，胡風等人才會堅持公開的理論爭辯，於報刊上亦爭取平等發言權。此時的中共，已全盤控制國內的文宣機構，這些要求顯然是天方夜譚。就胡風自身而言，他認為就算理論爭議，無法通過辯論謀得解決，也全無引發「政治」問題的可能。因為他自認畢生追隨革命，政治上向來擁護中共，其政治歷史也堪稱清白（僅在國共合作、左派主政時，做過幾天文宣職務），因此何來所謂「反黨」、「反革命」甚至「叛徒」的擔憂。

研究心得

「胡風事件」之發展，固然是胡風始料所未及。「胡風事件」的發生，有其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性。自中共建政以來，從思想改造、文藝整風、「肅反」，在文藝政策上，大致是朝向緊束方面發展。反觀胡風方面，他仍堅持「文藝理論」是可以辯論的，甚或求諸馬列原典。他對中共統治下的文藝創作還有種種悲觀看法，他認為在「左傾機械論」的影響下，「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大行其道，皆不利於作家創作。胡風自認一切打壓和文藝創作困境，皆來自周揚等部分文藝領導，「錯誤理解」了中央的原意，殊不知周揚等執行之政策，正是貫徹中共中央的意志。中共建政以來，在「全能主義」(totalism) 和黨一元化領導的控制下，知識份子必須過「組織化」生活，胡風亦感極其不適。以上是其必然性。至於舒蕪與胡風的來往信件，會在偶然下交予中央，且成為毛澤東據以定罪胡風的證據，這是其偶然性。以下筆者將分別討論，反思「胡風事件」的經過，事件之所以會朝政治問題發展，終而成為「冤案」，毛澤東作為主要決策者，應負怎樣的責任？其中有何歷史、政治文化因素可供思考？

³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 108。

壹 毛式權威所帶來的傷害

誠然，歷史的偶然難以捉摸。此處欲評論在「胡風事件」中，毛澤東個人權威發展至極致，為當代中國所帶來的傷害。

著名政治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分析支配的類型時，曾界定出三種分類：「法制型支配」（*legale Herrschaft*）、「傳統型支配」（*traditionale Herrschaft*）和「卡理斯瑪支配」（*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⁴韋伯並說明「卡理斯瑪」（*Charisma*）的含意，此字眼用以表示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具有這個特質，而被認為是超凡的，且具有超自然、神聖的特殊稟賦，故這種人方能被視為天生的「領袖」（*Führer*），使民眾願意為之效忠。⁵但韋伯亦指出，「卡理斯瑪」領導則必然導致「個人統治」，存在個人擅權的風險。⁶毛澤東對於中共和其民眾而言，其對中共特殊的歷史貢獻和黨內地位，加之毛的獨特人格魅力，毛顯然具備「卡理斯瑪」。

前文（第肆章第二節）已經論及，毛澤東在「胡風事件」的過程中，扮演關鍵的決策角色。當毛開始關切胡風案的發展後，小至批判文章的標題、字體大小，以及黨報的轉載，同步製造輿論壓力；大至「上綱上線」，以及將胡風問題視為「階級鬥爭」的反映，甚或升高至「肅反」、清查全國「胡風份子」的高度。一切鬥爭策略的運用和步調，均掌握在毛澤東一人之手。在「胡風事件」中可以看到，毛的指示如同「聖旨」一般，號令既出、無人敢抗。即便是毛的政治同僚（如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皆無置喙的權力。鄒讜評論中共的「全能主義」政治制度時，其基本特點是：「一個社會中沒有一個政治權力機構不能侵犯的領域。也就是說，這個社會中個人或群體的自由和權力，沒有受到道德、法律、憲法的保障。」⁷鄒氏也說：「『全能主義政治』的擴大與縮小，

⁴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等編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台北：遠流，1996），頁7。

⁵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等編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頁61-62。

⁶ 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著，劉北成等譯，《韋伯：思想與學說》（台北：桂冠：1998），頁312-314。

⁷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71。

並不必然與個人權力高度成正比。」⁸筆者以為，中共「全能主義」掌控下，人民置身於重重組織網絡之中，其自由範圍的寬窄，本就掌握在國家機器（實則是黨）的手裡。中共建政後的毛澤東，個人權威仍向上擴張，此時更具備黨內的「最終決定權」。而在「全能主義」控制的國家體制下，毛式權威顯然更具威力。從「胡風事件」中可以看到，毛澤東一聲令下，國家法律、公安、宣傳等部門，皆迅速就位、展開行動。就後見之明而論，毛的個人權威的擴張，加上政治高層中，缺乏能與毛相抗衡的權力，此種極端的「人治」領導，所帶來的缺失，於往後歷史亦不乏跡證。

貳 過度強調「意圖倫理」

韋伯在分析政治行動時，曾提出「意圖倫理」(an ethic of ultimate ends) 和「責任倫理」(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兩種倫理的區別，「意圖倫理」源自基督教的箴言：「基督徒應該正當地做事，然後將結果留予上帝決定。」於是在「意圖倫理」的前提下，當一個行為最初具備「良善的意圖」(good intent)，但最終導致「壞」的結果時，行為者、世人只會將結果歸咎於「上帝的決定」；反之，具「責任倫理」的行為者，則會考慮到「人」天生的缺點，並且對「可預見的結果」負責。⁹由於韋伯瞭解理性本身並非不完美，所以認為政治行為者應循「責任倫理」，並對可預知的後果負責。學者也指出，政治行為者若僅依循良善的道德動機，卻不會顧慮其行為所造成的後果，甚至可能使用非道德的手段來達成目的。¹⁰

若借用韋伯的觀點來看待「胡風事件」，中共對胡風所進行的政治批判的同時，經常高舉道德的大旗，不論其批判合理與否，以及是否合於事實。以毛澤東對胡風的批判為例，毛基於對「階級鬥爭的反映」的敏銳嗅覺，所以必須「揭露暗藏在革命隊伍內的反革命份子」，以純潔革命隊伍，毛的出發點未必是不良善的。然而，毛所運用的手法，是直接指揮宣傳部門「做一點文章進去」，且運用各種斷章取義的手法來「製造」材料，如此便輕易扣上胡風等人「國民

⁸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頁 71。

⁹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trans.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5), 46-47.

¹⁰ 林毓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社會思想論叢》（台北：聯經，1989），頁 264-266。

黨文化特務」的帽子，對反革命份子的一切無情鎮壓，也就得到正當性。在拘捕「胡風份子」的過程中，法律、司法僅具事後具文的作用。過度強調動機和道德良善，以及「意圖倫理」思維的強化，只要毛澤東扛起「革命」、「階級鬥爭」的旗幟，一切行為便獲合理化，這是從「胡風事件」可以看到的負面影響。

參 私人領域的政治化

在「胡風事件」中，出現各種侵犯個人隱私，或將私領域公諸於世的情況。在當時社會大眾看來，並未覺得十分奇怪，在「材料」面世後，也有不少人因為看到胡風等人的「惡劣行徑」，而同感憤慨。當時中共剛通過「五四憲法」未久，憲法中尚以專章明列「公民權利」¹¹，但在胡風案的發展中，所謂「通信秘密」置若罔聞，也少有人會認為，以私人信件定罪會有任何問題。

中共十分重視黨員的內心世界。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首次嘗試運用「思想改造」這一妙計，運用「教化」和「強制」的兩面手法，來對付知識份子。「教化」指的是毛借用儒家傳統倫理，所以整風以學習文件先行；「強制」方面，則是以行政組織力量，安排全黨進行大規模的文件學習，並且檢查個人政治歷史。¹²大體而言，整風在毛所謂「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方針下，並沒有使用傳統的刑戮、肉體消滅來對付知識份子。整風的用意，在於了解知識份子真正的內心面貌，藉群眾、心理壓力和自我否定，來達成「改造」思想的效果。整風除了文件學習外，還有交代自我歷史、寫反省筆記、寫「小廣播表」等做法。¹³如此一來，將迫使知識份子將自身心靈、思想狀態，無所遁於黨的面前，中共除欲釐清知識份子的政治面貌外，甚至包括其人際關係網絡，都是其掌控的目標。

¹¹ 「五四憲法」中，第三章談到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以下節錄數條條文：第八十七條，中國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得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第八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第九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1993），第五卷，頁539-540。

¹²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頁393-395。

¹³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頁399-410。

論者王汎森回顧中國歷史，也看到這類將私領域公開透明化的現象。他認為在此行為的背後含意顯示：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有一股巨大的道德轉化的焦慮，因而人們追求道德層次的提升與轉化，然而這個過程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獨自完成，所以要求人們將自己最隱密的思慮與生活公開化，藉別人幫助檢討和批評來達成。王汎森提出「私人領域政治化」這一問題，並說明中國傳統中，具有類似個人道德轉化的心理需求，而這點恰被政治力量（中共政權）所利用，形成其推動思想改造的內在邏輯之一。王提到，政治力量假道德名義侵入到每一個人最私密的領域中，用政治力量去逼人吾日三省吾身，那種主張將私人領域盡可能公開、盡可能透明的傳統，在經過政治力量的操弄之後，使得每一個人都像活在邊沁（Jeremy Bentham）的「環型監獄」（panopticon）之中。¹⁴依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言，在此種「全景場視空間主義」（panopticism）下，不容許任何隱藏的東西，非但不容許自由意志的存在，亦不允許任何人保留其不願公開的私人領域。¹⁵

胡風案中私人信件의出世，被毛和中共視為重要的突破，因而提高胡風案的政治高度。胡風和其友人的私人往來，只要是在其刊物發表文章，甚或只是在信件中提過的人名，都被中共納入「審查」、「肅清」的標的。中共這種株連治罪的方式，不僅是私人領域的政治化，或可比擬清代的「文字獄」。學者曾指出，五四時代以後的知識份子，深受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思想上有漸趨「激進化」的傾向。¹⁶筆者以為，馬列主義作為左派主流之意識形態，在強調菁英式領導，以及強化組織紀律以完成革命的要求下，本身就存在諸多強制因子，因而容易走向民主、自由等概念的反面極端。國共爭奪政權的過程中，鬥爭的過程是爾虞我詐、甚或殘酷的，所以中共本身就存在「摸清」黨員思想、

¹⁴ 參見王汎森，〈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收《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2003），頁161-180。

¹⁵ 傅柯自創 panopticism 一詞彙，以英人邊沁（Bentham）所設計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為例，圓形監獄的設計能夠全面監視、控制所有犯人，並且達成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和運用，傅柯以此解釋現代國家權力的運作方式。參見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195-200.

¹⁶ 林毓生在回顧「自由民主」概念進入中國的歷史，第三代知識份子以毛澤東、周恩來、傅斯年、羅家倫等為例，指出儘管他們在政治上有所分野（分居左、右兩派），但他們有一共同的趨勢：那就是都受到列寧主義的影響，強調「意識形態」和組織能力，組織「革命政黨」來建立新政權。所謂「自由民主」，遂淪為口號，以及政治宣傳的工具。參見林毓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社會思想論叢》，頁210。

生活狀態的需求。建政後，所謂「對敵鬥爭」的需求並未消失，而是轉變為「肅清政權內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嚴防內部顛覆政權的行為。當一切行為服膺於政治需求和「革命」的道德標準下，任何法律規範亦可視之於無物。

肆 中共與胡風：兼論知識份子的作用

從胡風和中共的歷史來往，可以看到胡風在思想、創作、工作、生活等面向，皆與中共格格不入。在文藝思想上，胡風堅持訴諸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原典，方能將「真理」越辯越明。然而就中共的觀點而言，這是胡風對毛澤東思想（經毛詮釋後的馬列主義）的抗拒，也是對黨的思想一元化領導的抗拒。在創作理念上，胡風認為應堅持文藝創作的特殊性，而不接受中共黨文藝領導的理論前設：「必須先有無產階級價值觀」、「必須先完成思想改造」方能創作等說法。胡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也嚴詞批評中共建政後文藝創作的弊端，如創作的「公式化」、題材單調等情況。中共方面則認為，文藝作家的「黨性」是首要的，所謂黨並非抽象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體現在個人（在文藝界則為周揚）身上。

對於胡風而言，所謂「文藝」和「政治」的關係，在他眼裡並未產生衝突。政治上，胡風熱烈擁護中共新政權的成立，所以有《歡樂頌》、《勝利頌》等詩的發表。但在文藝議題上，胡風認為自己在理論、創作自由上的堅持，並無損於他對中共的支持。對中共來說，毛澤東早已明確表達：「文藝從屬於政治」。在中共和毛澤東的眼裡，對於胡風的看法，本就著重功利性質的運用。「左聯」時期，中共所以借重胡風，也是因其親近於魯迅的緣故，故網羅胡風任中共與魯迅間的「交通員」，甚至讓他短暫做過「左聯」宣傳部長。所以時至 1955 年，當毛澤東在處理「胡風問題」並發動「肅反運動」時，還特別提醒陸定一：「文件內魯迅的例子可以不舉。」¹⁷可見，中共所以推崇魯迅，僅是基於功利需求和其「革命價值」，對於胡風問題，中共則必須切割處理，以便於治胡風之罪。

¹⁷ 陸定一在〈關於展開肅清暗藏反革命份子指示稿〉中，提到一段話：「暗藏的反革命的特點是表面上順著我們，甚至稱讚我們，阿諛我們……胡風就是用這樣的辦法騙取了魯迅的信任。」毛澤東，〈對中央關於開展鬥爭肅清暗藏反革命指示稿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共中央文獻，1991），第五卷，頁 179。

魏承思已指出，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有其一貫傳統，其本質為：既希望利用知識份子的知識和專長為政權服務，但又時時提防他們反抗中共的統治。於是中共從組織、工作、經濟生活等面向控制知識份子，使之「工具化」，且對共黨體制產生一種人身依附關係，終而失去獨立性和批判性。¹⁸筆者同意上述觀點，這種「工具化」思維，實是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主流看法。從胡風案例來看，中共並不吝於給予胡風安排工作職位的機會，但主要也是基於利用、馴服的出發點。中共不時提醒胡風，要「和整個共產黨做朋友」、「理論問題還是聽主席的」，明示他放棄獨立性（不論是文藝理論還是人際關係），方能融入「新時代」。對中共而言，知識份子倘能為其所用，固然最好；若否，則施以威嚇、刑罰，使之噤若寒蟬。在中共的統治下，知識份子便只能臨深履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終而「非禮勿言」了。

研究局限及前瞻

目前由於中共官方對相關檔案、文件，仍存有相當多之限制與使用規範，研究者若無特殊關係，或者藉職務之便，實難獲得太多新資料。以官方檔案文件而言，外界較容易取得的，是在中共允許下，由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所集結出版的文件選集、史料彙編等。此外，中共對於黨內重要人士回憶錄之撰寫和出版，亦設有諸多限制，以及相關審查辦法，研究者所能接觸的內容亦為官方所篩選。以本文來說，筆者使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資料為主，主要考察毛澤東等中共政治高層，對「胡風事件」態度的轉變，以及在政策上的各種部署。本文所使用的官方文件，以及中央領導人的批示、手稿，亦諸多轉引自其他學者的研究，資料蒐集方面缺乏新意，是為筆者的缺失之一。

¹⁸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頁 77。

至於政治事件的發生，固然有其複雜的轉折過程，這方面筆者則多依賴相關當事人（如康濯、林默涵等）的回憶文章，以收補充說明之效。在缺乏一手史料的情況下，回憶錄對於歷史研究來說，固然相當珍貴。然而，已有許多歷史研究者提出警語，必須謹慎使用回憶錄。因為回憶錄距離事件發生，年代已相當久遠，再加上「人的記憶」，顯然並不十分可靠，因此對事件的細節（人、事、時、地、物），便常有錯訛的情況，研究者須多方佐證。此外，以「胡風事件」相關當事人的事後回憶來說，其中亦不乏為己卸責、脫罪的情形（如林默涵、舒蕪），讀者更須仔細琢磨，以揣摩其心境。故研究者在使用回憶錄時，仍須多方參照檔案文獻，不宜盡信回憶錄的內容，否則可能會有誤判的疑慮。筆者在使用相關回憶錄時，仍不免多信其作者之說，較為缺乏辨偽存真的能力。

最後，本文以「胡風事件」為主軸，使用許多篇幅詳述事件的經過與發展，試圖說明毛澤東在決策層的至高影響力。以胡風個人的生平經歷、思想形成為輔，說明胡風與中共間不契合之因素，並於文末反思胡風與中共的特殊關係。本文應有助於釐清「胡風事件」的前因後果，惟筆者在敘述事件之同時，較少論及其歷史意義，以及未能放寬視野，探討其結構性的問題，是為缺失之二；此外，筆者雖嘗試兼納部分知識份子個案，以期描繪較為完整的歷史全貌，然而本文所使用的案例，其取樣、資料量顯然不夠多元，故難免有「見樹不見林」之憾，此為缺失之三。

至於未來胡風研究的展望，筆者認為目前的研究成果，多著眼於胡風之「冤」，強調胡風的個人情操，以及知識份子的悲劇性格；對於追究事件責任方面，則多歸咎於毛澤東的個人權威，較少針對中共政權結構的通盤檢討。筆者以為，倘若官方檔案能夠解密，當能進一步釐清胡風案的原委；此外，未來研究者或可深入探討，觀察中共統治下的人民，身處高度政治化的環境，為求自保所做出的種種反應，對於分析當代中共政治、社會文化而言，也許能發展出更深刻的見解。



參考書目

壹、中文部分

一、一手資料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編輯部編，《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專題選集（1953年-1956年）》，北京：中央文獻，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2007。

胡風，《胡風雜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87。

胡風，《胡風回憶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胡風，《胡風自傳》，南京：江南文藝出版社、新華經銷，1995。

胡風，《胡風全集》，共十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新華經銷，1999。

胡風，《胡風隨筆：人與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胡風著，陳鳴樹、劉祥發編，《胡風論魯迅》，台北：谷風出版，1987。

胡風、蕭軍等著，《如果他還活著：後期弟子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曹葆華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舒蕪，《舒蕪集》，第一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魯迅，《魯迅全集》，第七卷，台北：谷風出版社，1989。

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魯迅，《魯迅日記》，共三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華經銷，2006。

二、人物傳記、回憶錄

牛漢口述，何啟治、李普西編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採寫，《我所經歷的胡風案：法官王文正口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朱地主編，《親歷者記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杜高著、李輝編，《我不再是「我」：一個右派分子的精神死亡檔案》，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

季羨林編，《枝蔓叢叢的回憶》，北京：北京十月文藝，2001。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新華書店發行，1994。

逢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2003。

陳清泉、宋廣渭著，《陸定一傳》，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

梅志，《往事如烟：胡風沉冤錄》，台北：曉園出版社，1990。

彭小蓮，《他們的歲月》，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曉風，《九死未悔：胡風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

曉風主編，《我與胡風》，上、下二冊，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

曉風選編，《胡風家書》，上海：復旦大學，2007。

曉風編，《梅志文集》，共四冊，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三、專書

- 于鳳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 于靜，《舊物記：胡風遺藏紀事》，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文振庭、范際燕，《胡風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1。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2003。
- 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台北：聯經，2007。
- 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一九四九以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 王麗麗，《在文藝與意識型態之間：胡風研究》，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 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著，劉北成等譯，《韋伯：思想與學說》，台北：桂冠，1998。
- 古偉瀛、王晴佳，《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出版，2000。
- 朱汝曠，《1951-1978 中國文藝現象輯略》，台北：新銳文創、秀威資訊科技發行，2012。
- 何方，《黨筆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上、下二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8。
- 余杰，《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台北：聯經，2009。
- 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1999。
-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
- 呂芳上、張哲郎編，《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政大文學院，1999。
- 李輝，《歷史悲歌：胡風冤案集團始末》，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89。
- 李輝，《往事蒼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
-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台北：三民，2009。
-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 周正章，《笑談俱往：魯迅、胡風、周揚及其他》，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
- 周玉山，《大陸文藝新探》，台北：東大，1984。
- 周玉山，《大陸文學與歷史》，台北：東大，2004。
- 周行之，《魯迅與「左聯」》，台北：文史哲，1991。
-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上、下二冊，台北：桂冠，1989。
- 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周燕芬，《執守、反撥、超越：七月派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3。
- 岳南，《南渡北歸·傷別離》，台北：時報，2011。
- 林希，《白色花劫：「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
-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1983。
- 林毓生，《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社會思想論叢》，台北：聯經，1989。
- 林賢治，《五四之魂：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9。
- 范際燕、錢文亮，《對胡風的文化與文學闡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等編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台北：遠流，1996。
- 唐勃，《中共與知識份子》，台北：幼獅，1988。
- 徐俊西，《海上文學家百家文庫 67：胡風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 高文波，《胡風文學批評論稿》，北京：中央編譯，2011。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高華，《革命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 張灝，《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04。
-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臺灣東華書局，2001。
- 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台北：時報文化，2009。
-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二冊，台北：聯經，2001。
- 陳思和主編，《當代大陸文學史教程 1949-1999》，台北：聯合文學，2001。
- 傅國湧，《抉擇：1949 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紀錄》，台北縣新店市：八旗文化，2010。
- 楊奎松，《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楊奎松，《學問有道：中國現代史研究訪談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共二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 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路莘，《三十萬言三十年》，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1994。
- 鄒讜著，甘陽編、何高潮譯，《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2002。
- 翟志成，《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集》，台北：時報文化，1983。
- 劉季倫，《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國共產革命》，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
-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著，《現代中國文學三十年》，台北：五南，2001。
- 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 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二冊，台北：聯經，2012。
- 魏承思，《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四、期刊論文

- 王汎森，〈近代中國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19：2（台北，2008.6），頁 1-46。
- 王康，〈我參加審查胡風案的經歷〉，《百年潮》，第 12 期（北京，1999）。
- 王康，〈我參加了審查胡風案〉，《武漢文學資料》，第 6 期（武漢，2009）。
- 吳永平，〈細讀胡風之「關於舒蕪問題」：兼及「將私人通信用於公共事務」問題〉，《江漢論壇》，2005 卷 11 期（2005.11），頁 120-122。
- 吳永平，〈胡風書信中對周恩來的稱謂演變考〉，《新文學史料》，第 3 期（北京，2008），頁 131-142。

吳永平，〈胡風在「國際宣傳處」任職情況考〉，《江漢論壇》，2009 卷 9 期（武漢：2009.9），頁 89-92。

商金林，〈胡風全集中的空缺和修改〉，《新文學史料》，第 4 期（北京，2009），頁 107-121。

陳方競，〈胡風與魯迅：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左翼理論資源〉，《文史哲》，第 2 期（山東，2008）。

陳漱渝，〈存真求實、去偽辟謬：試談回憶錄的鑑別〉，《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8 卷 5 期（南京：2008.9），頁 121-126。

翟志成，〈中共與黨內知識分子關係之四變：1921-1949〉，《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3 下期（台北，1994.6），頁 195-236。

劉科、李東曉，〈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從歷史分離到現實整合〉，《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 6 期（新鄉，2005.11）。

黎辛，〈讀「丁玲與胡風」一文所想起的〉，《新文學史料》，第 1 期（北京，2008），頁 115-119。

錢理群，〈胡風與五四文學傳統〉，《文學評論》，第 5 期（北京，1988）。

五、碩士論文

施文婷，《延安經驗在 1950 年代的重演：以杜高檔案為例》，台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學位論文，2008。

葉煒，《胡風革命心態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韓陽，《毛澤東與胡風案：兼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思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六、電子資源

《人民日報》線上版：http://www.oriprobe.com/peoplesdaily_tc.html

資料擷取時間：2012年8月15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經典著作」，《人民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209963/index.html>

資料擷取時間：2012年7月2日。

「中國青年網」：<http://www.ccy1.org.cn/>—資料擷取時間：2012年7月2日。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卷：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59/index.html>

資料擷取時間：2012年5月30日。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六卷：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60/index.html>

資料擷取時間：2012年5月30日。

貳、英文部分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Weber, Max. *Politics as a Vocation*. trans.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5.